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cc
APR 26 1963

5061/5600.1

n.91-96
(1960)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1

1960

C221

1960年1月号(总第91期)目录

論助動詞	刘 坚 (1)
語法再研討——詞类区分和名詞問題	黎錦熙、刘世儒 (5)
談“連動式”	史 振 曄 (9)
列举和分承	王 希 杰 (12)
論語言与言語(上)	高 名 凱 (13)
談京剧上口字与京剧語音改革	翠 庵 (20)
京剧語言和汉语规范化	單 耀 海 (25)
京剧舞台語言改进的一点体会	赵 燕 俠 (28)
送气和不送气是不是音变造詞的方法?	李 葆 瑞 (29)
詞义演变二例	張 永 言 (33)
高等院校語言学課程問題討論	張永綿、北京大学、夏錫駿 (35)
对利用汉字偏旁記憶普通話字音的几点意見	金 有 景 (38)
語文短評(672—692)	(40)
書刊評介	
一个座談会对《学生字典》的意見	簡 正 文 (42)
評《学生字典》关于复詞的处理	管 燮 初 (42)
評雅洪托夫著《汉语的動詞范畴》	[苏联] E. И. 舒托娃 (45)
語文筆記	
馬礼遜的《中文字典》和官話拼音方案	周 有 光 (47)
动 态	
关于《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导論)》的討論	黑龙江大学汉语教研室 (37)
山东师范学院語言学教研組最近的科学研究活动	子 朗 (39)
1959年度高等院校学报和学术刊物語言学論文索引	(48)
出版消息	(50)

中國語文

編輯者：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京华印书局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北京虎坊桥
 总发行处：北 京 市 邮 局 訂购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月 刊

1960年1月22日出版 每册定价人民币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23,470册 代号—244

論 助 動 詞*

刘 坚

不少語法書都討論過助動詞(有的書上稱為能願動詞),但是討論的範圍有廣有窄,不很一致。有的語法書上所說的助動詞指用在動詞前面的“能、敢、會、該”等詞,有的還包括用在動詞后面的“了、着”和“起來、下去”之類。經過近幾年來的研究,大家對於助動詞的性質和範圍已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本文打算先扼要介紹各種語法書對於助動詞的看法,然後討論助動詞到底是怎樣的語法範疇,它具備怎樣的語法特點。意見是很不成熟的,希望得到批評和指正。

一 各種語法書對於助動詞的看法

1.1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指出,助動詞可以單獨作謂語用。在這一點上,助動詞不同於副詞,因為雙音副詞雖然也可以單用,單音副詞就站不住。《語法講話》把助動詞看成一種動詞,同時也指出助動詞和動詞有一些區別,歸納起來大致有這几方面:

- 1) 動詞一般可以重迭,助動詞不能重迭。
- 2) 動詞可以帶“了”和“着”字尾,助動詞不能。
- 3) 有些動詞加動詞的結構里可以加“過”字(例如“學過唱歌”),助動詞加動詞的結構里不能。
- 4) 動詞加動詞,第一個動詞有時候可以抽掉,有時候不可以抽掉;助動詞加動詞,助動詞都可以抽掉。
- 5) 動詞帶體詞賓語是常例,助動詞不能帶體詞賓語。

《語法講話》根據這些標準划分出來的助動詞是:

能 能够 會 可以 可能 得(得)
敢 肯 願 願意 要
應 應該 应当 該 須 須要 得(得)①

1.2 跟《語法講話》看法比較一致的是《漢語》課本。課本把助動詞稱為能願動詞,是動詞的一個附類,所用標準和所定範圍接近《語法講話》。

1.3 比較早的語法書一般不注重助動詞和副詞的區別。比如呂叔湘先生的《中國文法要略》就把“能、得、會、可、必、足”歸入“限制詞”里的“判斷限制”類。呂先生的“限制詞”就是副詞。②在他近年所著的《語法

學習》里也不列助動詞這一類,“能、會”等等屬於動詞。③

1.4 王力先生的《中國語法理論》里有一類“助動詞”,是指“把”和“被”。④這兩個詞一般語法書上稱為介詞或副動詞。這類詞跟我們現在討論的助動詞是“名同實異”的,不屬於本文的討論範圍。呂先生看作副詞的“可、能”,王力先生在講詞類的時候也把它們列入副詞。⑤在講“能願式”的時候,王先生把“能、可、必、該、要、欲、肯、敢”看作“能願末品”。⑥他的“末品”也是副詞性的詞語。

1.5 黎錦熙先生的《新著國語文法》把助動詞算做動詞的一類,助動詞“幫助動詞,占其一部”。⑦這意思是說,凡是“幫助動詞”表達某種意義,並且和動詞共同構成謂語(“占其一部”)的,都是助動詞。《國語文法》的助動詞範圍最廣,包括用在動詞前面的“可以、要、應該、一定、許、被、來”,等等,也包括用在動詞后面的“得、了、着、來”,等等。⑧

1.6 黎先生和刘世儒先生合著的《漢語語法教材》里,助動詞的範圍大致同《國語文法》相當,包括用在動詞前面(“前附”)和后面(“後附”)的兩種“助動詞”。他們認為助動詞和副詞是兩個不同的詞類,它們之間有以下三點區別:

1. 助動詞是沒變質的動詞,能獨立。
2. 有時可以把它後邊被它所助的動詞作為它的賓語。
3. 要是兩個動詞連用,在語意上如果頭一個確是幫助後一個的,就隨時可以把頭一個派作助動。這三點,大都不是“副詞”所能一樣辦到的。

* 這篇文章是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小組集體工作的一部分,先寫出來發表,請大家提意見。

① 參《語法講話》十一章,助動詞。《中國語文》1953年3月號,26—28頁)這裡不一一征引原文。

② 《中國文法要略》,新版,17頁。

③ 《語法學習》,5頁。

④ 《中國語法理論》,新版,上冊,29頁。

⑤ 《中國現代語法》,新版,上冊,21頁。

⑥ 《中國現代語法》,新版,上冊,130—145頁。

⑦ 《新著國語文法》,122頁。

⑧ 《新著國語文法》,134—145頁。

但是又說：

它和副詞只是詞法上性質的不同，句法上的“作用”實在是“差不多”的。^①

因此《教材》把句子里的助動詞看作一種“副詞性的附加語”。^②

1.7 从上面的簡單敘述里可以看出，助動詞跟副詞、動詞到底是不是同類的，各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的語法書不區別助動詞和副詞，有的書加以區別。有的語法書把助動詞算做動詞的附類，有的書却不這樣看。助動詞跟副詞有沒有區別，助動詞跟動詞有沒有區別，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會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助動詞是怎樣的語法成分。因此，我們的討論就從這兩個問題開始。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暫時把開列為“後附”的“助動詞”，只討論“前附”的那些詞。因為，在我們看來，用在動詞前面的詞和用在后面的詞的語法特點是不完全一樣的。

二 助動詞和副詞有沒有區別

2.1 助動詞和副詞的界限在語法書里一向劃得不很清楚。“才去，能去，還去，會去，就去，敢去，都去，該去”這些格式里，“去”前面的成分到底是不是同類的，不容易確定。上文1.6所引《漢語語法教材》用來區別助動詞和副詞的三項標準中，第一項標準用能不能獨立來區別，比較明確，但是第二、三兩項在運用的時候會碰到困難。究竟在什麼時候可以把助動詞后面的動詞看作“賓語”，著者並沒有告訴我們。根據什麼來確定頭一個動詞“在語意上”“確是幫助後一個的”也不容易掌握。如果沒有語法形式作根據，光憑語意又很難解決語法問題。嚴格說來，這並不是語法分析的可靠的手續。我們應該把意義和形式結合起來考慮。

這裡提出的第一項標準跟《語法講話》所提出的“助動詞可以單獨作謂語用”是一致的。根據能不能單獨作謂語的原則，可以把助動詞跟單音副詞分開，因為單音副詞都不能單獨作謂語（除了否定副詞“不”以外）。但是這個原則不能用來區別助動詞和雙音副詞，因為有的雙音副詞也可以單獨作謂語。^③

助動詞和副詞的界限既然有一部分沒劃清，有些詞應該屬哪一類，各人的看法就不完全一樣。象“一定”，《語法講話》把它列入副詞，^④而《國語文法》卻把它列入“表必然”的助動詞。^⑤

因此，我們還必須進一步研究，除了能單獨作謂語這一點以外，助動詞和副詞還有沒有其他的差別。如果有足夠的語法形式標誌說明助動詞和副詞是兩種不

同類的詞，那就應該把它們分開；否則助動詞和副詞不能分類。

2.2 我們看下面的兩組例子：

甲組	乙組
才去	能去
還去	會去
又去	肯去
也去	該去
剛去	敢去
再去	配去
或許去	能夠去
必須去	可以去
必定去	應該去
一定去	願意去

比較了這兩組例子以後，我們會發現，乙組里的“能、會、肯、敢、配、能夠、可以、應該、願意”都可以說成“不×不”的格式，例如“不能不去，不會不去……”等等。甲組里的“才、還……”大部分不能這樣說，能說成“不×不”的只有“不再不去”和“不一定不去”。

關於“再”和“一定”，下面還要討論，這裡先談“才、還、又、也、剛、或許、必須、必定”幾個詞。這幾個詞一般語法書都看作副詞，而且是“嚴格的”副詞，因為不是形容詞兼作副詞。這些副詞跟乙組的“能、會”等等的區別在於不能說成“不×不”，這是很清楚的。並且，形容詞作為副詞來用的時候也不能說成“不×不”。象“快走、白吃、老哭、光說”都是這類例子。

“再”和“一定”在“不×不”這個格式上跟“能、會”之類是一樣的：

不再不去，不再不吃…… 不能不去，不能不吃……
不一定不去，不一定不吃…… 不會不去，不會不吃……

但是“能、會”可以用“很”來修飾，“再、一定”不能：

—— 很能吃
—— 很會吃

從這項排比可以看出，“再、一定”跟“能、會”的語法特點是不完全一樣的，它們是兩類不同的詞。

因此，我們可以把助動詞和副詞區別開來：助動詞可以說成“不×不”的格式，可以用“很”來修飾；副詞一般不能說成“不×不”的格式，不能用“很”來修飾。

① 《漢語語法教材》，348頁。著重點是原有的。

② 參《漢語語法教材》十四、十五兩課，“附加的成分（2）——副詞性的附加語”。

③ 《語法講話》舉過雙音副詞單獨作謂語的例子：“你明天一定來嗎？——一定。”（《中國語文》1953年3月號，25頁）

④ 參《語法講話》十八章，副詞。（《中國語文》1953年9月號，24頁）

⑤ 《新著國語文法》，137頁。

甲組的“才、還、又、也、剛、再、或許、必須、必定、一定”是副詞，乙組的“能、會、肯、該、敢、配、能够、可以、應該、願意”是助動詞。

三 助動詞和動詞有沒有區別

3.1 上文說明助動詞和副詞是不同類的，現在我們要研究助動詞和動詞是同類還是不同類的。

有的語法書從形態方面着眼，拿能不能帶詞尾“了、着”和能不能重迭來分辨助動詞和動詞：助動詞不能帶詞尾“了、着”，不能重迭；動詞能帶詞尾“了、着”，能重迭。

用形態標志來區分助動詞和動詞有一定的限制。上文2.2所舉的跟副詞有區別的“能、會”類助動詞雖然缺乏“了、着”類形態標志，但是動詞也並不是都能帶“了、着”的。象“緣、在（‘我在家’）、以為、害怕、討厭”等等都不能帶詞尾“了”，“到、丟、懂、去、忘記、同情、反對”等等都不能帶詞尾“着”。可見助動詞雖然不帶詞尾，但是不帶詞尾的並不都是助動詞。

用能不能重迭來鑒別助動詞和動詞也有類似的困難，並不是所有的動詞都能重迭。“掉（‘掉頭髮’）、服（‘我算服了你了’）、懂、死”都是不能重迭的動詞。而且，我們很容易發現，一般語法書上所說的副動詞（介詞）也是不能重迭的，因此，“不能重迭”這一點似乎還不足以說明助動詞的特性。

3.2 從形態標志上既然難以分辨助動詞和動詞，我們不妨從助動詞跟動詞的結合上來判斷，看看“助動詞+動詞”的結構跟一般“動詞+動詞”的結構在性質上不一樣。如果證明這是兩種不同的結構，那就說明助動詞和動詞不是同類的；否則助動詞和動詞就不能分類。

“動詞+動詞”可以是向心結構，可以是後補結構，也可以是動賓結構。當然還可以是並立結構或連動結構，不過這裡不必考慮。“助動詞+動詞”是不是向心性的，或者是後補性的、動賓性的呢？下面我們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3.3 有的語法書把助動詞看成動詞的附加語，實際上是把“助動詞+動詞”看成向心結構。其實，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比較：

甲組	乙組
對/喝	會/喝
陪/坐	要/坐
合/請	該/請
分/種	肯/種
代/送	能/送
替/寫	配/寫

這裡的甲組都是動詞和動詞組成的向心結構；乙組里的“會、要、該、肯、能、配”，在2.2里已經肯定是助動詞，“會喝”之類都是“助動詞+動詞”結構。這兩組結構性質並不相同。對於甲組的例子，假若要提問題，我們可以問“怎麼～？”（“怎麼喝？對喝”，“怎麼坐？陪坐”。），也可以問“～嗎？”（“對喝嗎？對喝”，“陪坐嗎？陪坐”。）對於乙組，不能問“怎麼～？”，只能問“～嗎？”（“會喝嗎？會喝”，“要坐嗎？要坐”。）；回答的時候，可以說“會喝”，也可以單說“會”；但甲組的“對、陪、合、分、代、替”就不能單獨回答問題。由此可見，“助動詞+動詞”結構跟向心式的“動詞+動詞”結構是不同的。

3.4 有的語法書把“助動詞+動詞”結構看成後補結構。比如陸宗達等著的《現代漢語語法》（上冊）就認為“我要走了”里的“要”“是主要動詞，一點兒也不是助別人的，比方上頭那句話（按指‘我要走了’）後頭加了個了表示實現，到了兒是給誰加的呢？是要了呢，還是走了呢？誰都看得出來，是要了”。因此，“在咱的語法系統里，造句法講補足關係的時候說一句‘動詞可以用動詞作補足語’就把什麼助動詞不助動詞的都給包括進去了”。①很明顯，著者認為“我要走了”里的動詞“走”是“要”的補足語。應該說，著者得出這個結論的方法是有問題的。如果說“要走了”里的“了”是給“要”加的，那麼能不能說“該走了、能走了、肯走了”里的“了”也是給“該、能、肯”加的呢？恐怕誰都不會這麼理解的。其實“了”不是加在“要”上面而是加在“要走”上面的。“要走”也不是後補結構。比較：

泡透	要走
泡得透	——
泡不透	——

“泡透”是後補結構，中間可以加“得”或“不”；“要走”不是後補結構，中間不能加“得”或“不”。

3.5 “助動詞+動詞”也不是動賓結構

“動詞+動詞”，有時候可以造成動賓結構，例如：

- 1) 嘿，我忘記問了，姐夫好吧？（丁西林）
姊姊！我要去開會，顧不上招呼你！（趙樹理）
武震在橋上指揮修橋。（杜鵑）
- 2) 他知道怎麼走。
他懂得怎麼學習。
我怕去。
像吃。貪吃。懶記吃。在乎吃。……

下面再列另一類結構，這類結構暫時不必肯定是什麼結構：

① 《現代漢語語法》，上冊，123頁。

- 3) 能去。要去。会去。敢去。肯去。該去。配去。
想去。爱去。應該去。願意去。能够去。可以
去。可能去。应当去。需要去。乐意去。喜欢
去。希望去。

我們拿这三組来比較，可以看出第1組的动宾結構都不能用“很”修飾，第2組的动宾結構和第3組的結構都能用“很”修飾。第3組的格式跟第2組的动宾結構是不是同类的呢？

如果作进一步的比較，会发现2、3兩組也有不同的地方：

1) 第1組和第2組的动宾結構都可以用“x什么？”来問（“忘記什么？”，“知道什么？”），可不能用“x怎么样？”来問。这是把它們肯定为动宾結構的道理之一。

2) 第3組的結構可以用“x怎么样？”来問（“能怎么样？能去。”），可不能用“x什么？”来問。这一組是“助動詞+動詞”結構。

3.6 由此可見，“助動詞+動詞”結構不是向心結構，不是后补結構，也不是动宾結構。助動詞的性質不同于向心結構、后补結構、动宾結構里的第一个動詞。也就是說，助動詞和動詞是不同范疇的詞。用能不能加“很”的标准和問話的标准，是可以把它們分开的。

3.7 助動詞和動詞虽然有不同的語法特点，應該把它們分开，但是它們之間也有相同的地方，比如都可以單獨作謂語，都可以組成反复問句。因此，我們認為象《語法講話》和《漢語》課本那樣，把助動詞看作動詞的一个附类是比較合適的。

四 是動詞又是助動詞的例子

4.1 上文3.5所列举的助動詞都能用来回答“x怎么样？”的問題，但是其中有一些也可以用来回答“x什么？”或“x誰？”，象：

要什么？	要一本書。
会什么？	会俄文。
該誰啦？	該你。
想誰？	想他。
爱誰？（什么？）	爱他。爱話劇。
需要什么？	需要一枝鉛筆。
喜欢誰？（什么？）	喜欢他。喜欢話劇。

这七个詞之中，用在体詞宾語前面的时候跟用在動詞前面的时候相比，有的意义並沒有明显的分別，但是語法特点已經很不一样。比較：

- 1) 喜欢 喜欢去 不喜欢去 喜欢不去 不喜欢
不去
喜欢不喜欢去？ 很喜欢去 喜欢去得很 喜欢怎

么样？

- 2) 喜欢 喜欢他 不喜欢他 —— ——

喜欢不喜欢他？ 很喜欢他 —— 喜欢誰？

我們容易发现“喜欢₁”和“喜欢₂”是两个不同的詞，“喜欢₁”是助動詞，“喜欢₂”是動詞。

別的詞，比如用在体詞宾語前面的“要、会”，跟用在動詞前面的“要、会”相比，不但語法特点不同，意义也大大改变了。

由此可見，有两类“要、会、該、想、爱、需要、喜欢”：一类“要…”是助動詞，一类“要…”是動詞。

4.2 同样，“願意你去，希望他来，喜欢他老实，該你去”里的“願意、希望、喜欢、該”也是動詞。

4.3 在“我希望下雨，我喜欢下雨”里，“希望、喜欢”和“下”不是同一个人的动作行为，当然无所谓“助動”了。

五 助動詞表

5.1 下面这些詞都是助動詞：

能 要 会 敢 肯 該 配 想 爱 願意
能够 可以 可能 應該 应当 需要 乐意
喜欢 希望

5.2 此外还有“可、喜、应、須、願”等几个文言成分，口語里虽然不說，①但是書面上还用。从造句的能力上看，“可”相当于“可以”，“喜”相当于“喜欢”，“应”相当于“應該”，“須”相当于“需要”，“願”相当于“願意”，这些詞也是助動詞。

你有什么話，尽可对我說。（丁西林）

似乎他很不喜欢这末后的两个字——弟兄。（老舍）

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应絕交的。（丁西林）

为写一件事須知道十件事，为写一个人須認識許多人。（老舍）

小飞蛾因为不願多挨耳刮子，也想在張木匠面前装个笑臉。（赵树理）

5.3 “高兴、好(hǎo)”本来不是一般北方話的助動詞，現在已經进入了書面語：

找几个灵僧人，先修人行道，好运伤员！（楊朔）

把我放在安全的地方，他好独作独当的去干。（老舍）

要是不高兴出去，成年住在这里也没什么忧愁。（叶圣陶）

从它們在方言里造句的特点来看，“高兴”和“好”也应该算是助動詞。

① “願”似乎口語也能說，“你願意不願意去？”听起来象是“你願不願去？”那是因为輕声的“意”已經由[i]变得很輕，听觉上不容易分辨的原故。其实，說的还是“願意”，不是“願”。

語法再研討——詞類區分和名詞問題

黎錦熙

劉世儒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小組（以下簡稱“小組”）在去年三月發出號召，^① 希望“全國關心語法規範和多年從事語法研究的同志都來通力合作”，為編好一部“現代漢語語法”，以便“干部、編輯、教師等閱讀，幫助他們正確認識語言和使用祖國語言”而共同奮鬥。對於這個號召，我們完全贊同並且熱烈響應。的確，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雖然已經有了半个多世紀的歷史（從《馬氏文通》的出版算起），但真正地得到發展的卻是在解放之後。十年來，由於黨的領導，由於馬列主義語言學說原理原則的直接指導，我們在漢語語法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它遠遠地超過了解放前五十多年間語法研究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認，由於語法學還是一門新興的科學，在進一步大規模地、深入地開展研究時，必然會發現很多新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解決，大家的意見一時也還不能一致，因而會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從學術討論的範圍看來，這應該說是一種繁榮的局面，是漢語語法研究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的里程碑，決不能認為這是“混亂”，是“一場糊塗”，是“不應有的現象”。當然從教育觀點上（比如廣大的人民的語文學習上，廣大學校的語文教學上）來考慮，這種長期的、無休止的意見分歧的局面，確實也給人們帶來了不少困難。因此，在可能的範圍內謀求統一，就完全有必要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大躍進的客觀需要，為了滿足廣大群眾學習文化的迫切要求，發揚大協作的精神，編出一部切合實用的、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規範化的現代漢語語法，就是一件非常有利益的事情。我們希望同志們都來響應“小組”這個號召，參加討論，提出問題，攜起手來，共同探索真理，以便早日把能夠統一起來的問題統一起來。

語法上應當討論的問題，不可能一次討論完；我們打算按照一般的順序，陸續提出其中較為切要的問題，表示一點兒不成熟的意見，作為共同商討的資料。

首先談談“詞類”上的問題。漢語區分詞類的標準是什麼？這是個老問題，直到今天大家的意見還有分歧。因此划分出來的詞類就不能一致，乃至有人認為根本就無法划分詞類——漢語實詞無詞類。

漢語區分詞類的標準應該是什麼呢？我們同意“小

組”的意見，遵循着“形式和意義相結合”的原則。^②問題的发生是在於“形式”所指的内容究竟是什麼。

有主張“形式”就是指“詞的形式”，並且是“詞的内部屈折形式”的；漢語的詞缺乏這種形式，因而就得出“漢語無詞類”的結論。這個結論當然是靠不住的，因為“各種範疇的外部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各種類型的詞的變化、前綴、後綴、詞尾、句重音、語調、詞序、特殊的虛詞、句法關係，等等”，^③可見詞的形態變化在區分詞類上只是“語法形式”的一種。如果把“詞形變化”和“詞類”問題等同起來，那顯然是完全從屈折語的觀點出發，拿來硬套漢語，套不上，乃至無可套，就不免把漢語的詞類看成是等於零，化實為虛無了。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免給漢語的詞類製造一些形態，擴大局部的偶然的現象，說成是跟人家一樣的普遍規律。^④

另一種說法是“位次形態說”。這也不能解決問題，因為詞類和它進入句子的位次，雖然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如現代漢語的謂語基本上總不用名詞等）；但並不是全面的、充分適用的對應關係。（如“他笑”，“張三好”：“他”“張三”都在“主次”，“笑”“好”都在“謂次”，這豈不是各自成了一類詞，名代不分、動形無別了嗎？位次形態論者有什麼理由還把它們區分開來呢？）

① 見《中國語文》1959年3月號。

② 同上，142頁。

③ 參看謝爾巴《論俄語詞類》，時代出版社，1957年，北京版，2頁。

④ 把詞類的形式標誌完全限制在形態學標誌內，這不但對於漢語不能適用，就是對於俄語那樣富有形態的語言，執行起來也是有困難的。在俄語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也有所謂“無形式詞”（бесформенное слово），如 пальто（大衣）、какаду（鸚鵡）等，若是都把它們踢到語法的大門外邊去，說它們是“非語法的名詞”（не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е），那顯然也是說不過去的，因為正如彼什可夫斯基所說的：“名詞這個純語法概念怎能成為非語法的？”這顯然是“語法和形態學被混為一談了”。因此，彼什可夫斯基建議把“非形態的名詞稱為句法名詞”。而且，後來“在給每種詞類下定義的時候，他把它們的相互結合性與不可結合性，亦即詞組形式的特徵、句法特徵，當做它們的重要特徵。（參看伯恩施坦：《介紹彼什可夫斯基的語法體系》）這就擴大了“形式”的概念，由狹隘的“詞形”說轉到廣闊的“句法”形式說方面來了。

划分詞类拿它作为唯一的或者主要的标准,那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在我們看来,对汉语詞类的区分能起主导作用的,是“句法”中的成分。但必須立刻指出,我們所說的“句法”是指“синтаксис”說的,不是指“предложения”說的(当然也包括 предложения)。所以这和“位次形态論”虽也有交叉之处,但是有本質的不同。(如“明朗的天”这个詞組,它的中心詞“天”进入句子是什么“位次”并未决定,当然就談不到句子中的“位次形态”。可是这个詞組仍然是属于句法范畴的,它正是一种偏正結構,是一个名詞作中心、帶着一个形容詞作定語組成的)“句本位”論如果是指依靠整个句子的位次作为本位来划分詞类,那当然是有問題的;④如果是指以“句法成分”为本位,把它作为划分詞类的主要标准,对于汉语說来,我們觉得是“实事求是”的,压根儿也并不发生問題。在这一方面参考一下苏联汉学家的意見,是有好处的:

“汉语接近于詞根語的类型”,而“詞根語的語法本質上却不需要形态学:这里的重心落在句法上”。⑤

“汉语的詞一般不具备足以把它們归入某一詞类的外部形态的标志,因此在区分它們的詞类的时候,自然就非依靠其他标准不可: a. 不同类的詞担任这种或那种句子成分的不同能力; b. 它們同別类的詞以及同这个或那个形式成分的不同結合性。”⑥

“在一些語言里,占优势的是形态学标志,然而,在另一些語言里,占优势的則是句法标志,例如詞序,各种句法关系等等。”⑦

“如果汉语的詞在客观上本身具有詞类的特点(虽然缺少形态学标志),那么为了給它們划分詞类,我們就可以成功地利用詞的句法特性,即考虑它們的虛配性,相互关系等等。”⑧

总之,我們虽然并不主張“句法”成分是汉语区分詞类的唯一的标准,但“句法”在汉语区分詞类上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句法标准是主要的标准,并不排斥其它的标准(如詞的狭义的形态;詞的进入句子的位次形态),只是在汉语的客观規律上,这些都是副次的,可以尽量地吸取,适当地补充,互相依靠,統一表現;但是,当它一旦和主要标准发生冲突时,就得服从主要标准的制约。

至于說到形式和意义的問題,当然不論是那种“形式”都是和“意义”不能分开的。因为詞就是内容和形式的辯証的統一。 “語法形式是詞的意义的要素,跟詞的物質意义是同类的。一个詞的物質意义与形式意义組成一个思想行为。”⑨ “任何一个語法范畴的存在都以它的意义和它的所有的形式特征之間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条件,不了解意义就不能确定形式特征,因为

还不知道这些特征是否表示了什么意义,因此也不知道这些形式特征本身究竟是否存在,范畴本身是否存在。”⑩請看下表:

地道	1. 意义——事物范畴	1. 句法	1. 詞的組合能力	一个地道
			2. 句法功能	很地道(×) 1. 我見過地道。 2. 我地道(×)
	2. 形式	2. 詞法	1. 重叠:地道→地地道道(×)	
			2. 語音: 兩詞素語音均變。	

地道	1. 意义——性状范畴	1. 句法	1. 組合能力	一个地道(×) 很地道
			2. 功能	我見過地道(×)⑪ 我地道。
	2. 形式	2. 詞法	1. 重叠:地道→地地道道	
			2. 語音: 后一詞素讀輕聲。	

可見意义和形式是辯証地統一的。意义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又确定了意义(如上表所示:“不地道”,“地地道道”,这就可以决定是形容詞;“一个地道”,“地道是我們挖的”,这就可以决定是名詞)。單憑意义不能解決問題(如“行为”“战争”,憑意义,这該是動詞,因为这是属于行为范畴的,虽然也可以說它在語义上已經名詞化,但主要还是要形式的捍卫下才能獲得証明),單憑形式也同樣是如此,不了解它的意义,又怎能讓它獲得相应的形式呢?——这不但对汉语說是如此,就是对于印欧語也同樣是如此(在俄語,如 правда,如果你不曉得它是属于事物范畴(真理)还是属于关系范畴(虽然)的話,那么你就沒有法子去决定它該不該变形,應該怎样变形)。

④ 《新著國語文法》所謂“句本位”实际是一种“學科”体系上的教學法名称——就是說,講詞类要在句子中講,這詞类才能獲得生命,才不是“靜止”的标本,才不是“懸空”下來的尸骨頭。假如区分詞类只是按照詞在“句子中的位次”進行的話,那么,名詞和代名詞就應該是一类,動詞和形容詞(作謂語的)也應該是一类,如此等等。可是《新著國語文法》并不如此。可見它所謂“句本位”并不同于“位次形态說”,至多也不过是在教學上利用“句子位次”和詞类上可能的“对应关系”来鑒別一些詞类而已。

⑤ 參看契科巴瓦:《語言學概論》,172、178頁。

⑥ 龙果夫:《現代汉语語法研究》,1頁。

⑦ 龙果夫:《汉语詞类》,引見謝列勃連尼柯夫院士的《有关語言學的几个問題》,24頁。

⑧ 宋采夫:《汉语詞类問題》,引見同上書,25頁。

⑨ 波鉄布尼亞:《俄語語法札記》,I—II,29頁,引見伯恩斯坦的《介紹彼什可夫斯基的語法体系》,10頁。

⑩ 謝尔巴:《論俄語詞类》,4頁。

⑪ 如果說“我見過地道”可通,那“地道”就已名詞化了,在位次形态的捍卫下,我們便可以斷定它在語义上已轉入了事物的范畴。

(2) 关于区分詞类的一些具体問題，这里首先談“名詞”。这部分我們打算提出三个問題来討論。

第一是動詞、形容詞轉为抽象名詞的問題。例如：

劳动創造世界。

美丽是和清静分不开的。

这“劳动”“美丽”“清静”是否都轉成名詞了呢？可以說是的。1) 从意义上看，它已由“行为范畴”或“性状范畴”轉入“事物范畴”了；2) 相应地它在形式上就被賦予了一系列的名詞的語法特征，这些特征是：(A) 可以被定語限制，如“人們的劳动”“这种美丽”“那种清静”等；(B) 可以和名詞构成同位語，如“死这个东西，病魔一个可怕的阴影在他的头上盘旋了六年。”(巴金短篇小说集：皮椅)。(C) 可以和名詞构成联合結構，如：“血和惨叫使整个工房的人都怔住了。”(夏衍：包身工)“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們的物质生活。”(陈伯达：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帜下)；(D) 可以放在“介詞…方位詞”这个語言区域中(这中間是名詞的地位)，如：“粉牆突出在新綠里。”(阿Q正傳)

由此看来，不承認它是名詞似乎也不可能。这是不是說因为它做了句子的主語、宾語等，就得轉成名詞呢？从表面上看，是的，从根本上看，就不是的。这是因为它在詞义上就可以从本类轉入他类(如例句中的“交换”就必然要轉为名詞)，或者竟可一轉而不复返(如“綠”字构成“新綠”，就不再用作形容詞了)，从而它就潛藏着这种取得一切名詞形式的可能性，这才进入句中作了句子的主語宾語等。如果它还是作謂語(如“他在劳动”，“她很美丽”)，在詞汇的意义上虽然一样，可是沒有轉入“事物范畴”，从而它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取得名詞形式的可能性了。

有人說，这不是轉成名詞，而是根本上就是名詞，它和“他在劳动”的“劳动”、“她很美丽”的“美丽”只是詞汇中的同音詞；但是我們覺得，“劳动創造世界”的“劳动”和“他在劳动”的“劳动”显然詞义还没有解体，要判为两个各不相干的詞儿，恐怕也是行不通的。首先，在詞典上就沒法处理(分为两个詞儿，詞义实在沒有分別；合在一条，就正是一詞兼类，不能說是两个同音詞了)。其次，在語法上更沒法交待，因为在屈折語中，如英語 beautiful, beauty，他們有形式可分，定为两个詞儿是当然的；我們既把“美丽”定为名詞，又把“美丽”定为形容詞，无形式标志而判为两个詞儿，各自独立，割断关系，这至少在一般人看来就是不可理解、无法掌握的了。

也有人变个样子來說，反对“轉类”，拥护“兼类”。不知汉语所謂轉类就是兼类，而硬划开为两个詞的乃

是詞汇問題，并不算是語法上的兼类。从本类发展“轉”用于他类而“兼”之，叫“轉类”；当然也有一轉而不复返的(例如名詞“牺牲”，現代汉语轉成了動詞；動詞的“战争”，現代汉语轉为名詞，都有不复返的趋势)；那只是一部分。絕大多數轉类的詞都是兼类的：就发展方面說叫“轉类”，就存在方面說就叫“兼类”。

又有人說，这还是動詞、形容詞，証据是：它們仍然保留有各自的固有的語法形式，如：

劳动劳动是必要的。(可以重叠)

劳动着比休息着好。(可以粘“着”尾)

向后看不对。(可以带状語)

打孩子不好。(可以带宾語)

这些形式都不是名詞所能具有的，因而他們認為轉成名詞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我們不同意这种說法，因为：1) 它們仍然沒有喪失名詞的性質。比如仍然可以加定語(他的向后看不对，你的向后看就对么?)，仍然可以加同位語(打孩子这种教育方法不好。劳动劳动这种想法很必要)，仍然可以同名詞联合(向后看和不求进步的想法是一回事儿)。这样看来，句法特征和詞法特征有沒有矛盾？沒有。2) 这已經不是單个儿的詞了，名詞性是屬於詞組的(即如“劳动劳动”就是劳动一劳动，語源上这后一“劳动”原是补語，所以也是詞組，屬於句法范畴；又如“劳动着”，“着”、“了”等在汉语里原是后附于动的助動詞，也是从补語范畴发展粘附而成詞尾的，所以單个儿的詞“劳动”可以轉类成“抽名”，而帶有粘附成分的“劳动着”就跟“正在劳动”一样是属于詞組而后轉为名詞性的)。在名詞性的詞組內它当然仍是動詞(因为这不是名詞化了的動詞，而是名詞化了的动补詞組、动宾詞組等)，名詞性詞組內的動詞，当然仍是可以被賦予它所固有的形式的。上边說“可以加定語”等名詞特征，是冲着名詞性的詞組去的；而又“仍然保留”的四种動詞特征，乃是冲着名詞性詞組內的動詞去的：所向之点不同，当然不矛盾。对于單个儿的詞本来也应该这么說的：它是名詞性的動詞。但这單个儿的動詞既是“名詞性”，干脆說，就是名詞了，沒有必要繞这么个圈子。况且汉语中这种高度的丰富的“抽名”很多，显然是大量地長期地从动、形两类轉来的(而且有一轉不复返的)，何必一定要叫它們“名詞性的动、形”呢？①

① 在印欧語里，仍是通过詞形来表示的。如俄語“Читать книгу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Чтение книги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这两种形式(不定式、动名詞)来到汉语就都喪失了，比如把这两个詞句譯成汉语：“讀書是很趣味的”“讀書是很有趣味的”，語法形式上就都一样，如果把头一句說成是動詞作主語，后一句說成是動名詞作主語，那是不可理解的。

印欧語这种由動詞變形而成的名詞虽然仍可以帶賓語或狀語（虽然賓語名詞的格和相应的動詞所支配的格是不相同的），但究竟詞形和動詞不同：詞形不同就表示了它們的詞性不同，所以尽管它帶了狀語、賓語，也还得認為是名詞（一般就叫“動名詞”等）。漢語的詞類轉變，既沒有拘定要在詞的本身形式上有所表現，那么，尽管“閱讀是愉快的”的“閱讀”是轉用成名詞了，可是“閱讀報紙是愉快的”的“閱讀報紙”，就可以直捷了當地認為是動賓詞組作了“是”的主語，是個名詞性的詞組，根本不必比照印欧語，說它也是名詞又帶了賓語的。

再說，如果動詞形容詞作主語賓語時也還是動詞形容詞，那么在結構形式方面動詞形容詞也就具備了一系列的名詞的語法特征，因此這三类實詞在語法上顯著的不同特征就要垮台一大半。——現在我們來作個小結：漢語單個的動、形都可以轉類為名詞（大部分就是“兼類”）；若動、形處在詞組（或詞組化）中，那么，尽管詞組用成了名詞性，詞組中的動、形並不轉類。

第二是方位詞問題，它是名詞，還是應該獨立？

方位詞就是表示方向和位置的詞。這種詞在國內向來是被分配在名詞類中，作為名詞中的一個小范疇的。而在國外却又大都被獨立為一类作為語法的工具詞，即所謂“後置詞”（*послелог, postposition*，對 *предлог, preposition* [前置詞，即一般介詞] 說的）。我們覺得這也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方位詞和名詞相同的地方，在於：1) 可以被定語限制，如“桌子的上邊”；2) 能獨立地充當句法成分（主要是狀語），如“向外看”等。但還有大不相同的地方：1) 經常詞綴化，成了所謂“後置詞”，這就失掉了作中心詞的資格，如早上、夜間、眼前、臉上、桌子上、地下（不等於地的下邊）、天上（不等於天的上邊）；2) 可以受副詞限制，如最上邊、盡南頭；3) 即使是單音節詞也不能重疊，除非跟反義詞一起重疊。比較：

方位詞：上上 前前 下下 后后（都不行）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都行；部分有限制，如“南南北北”）

名詞：人人 家家 乡乡 社社（都行）

天地→天天地地 人物→人人物物 山水→山山水水（都不行；也有用成習慣語的，如“日日夜夜、子子孫孫、男男女女”等）

由此看來，方位詞是有異於名詞的特征的。特別是它的“詞綴化”用法，不但和名詞相去已遠，而且簡直要

開詞類了。這種跨在詞類和詞素界限上的現象，似乎不便于放在某一詞類中。要不要獨立呢？要。放在哪兒，放到構詞法中去，不行。因為它是活的。姑且不論它的獨立用法，如“向外看”、“前有山，後有水”之類；就是在詞綴化時，也還是有相對的獨立性的，如“大海里、大江里”等。我們打算在實詞和虛詞之外另辟一個新的大部門——“弱詞”來接納它，而實詞就是“強詞”；由弱入虛，“弱詞”還不等於虛詞。可是它在詞類中的排隊，還是要保存在名詞之後作為“附類”，因為它畢竟同名詞還有同樣的本質和密切的關係，就是作為弱詞，也還是從這兒“弱”出去的。

第三個問題是量詞問題。量詞要不要獨立？這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量詞是個大類名，其實它還可以分成兩類：“稱量的”和“陪伴的”，而“陪伴的”量詞應該是量詞中的主干；因為它最能體現這類詞的特色。擴大地說，也最能體現漢語詞類的特色。（如“稱量的”詞，在印欧語還是有的，如 *один кусок мыла* [一塊肥皂]、*один кусок мела* [一支粉筆]，但語法上這 *кусок* 仍是名詞；至於“陪伴的”如“一個人”“一張桌子”之類就絕對沒有了。如 *один согл* [一張桌子]、*две лошади* [兩匹馬] 就都是數詞名詞直接相連的。）因此我們覺得量詞可以獨立。具體的理由是：1) 事物範疇不明顯了（如“一個人”“一只狗”，再也想不到“個”是“一個竹葉的單位”，“只”（隻）是“鳥一枚也”了）；2) 相應地在形式上也和名詞不同了：(A) 可以受副詞限制，如“這麼個人，這麼瓶花”（比較：“這麼瓶”，不行）；(B) 經常和數詞結合，如“三個人”“一籃子蘋果”（比較：“屋裡放著一籃子蘋果”，行；“屋裡放著一籃子”，就覺得話沒說完似的，而且不會理解為一個籃子）；(C) 不能粘方位詞（比較：“紙上有字”，行；“張上有字”，不行，古漢語或許可以）；(D) 不能作句子的主要成分（訓詁式的判斷句，如“斤是一個量詞”，當然除外。又如“兩個人：一個是他，一個是我”，這是中心詞“人”承前省了）；(E) 重疊方式比名詞豐富（比較：量詞“個個”“一個個”“一個一個”“一個人一個人地走出來”，都行；而名詞只有“人人”，“一人人”就不行）。這就可見量詞同名詞有所不同了，因此把它獨立起來是可以的。但是我們認為它仍然應該排在名詞下邊作為“附類”，只是不能作為名詞的一個正式的類別罷了。

量詞實在也是名詞的“弱化”。它和方位詞都保存有“體詞”（即實體詞）的本質，作為名詞的附類是相當的。但是還有一種“虛化的強詞”，我們也打算建議作為名詞的附類，這就是“代名詞”。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準備以後再談，這裡就不多說了。

談“連動式”

史振暉

“連動式”的說法自從《北京口語語法》^①作為漢語的一種“特別的結構”提出，並經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採用以後，就成了漢語語法研究上的一個爭論問題。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不過贊成的也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把“連動式”的範圍縮小了，主要的是都不把介詞結構算在連動式之內。除掉包括介詞結構的以外，《語法講話》所舉出的“連動式”主要有下面幾種格式：

(1) 拿動作次序分先後。例如：

武鬆脫了鞋走進屋去。(楊朔)

(2) 表示方式的動詞結構在前。例如：

〔她〕站在院子裏瞪着眼珠子發呆。(崔八娃)

(3) 表示條件的動詞結構在前。例如：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毛澤東)

他想不出妥當的辦法，越沒辦法，也就越不放心。

(老舍)

現在只就這幾種格式來談談“連動式”。

(一) “瞪着眼珠子發呆”^②

這種格式中前一個帶“着”的動詞，黎錦熙先生認為是“副詞的附加語”，王力先生認為是“末品謂語形式”，呂叔湘先生認為是“動詞的前附加語”，總之他們都認為是狀語，不是謂語。《漢語》課本採用了《語法講話》的說法，把這種格式列入“謂語的連續”。

這種格式的特点是：

(1) 前一個動詞雖然帶有“着”，但是它的時態卻仍附於後一個動詞的時態。^③例如：

1) 他“隔”着窗玻璃“瞅”着外面。(周立波：暴風驟雨)

2) 他慢慢地回過頭來，叫我坐在他的旁邊，又“瞪”着眼“看”着遠處。(小說)

3) 玉翠伸出巴掌擋住了妇联同志的嘴，“笑着”“拉開”了別的。(康濯：春種秋收)

4) 那一年他們曾在这里“埋伏着”“打”過敵人。

第一個動詞所帶的“着”，只表示出這個動作在進行中，但是這動作的進行是現在的，過去的，還是未來的，還需要看第二個動詞所帶的時態：例1的“隔”和例2的“瞪”，後面動詞也帶有“着”，它們是“現在進行態”；例3的“笑着”，後邊的動詞帶有“了”，它是“過去進行態”；例4的“埋伏着”，後邊的動詞帶有“過”，它是

“不定时過去進行態”。它們的時態都仍附於後一個動詞的時態，可見它們都從屬於後一個動詞。

(2) 前一個動詞所帶的“着”，有時可以換成“地”；有一些煞狀的“地”也可以換成“着”。例如：

5) 馮克西微笑地說。(在北極——教材引)

6) 她說了些話，便閉上了眼睛，兩手交叉地放在胸前，似乎要睡去的樣子。(巴金：家)

上例中的“着”和“地”都可以互換。

(3) 前一個動詞是用來回答後一個動詞怎樣進行的。例如：

問：他怎么發呆？ 答：他瞪着眼睛發呆。

問：他怎么看着遠處？ 答：他瞪着眼睛看着遠處。

問句中的“怎么”是狀語，回答這個“怎么”的“瞪着眼睛”、“瞪着眼睛”自然也是狀語。再看下例：

7) 干到晌午了，糠餅子就涼水，吃了，頭枕着土坷拉，

〔用〕破草帽蓋着臉，就那么睡一小覺。(小說)

例7的“那么”指代什麼呢？到底怎樣“睡一小覺”呢？就是“頭枕着土坷拉，〔用〕破草帽蓋着臉睡一小覺”，句中的“那么”就是指代前面的“頭枕着土坷拉，〔用〕破草帽蓋着臉”的。“那么”是“睡”的狀語；很顯然，它所指代的前面的〔用〕破草帽蓋着臉也應該是“睡”的狀語。（“頭枕着土坷拉”自然也是狀語，但它是主謂結構，跟這裡討論的句式無關。）

因此，這種格式的前一個動詞（連同賓語）是後一個動詞的狀語，並不是什麼“複雜謂語”的構成成分；把這種格式看做所謂“連動式”是不符合漢語實際的。

從語音的停頓上說，漢語的狀語和它的中心詞之間並不是全不能有逗號的。這種格式的前一個動詞既然是後一個動詞的狀語，它們之間也可以有逗號，例如：

8) 這時候孩子們已抱着滿懷的紅杜鵑花，跑了上來。(冰心：我的學生)

① 李榮編譯本，21頁。

② 這種格式，有的能加上“一面……一面……”，就成了聯合結構，與所謂“連動式”無關，本文不討論。《語法講話》認為“瞪着眼睛發呆”也可以說成“一面瞪着眼睛一面發呆”，其實“瞪着眼睛”在這裡就是“發呆”，不能分作兩回事來說。

③ 更正的說，這個“着”只表示前一個動作的“體”，而它的“時”却要依附於後一個動詞的“時”。

9) S 扑着袜子, P 同我抽着柳州烟, 喝着胜利红茶谈话。(同上)

10) 看见林先生苦着脸跑回来。(茅盾: 林家铺子)

林先生苦着脸, 蹣回到柜台里, 浑身不得劲儿。(同上)

例 8 的“已”是表过去时的副词, 跟“抱着”的“着”不能配合, “已”显然是后面动词“跑”的状语。在这种情况下, “抱着满怀的杜鹃花”也只能是“跑”的状语, 而它们当中有了逗号。例 9 “抽着柳州烟”和“喝着胜利红茶”应属同一成分。按上面的分析, “喝着胜利红茶”是“谈话”的状语, “抽着柳州烟”也应该是“谈话”的状语, 而它的后面也有了逗号, 而且这个逗号是必须有的。例 10 的两个“苦着脸”后边, 一个没有逗号, 一个有逗号。逗号的有无, 在这里使句式有了差别吗? 显然没有, 两个“苦着脸”都是表示后面动作情态的。由此可见, 逗号并不能改变这种格式中前一个动词的状语性质。

(二) “脱了鞋走进屋去”①

这种格式, 黎锦熙先生叫做“承接的复谓语”, 又说是“真正的连动”, 王力先生叫做紧缩式, 吕叔湘先生和《汉语》课本采用了《语法讲话》的说法, 叫“连动式”或“谓语的连续”。它的特点是:

(1) 两个动词之间, 可以用“就”一类表示关联的副词连接。例如:

1) 曾将军吃完晚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

(茅盾——《语法讲话》引)

2) 党民说毕就往外走。(巴金: 家)

3)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着小嘴唇。(茅盾: 林家铺子)

能插入关联词, 就说明它的结构比上一种格式的结构松散一些。

(2) 前一个动词的后边可以加添上“之后”、“以后”一类的词; 一加添上“之后”一类词, 这个动词的前边就可以再添上一个介时间的介词。例如:

4) 玉翠[]回来以后就天天直着脖子等昌林。(康濯: 春种秋收)

5) 这件事, 我[]到任以后就知道了。(《西门豹》——教材引)

可见前一个动词具有构成状语的可能的语法特点。

(3) 前边一个动词可以提到主语的前边。例如:

6) 瞅瞅四外没人, 玉翠就溜到了昌林的地里。(康濯: 春种秋收)

7) 看着 S 的高跟鞋在月下闪闪发光, 我就说: (冰心: 我的学生)

因此, 两个动词上可以很容易地都具有主语。②例如:

8) 曾将军吃完晚饭, 他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

9) 玉翠瞅瞅四外没人, 他就溜到了昌林的地里。

可见这种格式又具有成为复句的可能的特点。

总之, 一方面这种格式它的前一个动词有构成状语的可能, 另一方面, 它又有构成复句的可能。这两方面合起来才是它的全面而可能的语法特点。

从语音停顿上来看, 因为它的结构比较松散, 所以两个动词之间很容易加入个逗号。现在有很多人把其中没逗号的叫复杂谓语, 有逗号的就算复句, 这未免夸大了语音停顿对于区分单复句的作用。语音停顿自然是“句子”的重要标志之一, 分析语法结构时应注意它, 但是不正确地估计了语音停顿的作用, 就会给语法结构的分析造成错觉。有人曾评论过区分单复句的“逗顿异用说”, 不是没有道理的。本文不是讨论单复句界限的, 不想在这方面多谈; 要谈的只是逗号并不能改变这种格式的语法特点。如例 1 的“吃完晚饭”的后边没有逗号时, 能加入“以后”, 有了逗号, 仍然有这个可能。可见这种格式中, 并不因有了逗号便使第一个动词丢失了它构成状语的可能的语法特点。这个特点甚至在这第一个动词提到主语前边的时候, 仍然存在。提到主语前边, 一般是要用逗号隔开 (但不是绝对的), 可是它的后边仍然加上“以后”, 如例 1 就可说成“吃完晚饭以后, 曾将军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显然, 逗号并不能使这种格式的语法特点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一定要说逗号在这种格式里有作用, 那么逗号的作用也只在于增强这种格式成为复句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格式的两个动词如果都有了主语, 如例 8 和例 9, 成为两个分句之后, 它们当中一般是要有个逗号的, 所以这种格式中一有了逗号, 加进主语的可能性也就增强了。这样, 逗号的有无在这种格式中既是比较随便的, 而逗号又不能根本改变这种格式的语法特点, ③ 分析这种格式时自然就不能过分

① 这种格式, 我们限定只是确有时间先后的连续动作, 两个动作并没有时间先后的, 不包括在这种格式之中。

② 唐启运曾以“他说了又说” (吕叔湘先生引为“连动式”例句的) 不能说成“他说了他又说”, 来反对这种格式可以插入主语成为复句的说法。(《中国语文》, 1958 年 2 月号 84 页) 其实“他说了又说”的两个“说”是泛指, 只在叙述“说”这个动作重复进行。如果把后一个“说”换成“笑”, 就要成为“他说了又笑, 笑了又说”的句子, 来说明“说”“笑”交替进行, 不过两个“说”是同一个动作, 没法说作“他说(1)了又说(2), 说(2)了又说(1)”, 就成了这种表明同一个动作重复进行的格式。因此, “说了又说”实际上是联合结构, 不是有先后时间的两作动词的运用。

③ 如果说这种格式中的两个动词之间有了逗号, 比没有逗号时第一个动词有了一些被强调的意味, 似乎是跟后一个动词平行起来了, 那只是逗号的修辞作用所引起的意义上的变化。分析语法结构固然不能和意义割裂开, 但是语法分析和修辞分析不能混为一谈。

強調語音停頓的作用了。

(三) “越急越慌張”

这种格式，黎錦熙先生認為是“并行的复謂語”。王力先生叫它“緊縮式”。《漢語》課本叫“緊縮句”。

看这种格式的特点之前，首先須說明一点，就是“越…越…”(或“愈…愈…”)不一定連在同样的句子成分上面。例如：

- 1) 哈，我明白了，愈无用的人，愈應該著好看的衣服，对不对？(丁西林：一只馬蜂)
- 2) 牛衰期越短，蛻变得越快。(書)
- 3) 爭論得越認真，是非就越明白。(批評自我批評——教材引)

例1是連在主語的定語和謂語上的，例2是連在前一个分句的謂語和后一个分句的補語上的，例3是連在前一个分句的補語和后一个分句的謂語上的。

再看所要討論的句式：

- 4) 現在的人，心眼兒真是越過越大了。(朱自清：阿河)
- 5) 你当了十來年長工，甚也沒闢下甚，人家可是越發越發了。(馬烽：光棍漢)

例4的“人”是主語，下面是一个做謂語的主謂詞組，但是“心眼兒”的謂語却只有“大”一個詞，“過”并不能做它的謂語。那么“過”是什么成分呢？顯然，只能是狀語。例5的“可是”表示对上一个分句的轉折，这个轉折跟下面的“過”不發生關係，只跟“發”發生關係。可見在“越過越發”中“過”是從屬於“發”作狀語；不然，“過”在語意上既沒有轉折，“可是”這個轉折連詞就不能放在“過”的前邊，而一定要攔在“過”的后邊。

無須多來舉例，就可知这种格式是偏正結構而不是并行政式；更明確地說，它的前一个動詞(或形容詞)也是后一个動詞(或形容詞)的狀語。这就是这种格式的第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这种格式当中还可以加入“就”等表示关联的副詞，如“越急就越慌張”。一加上“就”等副詞，这种格式的結構就比較松散了，也就有了成为复句的可能語法特点。例如：

- 6) 他…越没办法〔〕也就越不放心。(《語法講話》引)
- 句中〔〕处若添上个“他”，前后两个動詞(或形容詞)都有了主語，就成为复句了。

因此，这种格式也是：一方面它的第一个動詞(或形容詞)可以是狀語，一方面有构成复句的可能。

从語音停頓上看，假若“越…越…”連的只是两个動詞，並沒有其他附加或連帶成分(如例4例5)，它們之間一般都不能用逗号隔开。如果两个動詞帶了狀

語、補語或賓語，前后两部分变得較复杂时，它們当中就往往有了逗号，如例6就可以加入个逗号。两个動詞不帶和帶了狀語、補語或賓語，只是同一格式由簡單到复杂的变化，并不能因为有了狀語、補語或賓語就成了另外一种格式。在結構較复杂时加入了逗号，其实並沒有也不能改变它的語法特点。逗号在这里至多只是同在上一種格式中一样增强了这种格式成为复句的可能性，并不是决定句法特征的主要因素。

(四)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照《漢語語法教材》的体系看来，黎錦熙先生把这种格式認為是“副動結構”。王力先生也放在“緊縮式”里。《漢語》課本叫“緊縮句”。

这种格式的特点也有两个：

(1) 前一个動詞的后面，可加上“的时候”或“之后”一类的詞；一加上这些詞，这个動詞的前邊就可以加上一个介時間的介詞。例如：

- 1) 〔〕打得贏的时候就打，〔〕打不贏的时候就走。
- 2) 我〔〕死了以后就不管了，〔〕不死的时候就不能由別人擺布我。(就《語法講話》例句加添而成)
- (2) 两个動詞都可以有主語。例如：
- 3) 你打得贏你就打，你打不贏你就走。
- 4) 我死了我就不管了，我不死我就不能由別人擺布。

因此，这种格式也是：一方面它的前一个動詞具有构成狀語的可能的語法特点，另一方面具有构成复句的可能的語法特点。

从語音停頓上看，逗号在这种格式中更是可有可无的。原格式中既可以加入逗号，前一个動詞部分成为狀語时(如例1、例2)，也还可以加入逗号；更特殊的是(如例3、例4)成为复句之后也不一定非加入逗号不可。逗号之不能改变其語法特点，更是清楚的了。

总起来說，上面四种格式其实只有两类：第一种格式是一类，它只能是狀動結構，不是什么“連動式”。第二、三、四种格式是一类，它們都具有兩重性質，可以是狀動結構，同时也可以两个動詞都具有主語成为复句。这三种格式如果做一个句子的謂語时，这种句子其实就成了一种介乎單句与复句之間的句式。說它是單句的复杂化固然未嘗不可，但是把这种謂語叫做复杂謂語却說不通，因为它已經复杂到具有复句的特点了。近来把第三、四种格式做謂語的句子說成是复句的緊縮的人似乎愈来愈多了，这也是可以的，只是第二种格式做謂語时也必須同样处理，因为如上所述，它們的語法特点都相同。但是把它們叫做“連動式”就不符合它們的語法特点了。

列举和分承

王希杰

所谓列举和分承,就是在一般文章或一句话中,前面先提起两件、三件或更多的事,后面按照前面提起的次序,分别说明。比如:

- 1) 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他和把总晒了气了。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鲁迅:阿Q正传)
- 2) 我看这些材料中,押地,不实行减租,喜富不赔款,村政权不民主,这四件事最大,因为这四件事上吃亏的是大多数。咱们要斗争他们,就要叫恒元退出押地,退出多收的租,叫喜富赔款,叫县里判决的数目赔款,彻底改造村政权。(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一般说来,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列举的是两件事的比较。所以,朱永毅同志称之为“双提和分承”。双提的情况固然多,非双提的列举两件事以上的情况也很不少。比如:

- 3) 钢铁方面的小型企业和小型设备、土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带动了大型企业、大型设备、洋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带动了整个工业战线上的群众运动。(周恩来: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 4) 在一九五八年,我国的钢、煤、发电量和棉纱已经分别跃居世界的第七位、第三位、第十四位和第二位了。(周恩来:伟大的十年)

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列举的不是两件事,而是三件事、四件事,“双提和分承”就概括不了这一内容了。所以,我认为把这叫做“列举和分承”会更合适些。

客观事物的复杂,不仅表现在一组事物之间有区别有联系,也表现在几组事物之间有共同的区别和联系。比如:

- 5)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个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鲁迅:仿自由书·电的利弊)

这个例子举了三组现象,说明一个共同的东西:“中外用法之不同”(鲁迅指的当然是旧中国)。假如我们把一组事物称作为一个项目的話,这就可以称之为“多项列举”。

分承可以是一次的,也可以是两次以上的。在一次分承中,除“一般分承”外,还有一种和“多项列举”相对应的“多项分承”。比如:

- 6) 由于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就更充分地发挥了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也使他们的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红旗 1959年21期,7页)

但假如换一种说法,把分承中的两个项目(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理论和实践)分开来说,就成了这样的情况:

- 7) 我们懂得,依靠群众还是脱离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是不搞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分歧点,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革命无产阶级路线和其他非无产阶级路线的根本分歧点。(同上,3页)

在7)中,列举了两次:“依靠群众”和“脱离群众”是一次,“大搞群众运动”和“不搞群众运动”又是一次。“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分歧点”是一次分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革命无产阶级路线和其他非无产阶级路线的根本分歧点”是对列举的第二次分承。这样,就能进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质,深刻地说明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这种多次分承,又有两种情况:(1)第一次和第二次分承都是直接说明列举的事物的,我们称为“直接分承”;(2)后一次分承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

- 8) 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左传:秦晋之战)

很清楚,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没有第一次分承,则第二次分承就失去了依据。这个例子列举的是“轻”和“无礼”,但第二次分承的却是“脱”和“不能谋”,它和

(下转 28 页)

論語言與言語(上)

高名凱

方光滌、施文瀾兩位先生在他們的《言語有階級性嗎》^①一篇論文里提出一個論點，認為語言和言語都沒有階級性。他們並且在這篇論文里對我發表在《中國語文》1958年5月號的《文風筆談》和1958年10月號的《批判我在語言學工作中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中提到的語言沒有階級性，言語有階級性的論點提出批評，認為我的論點“已經在我國語言學界的某些人思想上引起了混亂”(24頁)。他們既然認為我的論點竟有这样的扰乱思想的作用，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在這裡和方、施兩先生討論這個問題，並就正於讀者。

方、施兩先生在他們的論文里首先敘述德·索緒爾^{*}區分語言與言語的論點，並對它加以批判，然後就根據(?)蘇聯語言學家A. И. 斯米爾尼茨基在《語言存在的客觀性》一文中所提出的論點，斷言語言和言語都沒有階級性，再據此來批判我，認為我“陷入了自己批評過的索緒爾的唯心主義泥坑中去了”(26頁)。這裡，我們暫且不談方、施兩先生對德·索緒爾的論點是如何論述的，我們不妨先看一看方、施兩先生所根據的斯米爾尼茨基對語言和言語的看法究竟如何。

詳細地研究了斯米爾尼茨基的論文^②之後，使我驚異的是方、施兩先生竟至於誤釋了斯米爾尼茨基的論點，並且在某些地方似乎是有意地隱去了斯米爾尼茨基的主要論據。方、施兩先生說：

斯米爾尼茨基認為索緒爾所理解的那種“言語(parole)是不存在的，實際上存在的是索緒爾的“言語活動”(langage)。^③他也區分“言語”，但是他所指的“言語”不等於索緒爾的“言語”(parole)，他所指的“言語”是與索緒爾的言語活動(langage)相當的，在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言語這一概念中包括著語言和“超語言的剩餘部分”，這種“超語言的剩餘部分”可以是屬於個人的(個人發音的錯誤，噪音特點，用詞不當……等)，也可以是屬於社會的(如社會公認的詩歌韻律……等)。言語既然包括了語言和“超語言的剩餘部分”，我們知道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那末，“超語言的剩餘部分”是不是有階

級性的呢？我們認為“超語言剩餘部分”中的社會因素的詩歌的律等是不可能具有階級性的，斯米爾尼茨基對“超語言剩餘部分”個人因素的說明也都是有關語言的表達方式，與個人的思想和世界觀無關的，所以也不能具有階級性。……我們認為斯米爾尼茨基所指的“言語”(相當於索緒爾的言語活動)是不同於一般人所說的“說話”，因為一般人所說的“說話”，是把思想內容也包括在裏面的。象那種運用語言所產生的具體產物，斯米爾尼茨基把它叫做“言語作品”(26頁，著重點是原文所有的)。

不錯，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言語相當於德·索緒爾的langage，它包括德·索緒爾所說的langue和parole。但是，斯米爾尼茨基是如何解釋他自己所了解的“言語”的呢？斯米爾尼茨基說：

說話的過程以及無數次說話中所談到的，所說出的和所听到的內容，也就是語言學家的直接研究材料。這大致相當於德·索緒爾所謂的langage，它直接產生於日常生活中，亟需有一個專門名稱——言語(речь, langage, Rede, speech)。^④

這裡，斯米爾尼茨基明明指出他所說的言語是說話過程以及說出的和听到的內容，然而方、施兩先生說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言語並不指“說話”，甚至於斯米爾尼茨基對言語中的個人因素的說明也只涉及表達方式，並不涉及內容。對斯米爾尼茨基的論點的這種誤釋是令人驚異的。

方、施兩先生所以歪曲斯米爾尼茨基的論點，因為他們在斯米爾尼茨基的著作里找到“言語作品”這個術語，他們就借著這個術語來作文章，認為“言語作品”和“言語”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儘管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言語作品”包含有說話人的思想內容，有階級性，

① 見《南京大學論壇》，1959年第4期，24—26頁，又45頁。以下只在引文後注出頁次。

* F. de Saussure 的譯名有好幾種，高名凱先生一向譯為“德·索緒爾”。為了討論方便，在這篇文章里我們一律改為“索緒爾”——攝音。

② 斯米爾尼茨基：《語言存在的客觀性》，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五輯，1950年，中華書局，113—140頁。

③ 德·索緒爾所說的langage 應當譯為“語言機能”，不是“言語活動”。

④ 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五輯，120頁。著重點是我加的。

但是言語并不包括說話人的思想內容，沒有階級性。然而斯米爾尼茨基如何解釋“言語作品”呢？斯米爾尼茨基說：

從語言和言語作品（就是本文中規定的那種意義下的言語）^①之間的這些關係，應該認為整個的具體句子（由一定的詞所組成，而又具有一定結構方式的句子）是言語單位，而不是語言單位，因為這些句子都是在某種程度上完整而孤立的言語作品。^②

這裡，斯米爾尼茨基拿加括弧的方式對他所說的“言語作品”作出注解，說它就是上面所述的言語，並且把作為言語作品單位的具體句子就叫做言語單位。這證明了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言語作品”是包括在他所說的“言語”之內的，因之，有時就等於他所說的“言語”。斯米爾尼茨基並且認為這作為言語單位的具體句子是有階級性的。他在《語言存在的客觀性》里說：

但是“言語作品”（此地指具體的句子）却是有所謂而發。表達一定的思想內容，它們對不同階級往往並不是一視同仁的。^③

他又在他的另外一部著作里說：

應當非常重要的指出，由一定的詞所組成，而又具有一定的語法形式的具體的句子（即句子）已經是言語作品，就是說，不是語言的組成部分或單位，而是某些人在某種條件下，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對語言的運用所產生的產物；它們並不屬於語言（雖然從語言變來的），而是屬於在每一個具體的場合中運用語言的人的活動範圍，因之，在階級社會里，它們就常常有一定的階級傾向。^④

可見，方、施兩先生以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言語作品”是被排斥於“言語”之外的為理由來證明（？）言語并不包括說話的內容，因之，沒有階級性的論點，是對斯米爾尼茨基的理論的誤解。

不但如此，方、施兩先生也注意到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超語言的剩餘部分”，並且以這種“超語言的剩餘部分”不具有階級性為理由來證明言語沒有階級性，但是他們卻似乎是有意识地不把言語作品列在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超語言的剩餘部分”之內。他們只以“個人發音錯誤，嗓音特點，用詞不當……等”和“社會公認的詩歌韻律……等”來轉達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超語言的剩餘部分”所包含的內容。方、施兩先生所用的“……等”這個省略號是耐人尋味的，因為被他們拿“……等”這個符號來代替或抹殺的卻正好有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言語作品”。斯米爾尼茨基非常明確地說：

在言語中除開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以外還有某種“超語言的剩餘部分”，這種“超語言的剩餘部分”本身又是多種多樣的，而且也不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剩餘部分”基本上包括下面幾個內容：（甲）每個人在使用語言時的特點……（乙）某些不直接屬於語言基本職能範圍

內的語言要素……（丙）某些言語作品，它們通過語言而形成，但已經整個超出于語言範圍之外，因為它們專門表達某一生活領域中的思想，而語言則為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活動服務，充分彼此。^⑤

這裡，斯米爾尼茨基雖然說“某些言語作品”，沒有說出多少言語作品，但是他卻明確地指出，包含有思想內容的言語作品之中有的就被包含在“超語言的剩餘部分”之內。斯米爾尼茨基所以只說“某些言語作品”，不說“全部的言語作品”，因為在他看來，有的言語作品可以反復出現，成為語言要素。它們雖然是言語作品，但已轉入語言，成為語言的成分，因之，不是“超語言的剩餘部分”。斯米爾尼茨基說：

在個別場合下，具有句子形式的言語單位也能加入語言體系之中。這是因為某些具有句子形式的言語作品（句子）為人們反復使用後，喪失了“引証”的性質，而我們使用它們早已不是故意重復這些句子，而是使用這些句子來表達自己的思想。^⑥

換言之，除了類似的一部分言語作品之外，其他的言語作品就是屬於“超語言的剩餘部分”的。然而方、施兩先生卻以“……等”這個方法把它們全部踢出“超語言的剩餘部分”之外，而斷言說：“斯米爾尼茨基對‘超語言的剩餘部分’個人因素的說明也都是有關語言的表達方式，與個人的世界觀無關的，所以，也不可能具有階級性。”更令人不解的是，方、施兩先生並不是沒有看到斯米爾尼茨基的這一段話，他們甚至於引証了這一段話的一部分，他們說：

因為一般人所說的“說話”，是把思想內容也包括在里面的。象那種運用語言所產生的具體產物，斯米爾尼茨基叫做“言語作品”……這種言語作品，“它們通過語言形成，但已經超出語言範圍之外，因為它們專門表達某一生活領域中的思想。”（25頁，引號里的語句就是他們引証斯米爾尼茨基的話的。）

但是他們似乎是有意识地不提這一段話正是在斯米爾尼茨基說明某些言語作品屬於“超語言的剩餘部分”的範圍之內時所說的。

我們知道德·索緒爾所說的 *langage* 是包括 *langue*（語言）和 *parole*（德·索緒爾所說的“言語”）

① 即上述斯米爾尼茨基對“言語”所下定義：“說話的過程以及無數次說話中所談的，所說出的和所听到的內容。”

② 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五輯，125頁。着重點是原文所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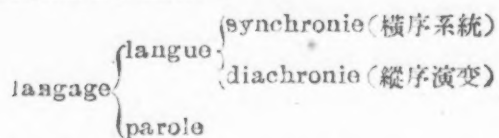
③ 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五輯，126頁。

④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в слове», 見《Вопросы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АН СССР, 1955, стр. 12.

⑤ 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五輯，136—137頁。

⑥ 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五輯，129頁。

兩方面的。他在《普通語言學教程》里曾經畫出一個圖解來說明他所說的 *langage*, *langue* 和 *parole* 的關係。下面就是這個圖解：①



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言語”既相當於德·索緒爾的 *langage*, 既包括 *langue* 和 *parole* 兩者, 那麼, 我們就以可看看德·索緒爾所說的 *parole* 究竟包含不包含說話的內容在內。他說：

它 (按：即言語) 是人們所說的話的總和。② 里面包括：(甲) 依賴於說話的意志的個人的組合 (按：不是組合的形式)。(乙) 實現這些組合所必需的同樣是與意志有關的發音動作。(38 頁)

可見德·索緒爾所說的 *parole* 也包括有言語作品 (即方、施兩先生所說的“說話”) 在內, 而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相當於德·索緒爾的 *langage* 的“言語”之包括“言語作品”在內, 也就是無可置疑的了, 因為他所說的“言語”包括德·索緒爾的 *langue* 和 *parole* (即包含有“言語作品”的 *parole*) 兩部分。當然斯米爾尼茨基只說他的“言語”相當於德·索緒爾的 *langage*, 但他却明顯地說, 在他所說的“言語”和德·索緒爾所說的 *langage* 的近似之處當中, 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即包含有被德·索緒爾列在屬於 *langage* 之下的 *parole* 里面的人們所說的有內容的“話”, 也就是他所說的“言語作品”。可見, 斯米爾尼茨基所說的“言語”是包括有人們所說的“話”, 亦即他所說的言語作品。不過, 因為他把言語解釋為“說話的過程 (按：即言語行為) 以及在無數次說話中所談到的、所說出來的和所聽到的內容 (按：即言語作品)”, 既指“言語行為”, 又指“言語作品”, 所以, 在某種場合下, 他有必要拿“言語作品”這個術語來同“言語”區別開來,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所說的“言語”並不包括“言語作品”在內。

二

不难看出, 方、施兩先生所以要歪曲斯米爾尼茨基的論點, 是有原因的。除了他們要借此來否認語言有階級性之外, 他們還害怕, 把言語說成包括言語作品在內就會使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模糊起來。他們說：“事實上我們如果把言語作品的具体思想內容也包括在言語里的話, 那麼我們就會把語言科學擴大到一切科學、文學、藝術研究的領域中去, 因為不論是文學著作、科學著作、哲學著作都是通過作者的言語表達出來的。”(26 頁)

其實, 這是不必要的憂慮。為什麼把言語作品的具体思想內容也包括在言語里, 就會把語言科學擴大到一切科學、文學、藝術研究的領域中去呢? 這其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呢? 語言科學研究的對象應當如何的規定是一回事, 言語是否包括言語作品, 言語作品是否包括言語作品的具体思想內容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們說文學包含有形式一面和內容一面, 文學的形式是語言, 文學的內容是思想意識, 我們難道就因此而認為文學的研究對象必須擴大到語言學的研究和哲學的研究領域中去嗎? 如果在文學的研究過程中, 人們談到文學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識, 或文學的語言藝術, 這就算是干涉哲學或語言學的“內政”嗎?

客觀的事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一個具体的事物往往可以包含各種不同類型的組成要素, 科學的分工正是從這複雜錯綜的現象中找出同類的現象來加以綜合和抽象的研究的。一個科學部門的研究對象並且是隨着科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動的。幾何的圖形存在於宇宙間各個具体事物里, 宇宙間的各個具体事物也不只具有幾何圖形這一特點, 然而我們卻可以把幾何圖形從各個不同的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來, 加以綜合的研究, 建立了幾何學。難道承認雪花里具有某種特定的幾何圖形, 這就把地球物理學的研究擴大到幾何學的范围而使其失去獨立的存在嗎? 阿里斯多德時代的物理學和今天的物理學顯然有不同的內容。難道聲音和光綫都不是物理現象嗎? 為什麼我們就分出聲學和光學? 難道承認聲音和光綫是物理現象, 這就使得我們把物理學的研究擴大到聲學和光學的領域中去, 而使聲學和光學失去其為獨立的科學的存在嗎? “獨立”並不等於“孤立”。根據辯證唯物論的觀點, 我們儘管要使一門科學具有獨立的特點, 但是同時要把各門科學之間的聯繫建立起來, 要把某一科學的研究對象和其他科學的研究對象之間的聯繫說個明白。方、施兩先生不是也說：

我們認為語言學所要研究的只是言語作品的表達形式, …我們所理解的言語 (言語作品的表達形式)不僅

①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31, Paris, p. 139. 以後所引德·索緒爾的話不另注明出處的都指這本書, 只在引文後注明原書頁碼。

② 原文是 *elle est la somme de ce que les gens disent*, 方、施兩先生把它譯作：“人的說話的總和”, “說話”云云, 意義不明確, 它既可以只指說話的行為, 又可以兼指說話的行為和說話的內容, 然而, 德·索緒爾的原文 *ce que les gens disent* 却明明指的是人們所說的東西, 即所說的話。這段的重點是我加的。

是包括了語言的物質外壳——語音、詞與詞的組合的規律和造句的格式，而且也包括了詞匯的客觀意義，因為這些都是屬於語言的。(26頁，着重點是我加的。)

方、施兩先生既認為語言學所要研究的只是言語作品的表達形式，並且是“屬於語言”的言語作品的表達形式，那麼，為什麼他們又承認言語中有不屬於語言的“超語言的剩餘部分”呢？為什麼這“超語言的剩餘部分”就不必成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呢？而承認言語中有不屬於語言的說話者的思想內容，這說話者的思想內容就必得成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因之就必得把語言學的研究擴大到所有科學的領域中去嗎？

可見，就連方、施兩先生也承認規定語言學的研究範圍並不阻止人們去分析語言和言語的不同，去論述言語中的不屬於語言的“剩餘部分”；那麼，在分析言語的時候，把言語所包含的思想內容歸入言語中的“超語言的剩餘部分”，正如斯米爾尼茨基所做的，就不能被認為是把語言的研究擴大到一切科學的領域中去了。問題在於：給某種科學規定它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範圍是一回事，說明這種對象和別的主體的差別及其彼此之間的不同特點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有聯繫，但不彼此排斥。

三

當然，方、施兩先生對斯米爾尼茨基的理論的歪曲，只能說明他們的“言語沒有階級性”的理論是缺乏論據的，並不能證明言語有階級性。因此，我們還要進一步從正面的角度來闡明語言沒有階級性，言語有階級性的道理。

語言學家們很早就注意到語言和言語的區別。德國的語言學家方·洪堡特(von Humboldt)早就在十九世紀初年提出過有區分語言和言語的必要，他認為語言是活動，是形成思想和表達思想的創造性的機關，並且說：

從嚴格的面目最相近的意義上來說，這個定義適合於日常應用語言中的活的言語的每一個動作，可是，從本質上和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也可以把語言只理解為一切所講的話的總和。然而通常所說的語言在詞典和語法書所提供的一大堆里只包含有活的言語所產生的個別的元素，却往往在數量上不完全，並且往往需要新的勞動去認清從言語里產生出來的特性，去形成對活的言語所有的可靠的觀念。……活的言語是首要的和真正的語言財產；如果我們要走進活的語言本質里邊來的話，在研究語言的情況之下，我們就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忘記這一點。詞和規則的零散存在是科學分析的機械工作的僵死的產物，而不是語言的天然財產。^①

這裡，方·洪堡特明確地指出語言是一切所講的話

的總和，而言語則是日常應用語言的每一個活的動作。儘管方·洪堡特對語言和言語的區別還沒有精確的分析，但是他已經注意到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在近代語言學的历史里，第一個給語言和言語的區別作出有系統的理論的解釋的，是德·索緒爾。他在分析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時，認為人類的語言機能(langage)可以分為兩個對立的部分，一是語言(langue)，一是言語(parole)，語言是社會現象，而言語則是個人現象。他說：

(語言)是某一社會集團全體成員通過言語實踐而獲得的一種寶庫，是可能存在於每一個人腦子裏，或說得更正確些，是存在於一群人的許多腦子裏的一個語法系統；因為在任何一个個人的腦子裏，語言總是不完整的，它只在群眾中才是完整的。

又說：

在把語言從言語里分別開來的時候，人們同時就1)把什麼是社會的從什麼是個人的當中區別開來；2)把什麼是主要的從什麼是次要的，多少是偶然的东西當中區別開來。語言不是說話者的一種機能，而是個人被動記錄下來的產物，它從來不假定預先的思考，而思考的活動也只有在我們將予第170頁以及以下各頁②所要討論的類別的活動中才參與其中。相反的，言語是個人的意志和智慧的一種活動，其中可以分為：1)說話者應用語法規則去表達個人思想時所做出的組合；2)允許個人把這些組合表面化的心理——物理的機制。(30頁)

這裡，德·索緒爾一方面把語言看作是社會的產物，社會的現象，把言語看做是個人的產物，個人的現象，一方面把他所說的“語言”具體地看成群眾腦中存在的語法系統，把他所說的“言語”具體地看成個人為了表達思想所做出的組合，以及使這組合表面化的心理——物理的機制。這種組合是什麼呢？德·索緒爾在另外的地方說：

語言以貯藏於每一個人腦子裏的印迹的總和的形式存在於集體中，有點象一部詞典，印出相同的冊數分派給每一個人使用，語言的這種存在形式可以拿下面的公式來加以表明：

$$1+1+1+1\cdots=1(\text{集體的樣本})\textcircled{3}$$

言語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出現在這個集合體里呢？它是人們所說的話的總和，里面包括：1)依賴於說話者的

①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Итоги обсуждения вопросов стилистики» — 文中所引的；見《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1955年第1期，76頁。着重點是我加的。

② 指原書頁數。

③ 這個公式的意思就是說：貯存於每一個人腦子裏的語言系統加在一起，仍然等於這同樣的語言系統，不過這後者是集體的語言系統，而貯存於每一個人腦子的語言系統只是這集體的語言系統的復本罷了。

意志的个人的組合; 2) 实现这些組合所以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动作。(38 頁)

这里, 他明确地说出他所說的言語指的是人們所說的話的总和, 包括个人所組成的言語組合和发音。

德·索緒尔的理论具有严重的唯心主义的錯誤, 这錯誤主要表现在: 1) 在社会性的問題上把語言和言語对立起来, 2) 在物質性的問題上把語言的物質外壳(发音)排斥于語言之外, 而把它看成个人的言語。

正如謝尔巴所說的, “語言系統和語言材料——这只是在試驗中的某种言語活动的唯一的不同的方面”, ① “一切不发源于語言系統的, 不是在語言系統中潜在地奠定起来的真正个人的东西, 在不能为自己找到反应, 甚至于不能得到了解的情况下, 要永远的灭亡”, ② “那些常常被認為是个人的差別的东西, 其实是集体的差別, 即同样受到社会制約的东西”。③ 德·索緒尔把語言和言語在社会性的問題上对立起来, 是对語言和言語的严重的誤解。斯米尔尼茨基也同样地批評德·索緒尔說: “語言乃是言語的一个組成部分, 并且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④ “言語中的‘超語言剩余部分’既包括个人的因素, 也包括社会的因素, 这一点就不同于德·索緒尔的完全是一种个人現象的言語”。⑤ 为什么我們不能把語言和言語这样地对立起来呢? 这是因为, 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語言既是交际工具, 我們就不能把它理解为交际行为或由交际行为所組成的言語組合。就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每一个运用語言的人都意識到他所学习得来的語言并不是他所有的, 而是其他的人所共有的, 而是以存在于全民社会中一切个人嘴里所說出的, 具有声音的物質外壳的言語之中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的, 在交际的場合中, 他是运用語言这个工具去組成他所要說的話的。具体地說, 在人們进行交际的时候, 人們是要运用全民社会公有的一套詞汇系統(包括單詞、复合詞、在句子里起詞的作用的詞組、熟語、成語、句子成分等)和語法系統(包括作为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的物質外壳的語音系統)去組成自己所要說的話的, 而在学习語言的过程中, 人們也正是学习全民社会公有的这一套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的。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德·索緒尔把語言具体地看成“群众腦中存在的一个語法系統”是部分正确的, 因为德·索緒尔所說的語法系統事实上就是語言系統。⑥ 某一全民社会全体組成員所有的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就是作为这一社会的交际工具的語言。魯賓斯坦在他的《論語言、言語和思維的問題》中說:

語言, 按它的性質來說是民族的; 是該民族的人民社会性地加工过的詞汇和表現为用詞造句的一定的規

則(規律性)的語法構造。⑦

事实上, 当我们說“汉语”或“俄语”的时候, 我們所指的就是汉语或俄语的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包括作为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的物質材料的語音系統), 沒有人会把由汉语的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組織而成的某一个人所說的話或所写的文章、書籍等理解为汉语, 而只把它理解为他用汉语所說出或所写出的东西。《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中有一段記載:

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 故問那人曰: “床上睡着何人?” 答曰: “都督請子翼同寢, 何故忘却?” 瑜嘆曰: “吾平日未嘗飲酒, 昨日醉后失事, 不知曾說甚言語?”

这里周瑜所說的“不知曾說甚言語”, 沒有人會把它理解為“說什么語言? 說的是汉语, 还是俄语?” 而是指的用某种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所組成的具体的話。虽然我們今天不大把“言語”这个詞用在这个意义上, 但是我們今天也不会把“我簡直不懂得你說的是什么話”理解為“我不知道你說的是汉语还是俄语”, 这里所說的“話”就指的是“言語”。可見, 語言和言語的區別是事实上存在的, 是人們所意識到的客观事实。語言和言語的區別还可以在理論上使我們了解語言是交际工具这一原理。人們的說話行为絕不能被理解為交际工具, 因为行为并不等于工具。我們可以运用笔作为書写工具来写字, 但是誰也不会把写字看成笔, 也不会把写成的字看成書写工具。我們說語言是交际工具, 这句话就意味着我們并不把它看成交际行为或这行为所組成的每一句话。所以把語言和言語区别开来, 不但是可能的, 并且是理論上必要的。問題在于: 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而認為語言是社会的, 言語是个人的。在这个問題上, 德·索緒尔的理论显然是錯誤的。正如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 言語是人們运用語言工具所組成的, 它包含有語言的成分, 因为言語就是用語言的詞汇成員, 依照語言的某些語法規則組織起来的东

① П. В. Шерба: «О трех аспектах языковых явлений и об эксперименте в языковедении», 見《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1931, отд. — 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Наук, № 1, стр. 115.

② 同上, 118 頁。

③ 同上, 124 頁。

④ 見《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五輯, 191 頁。

⑤ 同上, 122 頁。

⑥ 德·索緒尔曾經反对傳統語言學分別詞汇和語法的办法, 而認為語言系統就是語法。參閱他的《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33—137 頁。这里我們不必討論他的这种看法是否合理。

⑦ С. Я. 魯賓斯坦: 《論語言、言語和思維的問題》, 見《語言學譯丛》1959 年第 1 期, 44 頁。

西，这些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就存在于言語之中，作为它的一个組成部分，言語因之也就包含着具有全民性的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①不但如此，言語既然是人們在交际場合中对言語这一交际工具的运用，言語本身也就是一种社会現象，因为交际本来就是一种社会活动的現象，而人們在这活动中所組成的言語組合也正是为了讓其他的人理解，并且能够为其他的人所理解的。所以，德·索緒尔把言語看成完全属于个人的現象，是錯誤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問題，我們也可以說言語中也包含有个人的成分，但这里所指的个人成分就是另外一种含义来理解的。它指的是在組成言語組合时个人所运用的非語言的成分，即不是語言詞汇系統或語言語法构造中所有的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以及語言所有的发音状态等，例如个人所有的特殊的詞語或特殊的語法成分，以及特殊的发音等。不过，这只是言語所具有的部分的現象。不能因此而說言語是完全同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相对立的个人現象。

德·索緒尔把发音看成个人的言語現象，这又是他的一个严重的錯誤。他尽管把語言說成社会現象，但是他却忽視了这一社会現象所以能够存在的物質基础。他認為語言是由一堆符号組成的系統，但是这些符号却是心理的：他認為符号(signe)是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的結合体，由能指和所指联系起来，語言符号的能指是听觉印象，它的所指是概念，这两个被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是心理現象(98—100頁)。他說：

語言符号不是联系一个事物或一个名称，而是联系一个概念和一个听觉印象(image acoustique)，这后者并不是物質的声音，純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們的感覺給我們提供証据的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如果我們終于把它叫做“物質的东西”，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称呼它的，并且是和联系的另外一端，一般的說更为抽象的概念相对而言的。所以，語言符号是具有两个对立面的心理要素。(98—99頁)

德·索緒尔既認為語言是符号系統，又把这符号系統看成心理現象，尽管他說这心理現象是社会集体的心理現象，他却不能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应当指出，德·索緒尔注意到語言的存在与人类大腦的結構和大腦的生理活动有关，这是唯物論的見解。但是，正如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他把“語言从言語，从言語的物質音响中完全割裂开来，并且把語言看作仅仅是一种心理現象(虽然語言和任何心理現象一样，只是作为大腦功能而存在)，所以他成了唯心主义者”。^②要知道，正是語言的物質音响使語言成为人們在社会中可能由听

觉来接受而被理解的交际工具，也正是这語言的物質音响使語言具有物質性，具有客观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发音活动仅仅看成个人的言語行为，把語言符号看成心理現象。德·索緒尔說：

当我们观察我們自己的語言机能的时候，我們的听觉印象的心理特点就很清楚地呈現出来。我們不必轉動我們的嘴唇和舌头就能够对我們自己說話或默誦一首詩。因为对我們來說，語言中的詞都是听觉印象，我們必須避免談論它們所由組成的“音位”。这个術語(按即“音位”)指明一种发音动作，它只适合于說明說出口來的詞，只适合于說明內部印迹在談話中的現實化。說到一個詞的声音和音节的时候，只要我們記住它指的是听觉印象，我們就可以避免这个誤会。(98頁)

他的論証缺乏科学的根据。現代心理学的研究証明，人們的語言机能是由言語运动神經来执行的，不是由听觉神經来执行的，就是在所謂內部言語(即德·索緒尔所說的“对我們自己說話或默誦一首詩”)里，言語的运动神經也在活动。苏联心理学家波罗夫斯基(Боровский)的言語器官电生理学的研究証明了这一点。^③当然听觉在人类的語言机能中也起作用，那是在学习語言或听別人說話的时候起作用的；决定語言的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它，而是言語运动活动。这里，正如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德·索緒尔把語言和人們对語言的知識混为一談了。^④我們必須把語言的存在和語言在說話者的意識中的反映区别开来。沒有語言的客观存在就不可能有对語言的反映，因之，也不可能对語言的知識，而这語言的客观存在則有賴于語言的音响，虽然在学会語言之后，我們也可以在某种場合中不把話“說出口來”，进行內部的言語活动。

所以，尽管德·索緒尔正确地提出划分語言和言語的必要性，他对語言和言語的理解却包含有許多不正确的看法。

在德·索緒尔之后，德·索緒尔的信徒們曾經企图进一步地解釋德·索緒尔的語言和言語的理論，但是他們的更进一步的發揮並沒有使这論点更加明确。布拉格学派領袖杜魯伯茨可伊(N. S. Trubetzkoy)在發揮德·索緒尔的理論時認為，具有功能特点的因素是語言的要素，不具有功能特点的因素是言語的要素。

① 參閱斯米尔尼茨基《語言存在的客觀性》，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五輯，121—122頁。

② 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五輯，118頁。

③ 參閱B. И. 馬希尼科《巴甫洛夫关于两种信号系統的學說》，科學出版社，1956年，16—18頁。

④ 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五輯，130頁。

案。在批評齊維爾納 (E. Zwirner) 企圖以不同發音的變體所做的統計分析來確定語音規範時，杜魯伯茨可伊曾經說：

這裡，齊維爾納陷入了錯誤。從他的語音格律分析法里所能得到的，絲毫也不是說話者在發出或聽到一個特定的聲音時所要參考的規範。這的確是些“規範”，但這是另外一種含義的規範：進行發音的規範，實現發音的規範，總之一句話，言語的規範，而不是語言的規範。不消說，這種規範只能有平均數的價值，我們不能夠把它和語言的價值混為一談。^①

這裡，杜魯伯茨可伊的意思就是說，具有社會交際功能的要素是語言的要素，不具有交際功能的要素，雖然也出諸人們的口，却不是語言的要素，只是言語的要素；語言的規範是以具有交際功能的要素為準的，不是以個人口里說出的話的平均的情況為準的。當然，齊維爾納以統計的數字為根據來規定語言規範的論點是錯誤的，語言的規範並不能拿個人言語中所具有的特點的平均數來加以確定，但是杜魯伯茨可伊顯然也把語言和言語對立起來，看不到語言是以存在於全民社會全體組成員口里說出的，具有聲音的物質外殼的言語之中的方式存在於社會之中的，語言是言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言語中也存在有具有交際功能的要素。

日內瓦學派語言學家薛施藹 (A. Sechehaye) 在論德·索緒爾的論點時認為有必要區別“言語本身” (parole proprement dite) 和“經過組織的言語” (parole organisée)，認為“言語本身”是人類的一般的表達本能，而“經過組織的言語”則是通過語言中介而形成的表達，“言語本身”是第一性的，語言和“經過組織的言語”都是第二性的。^② 這裡，薛施藹把問題弄得更加模糊起來。人類有表達的本能，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只有表達的本能並不能創造出語言系統，也不能產生“經過組織的言語”，語言的系統是人們社會的產物，離開了社會，人們縱使有表達的本能，也不能產生語言系統，因之也就不能產生運用語言的言語，何況既是“言語本身”，它就似乎可以直接產生“經過組織的言語”，為何這後者反而要通過語言而形成，而人們卻有形成語言的語言本身或組織本能？

哥本哈根學派的叶姆斯列夫 (Ch. L. Hjelmslev) 發揮了德·索緒爾的理論，認為語言可以從三個角度加以理解：1) 不依其在社會中的實現化和物質表現而被規定的純粹的形式；2) 依其在某一社會的實現化，然而却不依其表現的細節而被規定的物的形式；3) 某一特定的社會所形成的習慣的簡單總和，由被觀察到的表現來加以規定。^③ 叶姆斯列夫第一種情形稱為“作為公式的語言” (langue comme

schéma)，把第二種情形稱為“作為規範的語言” (langue comme norme)，把第三種情形稱為“作為習慣的語言” (langue comme usage)。^④ 顯然，他的理論是從德·索緒爾的理論發展出來的，他所說的“作為公式的語言”相當於德·索緒爾的“語言”，他所說的“作為習慣的語言”相當於德·索緒爾的“言語”，他所說的“作為規範的語言”則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东西；但是，他的理論卻是有更多的唯心主義的色彩。叶姆斯列夫認為一種語言在發展過程中無論有什麼變化，只要它的系統中的各成分之間的對立關係沒有變化，它總還是同一個語言。這種不變的關係的公式就是“作為純粹公式的語言”，這並且是真正的語言。這種語言在不同的情況下可以用聲音符號、書寫符號或旗語符號等來加以表達；從“作為規範的語言”的觀點來看，這些不同的表達方法是不同的語言，各有各的規範。在人們的說話習慣中，有不同的發音、不同的用詞等特點；從“作為習慣的語言”的觀點來看，這些不同的發音習慣、用詞習慣等就是不同的語言。這裡，叶姆斯列夫堅決把語言從具體的表達里抽象出來，甚至於把語言從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從具體的物質形式 (語音) 中抽象出來，使其成為一個純粹的公式，他的理論是荒謬的，因為這種純粹的公式顯然不能是全民的交際工具，不能是抽象思維的承擔者，並且從來也沒有作為一個具體的存在物而存在過。^⑤

由於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語言和言語的區別是客觀存在的，作為全民交際工具的語言不可能是個人所特有的，它是全民社會所有組成員的共同財產，是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加以運用，進行交際的客觀存在的工具；然而言語則是人們對語言的^⑥運用及人們運用語言所產生的結果。一個全民社會只有一種語言，例如漢民族只有一種漢語，但是萬千的個人和某些個人的結合體却有難以數計的言語。不過，儘管如此，語言和言語並不是完全對立的，兩者之間有密切的聯繫，而語言也不是心理現象，它是以其物質外殼 (語音) 所起的作用客觀地存在於社會之中的。

(本節完，全文未完)

① N. S. Trubetzkoy: «Principes de phonologie», Paris, 1949, p. 8.

② 參閱 «Les trois linguistiques saussuriennes», «Vox romanica» V. 8 頁以下。

③ Ch. L. Hjelmslev: «Langue et parole»,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ii, p. 32.

④ 同上, p. 33.

⑤ 這裡不是專門討論這些語言學家的學說的地方，因此，不對他們的學說作詳細的論述和批判。

⑥ 這裡暫且不談地方方言、“社會方言”等。

談京劇上口字與京劇語音改革

蔡 庵

1956年3月,我在《中國語文》發表過《論京劇語音改革》一文,主張大膽地進行京劇的語音改革。當時我的寫作動機是受了李少春同志的《京劇與京音》(見《中國語文》1956年5月號)的启发。一方面覺得,象李少春這樣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藝術修養的京劇演員,能從自己的綜合實踐出發,提出京劇語音應該而且能夠以北京音為準繩來進行改革的主張,這是值得重視的;另一方面認為,京劇語音不僅難學,而且有些不合時宜的清規戒律,已經在觀眾和演員之間造成了人為的隔閡,在一定的程度上妨礙了京劇的發展。

後來,在1957年的《戲劇論叢》第一輯上看見徐慕雲、黃家衡兩位的《由漢語规范化談到京劇的字韻問題》。這篇文章雖然也認為“李少春同志站在擁護漢語規範化的立場想把原有的字韻逐漸地改唱京音”的這種意圖是“好的”,也“值得我們欽佩”,但實際是批判李少春同志的主張,把上口字奉為京劇語音的金科玉律,甚至認為京劇之所以能夠“百餘年來,始終不衰,它所特有的字韻不能不是一個原因”。

後來又在1958年的《新民晚報》上看到了記者訪問譚富英同志的一則短文,恰好涉及京劇的語音改革問題。譚認為現在有些人輕率地主張對京劇原有字韻進行改革,是由于這些人不了解京劇原有字韻的優美和動聽的緣故。接著,就分別用戲音和京音唱了一句“買馬”中的西皮三眼,並問記者究竟哪種唱法好聽,記者覺得還是用戲音為妙。

今年1月,我們又看到了徐、黃兩先生編著的《京劇字韻》。這書基本精神與1957年《戲劇論叢》上那篇文章不但一致,而且有过之而無不及。“前言”中說:“它的(指京劇語音——引者)主要特點是:嚴別陰陽平仄,分清五音、四呼,辨別尖團、清濁,講究出字收音,對於十三齣與上口字尤不容有絲毫含混。當年許多名藝人都依據以上的特點行腔吐字,聞者莫不譽為字正腔圓。”

總而言之,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動它不得!我們覺得目前有必要對以下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什麼是京劇語音?什麼是所謂上口字?上口字的發展的趨勢是怎樣的?京劇語音需要改革嗎?怎樣改革?是完

全以北京音為標準呢,還是另有其他的標準?

下面就說說我們的意見。

一、所謂“上口字” 什麼是“上口字”?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每有出入,大體上說,所謂“上口”字與“不上口”字相對待而言的,凡與口語(普通話)讀法不同的字一律叫做上口字。^①如臉 [cian]、吃 [tʂi]、豬 [tʂu]、見 [cian]、箭 [tʂian]、[p'oan]、界 [ciai] 等字,^②不論它的聲母或韻母,要有一部或全部與口語有異,就算上口字。這一部分,在整個京劇語音中所占的比重是較小的。其餘字,如花 [xua]、他 [t'a]、媽 [ma]、脂 [tʂi]、[tʂi] 等字,戲音與口語相同,就無上口可言,在整個京劇語音中所占的比重較大。前者是我們主要改革的部分。上口字有哪些呢?我們認為大致可以分十類。

1) 尖團字^③

尖團字是以聲母來區分的。凡由古舌根音(見、群、曉、匣五母,疑母除外)而來的字,如果韻母是 [i]、[y] 或韻母用 [i]、[y] 開頭,聲母是 [tʂ]、[tʂʰ] 叫做團音字。例字如寄 [ci] (見母字)、器 [ci] (群母字)、儉 [cian] (群母字)、噠 [cia] (曉母字)、隆 [cia] (匣母字)。^④

凡由古舌尖前音(精、清、從、心、邪五母)而來的字,如果韻母是 [i]、[y] 或韻母用 [i]、[y] 開頭,聲母是 [ts]、[tsʰ]、[ʂ] 叫做尖音字。例字如 [tsie] (清母字)、取 [ts'y] (清母字)、前 [tsian]

① 這裡所說的不同有兩層意思:第一,不包括聲調內,因聲調牽涉到樂譜的問題,現在很難談到改革,在創造新腔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較大的變化;第二,也不包括為了適應於舞台演出特點而與口語有些出入的讀音。

② 為了比較正確地描寫京劇語音,我們採用了國標作為標音符號。另外,有些字不需要加以細致描寫,雖然通用音標注音,但並不細致,這一見便知,不須贅言。

③ 尖團字的定義,各人的說法也有不同,此處我們取董少文的《語音常識》一書中的說法。

④ 有不少的人把團音字的聲母標做注音字母的 ㄐ 、 ㄑ ,其實發音部位是舌面中音,應是音標的 [c]、[cʰ]、[ʂ],般名演員所灌的唱片譯足以證明。

(从母字)、辛 [sin] (心母字)、詳 [sian] (邪母字)。

2) 凡是口語用 [in] 做韵母的字, 京剧念 [in]。此外, 口語中用 [ən] 做韵母的字, 除了声母是唇音 (p, p', m, f) 的以外, 一律改 [ən] 为 [an], 归“人辰韵”(旧說庚青韵归人辰韵)。上面所說这两类字主要来自古登、蒸、庚、耕、清、青諸韵, 例字如灯 [tan] (登韵字)、冰 [pin] (蒸韵字)、生 [san] (庚韵字)、凭 [in] (耕韵字)。

3) 凡口語中念 [pən] [p'ən] [mən] [fən] 等音的字, 京剧里一律念成合口。这类字本来多半是古东、鍾諸韵的唇音声母的合口字, 例字如鋒 [foən] (鍾韵、奉母)、瘋 [foən] (东韵、非母)、蒙 [moən] (东韵、明母)、朋 [p'əən] (登韵、并母)。

4) 以 [tɕi] [tɕ'i] [si] [zi] 为音节的四組字里, 有一部分京剧里把韵母改为 [i] (实际上是比 [i] 稍开的 [ɿ]), 而成为 [tɕ'i] [tɕ'i] [si] [zi]。这一类字多来自古支、脂、之諸韵①的知組, 以及耕、質、米、职、昔諸入声韵的知組和章組, 它們和来自支、脂、之諸韵的庄、章兩組的字讀音不同。如知、迟、治、痴、稚, 等字皆来自支、脂、之三韵的知組, 在京剧里的韵母都是 [i]; 而枝、是、师、指、使、止、事、志諸字虽与知、痴等字同韵, 但因为来自庄、章兩組, 所以这种字在京剧里的韵母为 [ɿ], 不变 [i], 与口語同。

又如突 [ɕi] (章母) 和日 [zi] (日母) 为質韵字, 所以韵母也是 [i]。

另外, 在上口字中, 以 [i] 为韵的情况还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古微韵的非、敷、奉三母的字, 一律讀成 [fi], 属衣齐微, 例字如飞 [fi], 菲 [fi], 肥 [fi]。一种是微韵的微母字, 一律讀成 [vi], 如微、尾、未三字。这样, 就使这些字从口語中讀成 [uei] 的一組字中脱出来, 与魏、巍、危、威、畏、緯等字的字音很不相同。

这一类上口字, 实际使用时是有较大的出入的(下面还要談到), <韵学源流>把它收在机微、質直兩韵中。

5) 这一类的情况与上一类相似, 凡属古鱼、虞兩韵的知、章兩組的字, 京剧一律把口語的 [u] 韵母改为 [ɿ], 与这两韵的庄組字仍讀作 [u] 的不同, 今比較如下:

魚韵:

知組 除 [tɕ'ɿ] 猪 [tɕ'ɿ] 著 [tɕ'ɿ]] 韵母都是 [ɿ]

章組 猪 [ɕɿ] 处 [tɕ'ɿ] 恕 [ɕɿ]] 韵母都是 [u]

庄組 梳 [su] 楚 [tɕ'ɿ] 助 [tɕ'ɿ] ——韵母都是 [u]

虞韵:

知組 廚 [tɕ'ɿ] 柱 [tɕ'ɿ] 住 [tɕ'ɿ]] 韵母都是 [ɿ]

章組 樞 [ɕɿ] 主 [tɕ'ɿ] 樹 [tɕ'ɿ]] 韵母都是 [u]

庄組 雛 [tɕ'ɿ] 数 [ɕɿ] ——韵母都是 [u]

另外, 在这兩韵中的日母字如汝、如、儒、乳等, 一律讀成 [ɿ]。

6) 在口語和京剧語音中, 都有 [k] 組声母和 [ɕ], [uo] 相拼合的字, 但內容却有些不同。上口字是把口語里的一部分以 [ɕ] 为韵的字加入到 [uo] 韵中去了。如口語里哥、戈、个、革, 皆讀为 [kɕ], 可、科、顆、刻讀为 [k'ɕ], 何、贺、禾、喝讀为 [xɕ]; 但按上口字的讀法, 哥、戈、个、可、科、顆、何、贺、禾, 都讀成了 [uo] 韵, 革、刻、喝等字与口語一样, 仍是 [ɕ] 韵。

这种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因哥、可、个、何、贺等字皆屬歌韵, 戈、顆、和、禾等字皆屬戈韵, 相互之間本有其內在联系, 而革、刻、喝等字皆为入声字, 韵类不同, 变化当然也就不同了。

7) [iai] 这个韵, 在口語中是没有的 (本来有个“崖”字, 现归为 ai 韵), 当然也不会和声母发生拼合关系; 但在上口字里, 它却和 [e] [ɕ] 拼成一批团音字。它們的特点是: 都为古皆、佳兩韵見組字, 如阶、街 [ɕiai], 界、戒 [ɕiai], 解 [ɕiai], 鞋 [ɕiai] 等, 归“怀来辙”; 而另外一些字, 如結 [ɕie], 杰 [ɕie] 虽其声母与阶、界等相同 (都是見組字), 但由于韵母不同, 故仍为“乜斜辙”字。

8) 京剧里把来自古藥、觉等韵的口語里的 [ye] 韵字都提出来, 韵母变成 [ɕo], 归“梭波辙”。例字如掠 [ɕo], 爵 [tsiɕo], 約 [ɕo], 觉 [ɕo], 学 [ɕo] 等。

还有一些上口字, 来路和掠、爵等不同, 韵母为單元音 [o], 也属“梭波辙”字, 如麦、脉、墨 [mo], 百 [po] 等。

9) 口語中以 [ɕ] 为声母的 [uən] 韵字, 并不全是古日母字, 也有来自云、以兩母的; 而在京剧里, 这些来自云、以兩母的字讀音就与来自古日母的字讀音有很大区别。前者如荣 (云母)、融 (以母)、容、鏞 (以母) 等皆讀如 [ɕoən], 和永、庸、用等字混在一起; 后者如茸、冗、忒等皆讀为 [ɕuən], 与口語同。

10) 上口字中有些以 [ɕ] 开头的字, 这是口語里没有的。这类字都来自古疑母和影母, 例字如我、俄、臥 [ɕo], 哀、爱 [ɕai], 熬 [ɕan], 安 [ɕan] 等。

以上十項, 基本上概括了上口字的面貌。② 从这

① 平声以麻上、去、下同。

② 还有一些上口字是比较零星的和个别的, 如“說” [ɕoɕ]、“臉” [ɕian] 等。甚至还有些混乱現象, 如“分”、“牛”、“战”等字, 有人念合口呼, 有人念开口呼。

里我們不難了解，所謂上口字並不是什麼神秘的、莫測高深的東西，它比起北京語音來，只不過多接近一些古音，或者說，還有些非北京語音的方音遺迹。

我們既然了解了上口字的概況，就可以進而探討下面這個問題。

二、可以取消上口字了 我們認為，上口字是完全可以取消的，它完全可以用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北京語音來代替。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願意舉出以下事實進行討論。

1) 上口字難學。在全部上口字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比較容易掌握規律的，如拿庚青韻歸“人辰轍”來說，只要把“中東轍”中的開、齊兩呼的字改為[An] 韻就行了；但絕大部分的上口字，卻不能不借助於記憶。就拿尖田字來說吧，據我們粗略的統計，較常用的就有七百多個，其中尖字約占三分之一，田字約占三分之二；而且，在學習的過程中，要記住某一個尖字，就不能不對在口語中本來和它同音的田字發生懷疑。

近幾年來，我們看到一些青年京劇演員的戲，他們對於京劇都下過幾年甚至十年左右的工夫，但上口字含混、尖田不分的人還不少。據說王玉蓉同志在向王瑤卿先生學戲時，曾對上口字下過一番苦工夫，以至累得吐血，但我們聽一下她的“四郎探母”(與管紹華合灌)和“武家坡”(與馬連良合灌)的唱片，該上口而不上口的地方仍然很多。下面另舉一些具體的例子：

演員	唱片	戲名	字	誤音	正音(上口)
梅蘭芳	百代	別姬	和(和衣)	[xɿA]	[xoo]
			歌(虞歌)	[kɿA]	[koo]
程艷秋	百代	孔雀屏	等(等候)	[təŋ]	[tAn]
尚小雲	高亭	二進宮	說(說段)	[suo]	[søe]
			丞(丞相)	[tɕ'əŋ]	[tɕ'An]
汪笑儂	百代	馬前潑水	蓉(芙蓉花)	[ʒəŋ]	[ʒoAn]
			北(北風)	[pai]	[pə]
譚富英	百代	斬馬謖	平(王平)	[p'ɪŋ]	[p'in]
			听(不听)	[t'ɪŋ]	[t'in]
馬連良	人民	借東風	星(披星)	[sɪŋ]	[sɪn]
			助(相助)	[tɕu]	[tɕy]
馮雲甫	百代	行路訓子	我(搬請我)	[uo]	[yø]
			說(說此話)	[suo]	[søe]
李多奎	百代	打龍袍	畜(畜生)	[tɕ'u]	[c'y]
			定(剃定)	[tɪŋ]	[tɪn]
金少山	百代	連環套	精(妖精)	[tsɪŋ]	[tsɪn]
			鼠(鼠肚)	[su]	[sy]
			入(入營房)	[ʒu]	[ʒy]

我們找這些例子根據兩個條件：一是名演員，一

是名演員的拿手戲。想說明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名演員唱拿手戲，倘且有錯，上口字之難學，可知！

2) 學上口字之難是無可置疑的。我們要問：花費很多精力，即使把上口字記得滾瓜爛熟，能在行腔吐字時一無訛處，但究竟得到了什麼客觀效果呢？那答案可能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使人更難聽懂劇而已！②

當一個京劇演員在學習上口字以前，他對上口字是一無所知的，只是在經過較長期的艱苦的死記硬背之後，才逐漸知道了“講”(田音)和“蔣”(尖音)念法不同，“書”(上口)和“梳”(不上口)念法不同；但對普通觀眾(當然不包括懂得京劇語音的人們在內)說來，情況就迥然不同了，他們並沒有經過較長期的艱苦的死記硬背的過程，對上口字的理解，同那個在學習上口字以前、對上口字一無所知的京劇演員是毫無不同的。如果你對一個不懂戲音的人喊一聲[cian]，問他“知道”的“知”念成[tɕi]，你叫他們根據什麼來聽懂你指的是“臉”字和“知”字呢？

在今天，專門閉着眼睛聽戲，用手叩着板眼，不問戲的內容，只重行腔是否循規蹈矩，吐音咬字是否清晰分明、合乎上口家法的剝削階級的有閑人物，已經復見了！今天的戲院的觀眾是勞動人民。他們在緊張勞動之餘需要聽聽戲，調劑一下精神生活，難道他們會歡迎那些艱深難懂、莫知所云的上口字么？李少春同志在他的戲里採用了一些京音(虽然是初步的和零星的)就受到群眾的歡迎，難道還不足以表明群眾的惡么？

3) 但是，只強調難學和難懂並不能說服一些人來贊成京劇語音改革，他們會說：“上口字好聽，用北京音唱戲就不能字正腔圓了”。“名藝人都是按照這些金科玉律咬字吐音的，所以才受到群眾的歡迎。”

是否“名藝人都是按照這些金科玉律咬字吐音的”，在上面已經列表說明了，事實並非如此。老實說就連一向為京劇界所推崇的，在審音方面有很高造詣的言菊朋也並沒有做到與“金科玉律”毫無不合之處。他在“法門寺”里(高亭唱片)也把應該上口的“吸褚生”的“褚”字唱成口語的[tɕ'u]字音了。

至於是否“上口字好聽”，我們願意舉出李多奎先生在“打龍袍”(百代唱片，與金少山合灌)中的一段唱詞為例：

① 京劇難懂的原因是很多的，如嗓有真假，而真嗓和假嗓中的情況又不止一種，再加上有些人沒有掌握舞台表演的科學方法，等等，但上口字的難懂也是一個事實。

…金絲狸貓皮尾來刺定。
他道說為娘我產生妖精。
老皇谷一見怒氣生。
…一計不成二計生。
約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宮庭。

這段唱詞用的是庚青韻，本應歸“人辰韻”，但李先生却把定、精、生、成、庭這五個字都用北京音唱了出來，成為“中東韻”的字了，而我們覺得并無難聽之處。這一段唱腔從明晰性和音樂性方面來衡量，相當動聽，而且也適當地表達了李后追緬前事、悲憤交加的心情，但是假若從上口字方面來要求，又怎能談到好呢？所以我們覺得應當有一個新的字正腔圓的標準，這就是平易近人的標準，人民大眾的標準。

4) 此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從京劇歷史發展和京劇優秀演員們的實踐活動來看，京劇的上口字終于會被北京語音代替已經成為必然的趨勢。這問題分兩點來談。

1. 四大徽班的入京是京劇發展史上的重大的轉折點：一方面，它來到了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得到從已經相當成熟的劇種（如昆崙腔、弋陽腔、漢調、梆子腔等）汲取營養的良好機會，就有可能由地方戲上升為全國性的戲劇，成為民族戲劇的代表；另一方面，它的語言也必然會受到北京話的強有力的影響。這又分兩項來說：第一，京白地盤的擴大。以丑角而論，以前對這種角色的要求是會說各地方言，但是演變到今天，除了扮演較嚴肅角色的方巾丑（如蔣干）而外，一般都說京白。花旦和玩笑旦也用京白。在丑、花旦和玩笑旦的念、唱中，戲音和京音的矛盾就特別顯著。以“紅娘”為例：紅娘說白，總是“小姐”長“小姐”短的，但是，一逢到唱，“看小姐呀”的“小姐”就馬上要從 [piau tɕie] 變成 [siau tsie]，這在演員和觀眾的心理上總會造成一種不大協調的感覺。這種矛盾只有改唱京音才是解決的好辦法。第二，已經出現了變上口音為京音來押韻的情況和其他角色（丑、花旦和玩笑旦之外的）採用京白的情况，前種情况如：

未曾開言我的淚如梭
尊一聲娘行听我說（《京劇歌譜初集》：“浣紗記”）

這個“說”字已不是上口字的 [sɔɛ] 了，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音 [suo]。後一種情况如：“丁甲山”的李逵，當他身背荊杖，哀求宋江恕他魯莽時，插有一段京白：“我說宋大哥，我一個人的親哥哥，哥哥，你的門前接着一道河呀呼嘿…”（大中華唱片，金少山唱）。花臉夾上几句京白，这种情况已經越來越多了。

2. 從京劇名演員對上口字的使用情况來看。在

上口字的第四類中，我們談到，有一些口語如 [tɕʰɛ] [tɕʰɛ] [ɕi] 的字，上口字讀如 [tɕʰi] [tɕʰi] [ɕi] [ɕi] 現在我們就拿這類字的使用情况為例，見下表：

演員	上口字	應讀	實讀	唱片
言菊朋	世(勸世人)	[ɕi]	[ɕi]	高亭：法門寺
	實(實指望)	[ɕi]	[ɕi]	同上
	職(官卑職小)	[tɕʰi]	[tɕʰi]	百代：大保國
	知(誰不知)	[tɕʰi]	[tɕʰi]	倍開：戰北原
	智(智謀廣大)	[tɕʰi]	[tɕʰi]	同上
余叔岩	侄(侄為臣)	[tɕʰi]	[tɕʰi]	倍開：罵殿
	吃(吃醉了酒)	[tɕʰi]	[tɕʰi]	百代：法場換子
	實(實實)	[ɕi]	[ɕi]	百代：一捧雪
王少樓	蟬(丹蟬)	[tɕʰi]	同左	高亭：搜孤救孤
	十(十分恩厚)	[ɕi]	[ɕi]	長城：甘露寺
	扶(執掌)	[tɕʰi]	[tɕʰi]	百代：紅鬃烈馬
譚富英	退(退慢)	[tɕʰi]	同左	同上
	日(五日一)	[ɕi]	[ɕi]	勝利：華容道
	大宴)			
金少山	日(三日一)	[ɕi]	同左	同上
	小宴)			
林樹森	世(出世)	[ɕi]	[ɕi]	勝利：戰長沙
	識(認識)	[ɕi]	[ɕi]	勝利：游龍戲鳳
	知(誰知我)	[tɕʰi]	[tɕʰi]	百代：馬前潯水
汪笑儂	室(宜室)	[ɕi]	[ɕi]	同上
	十(五十)	[ɕi]	[ɕi]	百代：八義圖
	實(實難表)	[ɕi]	[ɕi]	百代：南陽關
王又宸	世(蓋世)	[ɕi]	[ɕi]	百代：連營寨
	十(十名)	[ɕi]	[ɕi]	同上
	失(失散)	[ɕi]	[ɕi]	同上
王雨田	石(石沉)	[ɕi]	[ɕi]	百代：奇冤報
	世(勸世人)	[ɕi]	[ɕi]	百代：法門寺
	知(又誰知)	[tɕʰi]	同左	同上
又處	實(實指望)	[ɕi]	[ɕi]	同上
	世(劉世昌)	[ɕi]	[ɕi]	百代：烏盆計
	失(失智)	[ɕi]	[ɕi]	百代：戰太平
譚鑫培	智(失智)	[ɕi]	[ɕi]	同上
	世(在世間)	[ɕi]	同左	百代：掃松
	恥(恥笑)	[tɕʰi]	同左	同上
三麻子	十(十二金牌)	[ɕi]	同左	百代：風波亭
張桂芬				

以上事實生動地說明了：京劇語音（主要指上口字）在演員們的艺术實踐中，已有以北京音為標準的趨勢，事實上，除了極個別演員、極個別的字（如知、日、退等）仍讀上口音而外，有更多的已經從上口字中解放出來了。如果無視這一事實，就必然會有害於京劇藝術的發展。

根據以上四個理由，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上口字可以取消了！

三、京劇語音以北京語音為準 作為民族戲劇優

秀傳統的代表京劇，經過長時間的實踐，無數天才演員的慘淡經營，在念、唱方面具有自己的獨特的風格和特點，這是極可珍貴的一宗戏曲財富。我們反對的只是京劇語音中的一小部分已經失去生命力的字的念法，但對京劇所固有的、服務於舞台演唱需要的念、唱的特點，則是表示衷心的擁護的。

我們認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新的京劇語音，雖然要改變一些聲母，有一些字需要重新歸轍，但絕不是說咬字吐音就可以不必講究了，就可以不考慮舞台演唱的需要了，——絕不是如此！怎樣結合演唱的需要做到語音明晰，字正腔圓，這確實不是馬馬虎虎就行了的，需要刻苦的鍛煉和創造的精神。下面只舉例性地談一下我們的意見。

1) 聲母方面：一個字音究竟是塞音或是塞擦音，是鼻音或是邊音，是送氣還是不送氣（舊說為“清濁分明”），都要有顯明的區別，不容有絲毫含混。“登大寶”決不能念成“騰他跑”，“亮之罪也”決不能念成“亮之粹也”，“銳”不能念成[luei]，等等。

2) 韻母方面：韻母向來對京劇行腔有最重要的作用，一個字是唱“死”了還是唱“活”了，主要的關鍵即在於韻母的念法和唱法。它的要求是：音域廣闊，能以致遠，發音豁亮動聽，具有高度的明確性。它的特殊的唱法是京劇語音藝術所固有而又為歷來杰出的演員們所發揚和光大的，已故的言菊朋、余叔岩和當代的梅蘭芳、周信芳，都是這方面的大師。其特點如下：

1. 開尾韻母的開口度的加大。

u → 近 [ø]，如“思”（四郎探母：自思自嘆）

ʌ → 近 [ɐ]，如“是”（鳳還巢：甚是羞慚）

o → 近 [ɔ]，如“北”（借東風：望江北）

ɤ → [ɤA]，如“黑”（法門寺：黑夜里）

i → [i]，如“一”（武家坡：一騎馬）

u → [ʊ]，或近 [o]，[ʊ] 用在開尾韻母，如“步”（別姬：輕移步）；近 [ɔ] 用在做介母的場合，如“滾”（讓徐州：滾滾滾）。

ɤ → [ɤ] 或近 [ɐ]，[ɤ] 用在開尾韻母，如“魚”（打魚殺家：父女們打魚）；近 [ɐ] 用於介母，如“月”（文昭關：一輪明月）

ie → [ie]，如谷（空城計：先帝谷）

很显然，這比起口語來，每個韻母都被誇張化了，一般的規律是各把開口度加大到一個相應的距離，如 [i] → [i]，[e] → [ɛ]，[u] → [o]，[ɤ] → [A]，這種念法（或唱法）的好處是，由於開口度大了，聲音當然會更顯豁、清晰，會把聲音傳得更遠（內行稱為“响堂”），而且，由於每個韻母都有相對的誇張，所以也不會在任何兩個韻母之間產生混淆現象。在這方面，應該向在吐音行腔上有精深造詣的許多當代京劇前輩，如梅蘭芳和周信芳諸位先生學習，同時對已故的京劇名演員如言菊朋和余叔岩等人的唱片，也應該下一番揣摩研究的工夫。

2. 元音不能省略。在口語中，沒有必要把一個字的讀音時間拖得很長，所以有的輕微的元音可以忽略不計，如“英”字寫成 [iŋ]，把 [i] 和 [ŋ] 之間的過渡元音 [ə] 省去。在京劇語音中，却由於語音環境不同（有時需要把一個字的發音時間拖得很長），就不會出現省略的情況，如在發“英”音的時候，就應該是介音 [i] 加上完整的 [Aŋ]（口語應是 eŋ，但根據加大開口度的規律，e 向下後方移動，就成為 A）。其他情況，可以類推。

其他如韻母的收音問題，也很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談清楚的，只好從略。而且寫這篇文章的動機不是想在“內行”面前“班門弄斧”，賣弄一點“外行”的微薄而且未見得正確的京劇常識，只是從京劇觀眾的角度來分析幾個問題，提出一些要求；所以怎樣嚴格要求念唱的問題應當讓行家在專門討論京劇的書籍報刊上來討論，我這裡真是只能“拋磚引玉”而已。

總之，本文的目的有二：

一、取消詰屈聱牙的、既難學又難懂的、既不被演員歡迎又不為觀眾喜歡的上口字。

二、建立合乎京劇音發展趨勢的、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同時又能充分發揚適合舞台演唱特點的新京劇語音，以利于京劇的發展。

京剧语言和汉语规范化

單耀海

关于戏曲语言和汉语规范化的关系问题,《中国语文》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这里只想就京剧的语言问题来谈谈。京剧发展到現在,已經不是一种單純的地方剧,而是一种能代表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了。所以谈到戏曲语言和汉语规范化关系的时候,就不能不把京剧放在首要的地位。

首先应该明确京剧语言可以不可以跟汉语规范化发生关系,能不能把它加以规范,以及怎样来规范。先有这些認識,才能衡量并解决京剧语言中所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汉语规范化的要求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主要是指詞汇方面);以典范的白話文为語法规范。根据这三方面的要求来看看在京剧语言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这些問題与汉语规范化之間的关系是怎样的。现在分下面几点来談:

(一) 语音

京剧的语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道白”,一是“唱”。“道白”又分为“京白”与“韵白”。“京白”虽然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听到的北京話有些不一样,但是字的声母、韵母、声調毕竟还是以北京話为标准的,在这方面不存在什么問題。“韵白”和“唱”可以合起来談,因为这两方面的发音基本上是相同的。所謂“韵白”就是“上口”,拿它来和北京語音相比較,就有很大的不同。这大致有三方面:

1) 声母方面的不同。例如“我、臉、喊”三个字在北京語音里是“wo, lian, han”;可是一“上口”就成了“nguo, jian, xian”。又如“解放”的“解”,口語都念“jie”,只有作姓用时才念“xie”;但是“上口”以后,只有在“解开”或“押解”这一类的用法上念“jie”,在其他用法上都念“xie”。这种个别字音的异常情形还不太多,問題也不太大,比較复杂的还是“尖团”字的问题。京剧演員似乎对“尖团”字很重視,据說要是“尖团”不分,就是咬字不准,也就是不能做到所謂“字正腔圓”。其实“尖团”字的分別不仅仅在京剧語音里有,在其他地方剧种里也有,不过京剧里的“尖团”字和某些地方剧里的“尖团”字的范围

略有出入而已。下面是京剧分为“尖团”的例字:

“尖”	“团”
迹、集、挤、寂 [tsi]*	基、吉、己、記 [tɕi]
津、尽、进 [tsin]	金、锦、近 [tɕin]
姿、七、齐 [ts'i]	旗、启、弃 [tɕ'i]
千、前、浅 [ts'ian]	謙、乾、遣 [tɕ'ian]
泉、全、痊 [ts'yan]	圈、权、犬 [tɕ'yan]
情、息、洗、緝 [ɕi]	希、吸、喜、歛 [ɕi]
先、仙、线 [ɕian]	咸、贤、显 [ɕian]
須、叙、婿 [ɕy]	虛、許、著 [ɕy]

上面所举的例字,在北京語音里都是分別属于 [tɕ] [tɕ'] [ɕ] 三个声母,沒有“尖团”之分;但是到了京剧語音里却有了分別,就是 [tɕ] [tɕ'] [ɕ] 三个声母和 [i] [y] 两个韵母或和有 [i] [y] 介音的韵母相拼时,有些字的声母不是 [tɕ] [tɕ'] [ɕ] 而是 [ts] [ts'] [s] 了。这种分法在有些地方剧里也有,但京剧“尖团”之分除此以外,还指 [ts] [ts'] [s] 和 [tɕ] [tɕ'] [ɕ] 两类声母的区别,如:

“尖”	“团”
姿、早、奏	枝、执、咒
詞、才、草	赤、柴、吵
思、三、喪	师、山、伤

这种区别之称为“尖团”,在有些地方剧里是没有的。

2) 韵母方面的不同。例如 [ts] [tɕ'] [s] [ɕ] 四个声母,凡是北京語音后面只带一个韵母 [u] 的,韵母 [u] 在京剧里就变成了 [ɕ], 如:

諸、珠、主、住
出、除、处
書、舒、樹、恕
儒、如、乳、入

这些字在某些“官話方言”(例如湖北某些方言和湘西方言,即所謂“湖广方言”)里至今还是这样念的,在京剧里也就是所謂“中州”韵。其他如“阶、界、街”三个字,在北京語音里是 [tɕie], “上口”以后就成了 [tɕiai]; “飞、非” [fei] 成了 [fi]; “知” [tɕʰi] 成了 [tɕʰi]; “池” [tɕʰi] 成了 [tɕʰi]; “日” [ɕi] 成了 [ɕi]。奇怪的是 [ɕi] 却没有变。还有些字的念法也

* 以下因难于一律用拼音字母标音,有些音采用国际音标(加方括弧)。

是比较特别的,如“鱼藏剑”一剧姬僚唱“口吐着寒光射孤的双眸”的“眸”[mou]字为[miou];“捉放曹”一剧陈宫唱“这才是花随水水不能恋花”的“恋”[lian]字为[luan]。又如“正”[tʂəŋ]、“城”[tʂʰəŋ]、“景”[tɕiŋ]、“英”[iŋ]四个字,“上口”后常变成[tʂən] [tʂʰən] [tɕin] [in],就是把“人辰轍”中屬“庚青”韵的字,分別念成了“真文”和“侵寻”两韵的字。又如“說”[suo]念成[sø],“不”[pu]念成[pəʔ]。記得有一次袁盛戎先生談到京劇語言問題,他說“群英會”中“蔡瑁”的“瑁”[mau]字,三个不同的角色有三种不同的念法,老生念[mau],小生念[mei],花臉念[ma]。可見,在韵母上的变化也是比较复杂的。

3) 声調方面的不同。京劇的声調同北京話的声調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从北京的四声“阴平、阳平、上、去”来的。由于京劇的起源同“汉”、“徽”和“昆”密切相关,而其成长和发展却又在北京,这样,既有汉、徽、吳的方音,又有京音,四者揉合而成一种特有的語音,这种特有的語音也就表现在声調方面。

据初步(不一定正确)的分析,北京語音的阴平字,在京劇語音里基本没变,如“奔、分、真、知”等字,調值大致都是55,或是收音微降。阳平字如“才、人、时、詳”等字,調值大致是21,这和北京語音的35就有了区别。上声字比较复杂,“上口”后調值有35的,也有13或53的,一般情况調值多为35;但在句首或句末也不一样,如“馬”字,在句末念为35,在句首又成了53,如“馬來”;“你”字也一样。北京去声字如“坐、醉、是、对”等字,在京劇里調值变化也不一样,在句末的大致是31,在句首或句中的多为214。

上述的一些調值变化是單指念白,若是把“唱”或“叫头”等包括进去,情况就更为复杂。

上面举的是京劇語言中語音部分的一些例子,如果从汉语规范化的角度来考虑,应该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呢?这里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1) 声母方面的不同,我认为完全可以改从北京語音。例如“臉、喊”等字没有必要念成“jian、xian”。一定要把“臉”念成“jian”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和“臉”声母韵母完全相同的字如“帘、連、怜”等也念成“jian”呢?既然无所依据,在日常語言里又不这样念,倒不如把它改成北京音,使观众听起来也习惯一些。

关于“尖团”字問題,我曾經和一些同志交談过,其中也有演員同志,彼此意見不大一致。有的認為不必保留“尖团”,有的認為“尖团”可以保留。認為不必保

留的理由是,京劇中的“尖团”虽然是沿着古音下来的,但是許多方言里都沒有“尖团”之分了,而且有些演員在区别“尖团”字上并不严格,有些混乱,該“尖”的不“尖”,而“下、休、乡”等“团”字倒念成“尖”的了。正因为在北京話里早已不分“尖团”,所以好些演員要勉强去分是有困难的,因此京劇的“尖团”之分可以取消。認為可以保留的理由是:“尖团”为戏曲語言中的特点之一,不能簡單地拿日常生活中的語言去衡量它,它在咬字清楚、区别字音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对于这两种意見,我是傾向第一种的。主要理由是:要是按京劇的“尖团”来要求現在的京劇演員的話,正如吳曉鈴先生在去年10月号《中国語文》上的那篇文章所說,“恐怕大多数京劇演員都得不到三分”。現在有的就干脆不分了,就是說,該“尖”的也不“尖”了。大多数演員同志似乎也很难說出京劇里所謂“尖团”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唱,錯了也就跟着錯,对在哪里,錯在哪里,也就莫明其所以。这是在演員方面。观众方面呢,恐怕大多数人也不管什么“尖团”不“尖团”。当然,“尖团”对咬字清楚、区别字音等方面是有些作用的,但是,如果不分,我想也不至听不清楚或引起誤解。比如“喝酒”的“酒”,观众絕不会当作“久”;“天長地久”的“久”也不会当作“酒”。我也听过个别演員同志的戏,如赵燕俠同志,她的唱和念并不分“尖团”,但是不少观众的反映很好,說她的唱和念都能懂,就是說观众能够接受这种不分“尖团”的表演。可見所謂咬字清楚、区别字音并不完全在于有无“尖团”。“尖团”問題的解决,可以完全以北京的語音为准。

2) 韵母方面的不同我也主張改从北京語音。zh、ch、sh、r 四个声母和韵母 u 相拼,韵母 u 就变成 ü,虽然其来源是有根据,但是我認為也是可以改过来的,这并不会影响京劇語音的特点和发音的优美。为什么不能改呢,事实上有些演員已經不完全依据这种习惯念法而改口了,如已故的楊宝森先生在“文昭关”一剧中,把“伍員在头上换儒巾”的“儒”字念成[ɕy]而不是[ɕy]。又如李少春同志念“藺相如”的“如”字也是这样,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习惯,可見这些字并不是不能改的。至于“阶、界、街、飞、非、知、池、日”等字也是可以改变念法的,如果說“知、池、日”非要念成[tʂi], [tʂʰi], [ɕi]不可,那为什么“师、时、是”等字又不念[ʂi]呢?这中間既然有了不统一的念法,我們按照北京語音的念法統一起来岂不更好!还有一些特別念法的字如“眸、說”等也沒有任何必要保留原有的念法。至于“瑁”字的三种念法更应该改,要不,不了解《三国演义》的观众不禁要問,这是三个人还是一个人;

3) 声調方面的不同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上面已经说过,京剧語音是由“汉、徽、吳、京”四种音糅合而成的,这就形成了它的“四不象”的声調。这种声調也就成了京剧語音的特色,与行腔大有关系,具有历史上和习惯上的稳固性。在声調上如果要完全改从北京語音,牵动的地方可就大了,也許不成其为京剧了。別說观众听起来不是味儿,就是演員似乎也沒法念或唱。当然,京剧是在发展的,将来是否能改,改成什么样子,现在还无法推测。就現在而言,我个人認為可以不去改它。京剧語音在“四声”上的变化,恐怕有一定的規律,这还需要深入研究。

(二) 词汇和語法

总的說来,我認为京剧無論是道白或者是唱詞,在词汇和語法方面也应该尽量符合汉语规范化的精神。当然,这并不是机械地要求京剧語言要和現在日常生活的語言完全一样,事实上也不可能。京剧大都是表演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語言当然不会和我們現在的完全一样。我們應該使京剧語言符合一定的历史环境,既能表达人物的心理活动,又能符合历史的真实。这是可以作到的。

使京剧語言符合历史人物的真实,要訂出一个尺度或标准来是很难的。如果說,表演汉朝的人物,就得完全說汉朝的話,用汉朝的词汇,用唐朝或明朝的就不行,这事实上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所謂符合一定的历史环境只是說不要使所表演的历史人物的語言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实际。比如在历史人物的語言里,不論他們是哪一朝代的,決不会有“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語汇。在“連环套”拜山一場里,当黃天霸向御馬深深拜揖并說“願吾主千岁千千岁”的时候,一位扮演寶尔墩的演員向着观众說黃天霸“封建得很”。虽然含有插科打諢的意味,可是到底不很协调,因为在那个时代“封建”这个詞的这种用法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不协调的情况,观众是能立刻感到的。这不过是个例子,类似的情况不一而足。不过也不宜用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問題,假若过于苛求,就使人寸步难行了。如“捉放曹”一剧中“杀家”一段,曹操唱“自作自受自遭殃,小鬼怎搖五閻王”,“閻王”一詞是佛教傳入中国后才有的,在曹操那个时代,佛教傳入还不久,还没有小乘的輪回、因果报应之說,所以“閻王”一詞肯定不会有,那么是否在“捉放曹”里就不能用呢?我看可以不必这样要求,观众决不会搬出考据学来苛求,也沒有什么不协调的直接感受。总之,这方面沒有現成的、固定的尺度,最要紧的还是在于編剧、导演、演員善于掌握分寸。

京剧的词汇大致都是北方方言的词汇,一般的詞观众都能懂,但也要注意,一些太土的詞应该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在京白中方言詞用得較多,如“法門寺”一剧中的“死气白咧”、“蹭楞子”,又如把“去”字念成“客ke”,“完了”說成“結”等,这些詞如果不是北京人或者对北京話不是很熟悉的人是不懂的,所以我同意侯宝林同志在1959年第10期《中国語文》一文中的論点,应该使艺术語言尽量讓人能听懂、能欣賞。

此外,还有一个工作需要內行去作,就是整理过去流傳下来的某些用詞有錯誤的台詞。解放前戏曲是被歧視的,很少人重視京剧剧本的整理或是編改这一工作;能够編的又多半因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在文字上的琢磨、推敲功夫不够;而演員又有許多是文盲或是半文盲,对台詞大多靠死記,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学,口授心傳,錯了也不知道。据裘盛戎同志說,“白良关”中有“鋼鞭一舉繞三軍”句,“繞”字是“曉”字之誤,可能在当时就是把“曉”字錯念成“繞”,一代傳一代,以訛傳訛,直到今天还有念“繞”的。至于把“替死”說成是“代劳”,那更是笑話。这在馬連良同志的一篇文章(見《中国語文》1959年9月号)里談得較多,这里我就不贅述了。

其次談到語法。在語法上簡單的要求就是要使句子通順。京剧語言是艺术語言,在唱腔上要求合轍押韻,在句式上有一定的規律。戏曲語言有特殊的語法和格調,这是誰都承認的;但是这些特殊的語法和格調仍然是長在民族語言的土壤里的,不能因为是戏曲語言就違反語法的基本規律。比如說,为了合轍押韻,就胡乱地顛倒一些詞序,或是顛倒复音詞里的詞素,如把“牢籠計”改成“計籠牢”,“号令”成了“令号”,总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句子使人难懂,比如:“恨不能生四乳俱流奶沈”、“何日含飴抱麒麟”(見馬少波、景孤血編的“五侯宴”、“臣不學勇聶政刺客孟浪”(見王韻竹、翁偶虹編的“將相和”)等。这样的例句在京剧里并不少見。

解放十年来,在剧本的发掘和整理方面我們是作了不少工作;但是如果把京剧剧本提到文学艺术作品的要求上来看,我認为水平还是不够高的。京剧的艺术宝藏很丰富,不是一下子就能整理得很完善的,这还有待于戏剧工作者和文学、語言工作者作更多更大的努力。

綜上所述,我認为京剧不是同汉语规范化沒有关系的,我們應該尽量使京剧語言能符合汉语规范化的精神。当然,我們也必須看到京剧由于長时期的发展,演員在語言方面也有比較稳固的习惯,一时要改过来怕还不大容易,但是我認为习惯毕竟是习惯,如果目前不能馬上改,可以慢慢地改,逐漸由不习惯到习惯。

京剧舞台語言改进的一点体会

赵燕侠

最近看到《戏剧报》上王志勤同志发表的《中国京剧院建院十周年》的一篇文章里，说到京剧院演員学习課里有字韵这项輔導課，我看了很高兴。这对演員來說，是一項很重要的基礎課。由此我就想到，京剧的語言能不能同促進現代漢語規範化和推廣普通話工作聯繫起來呢？我覺得傳統戲曲所使用的語言，由于历史性的內容和音乐性的形式，在語音和詞匯上本來是不很容易完全使用普通話的，更不可能完全適應現代漢語規範化的要求。但是這不等於說，我對促進現代漢語規範化和推廣普通話有什麼抵觸。根據我從事京剧舞台生活十几年的經驗体会，我認為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就是在不損害京剧原有的傳統表現形式下，舞台語言加以适当的改进，还是可能的。比如，在台詞方面，什麼“蓮花寶”“馬走戰”“地溜平”這樣的台詞就很可以修正。傳統劇目里部分地念“京白”的角色，如丑角、花旦、花臉，在台詞里常常夾雜着土語，特別是在玩笑戲里最多；象這些土語（多半是北京旧有的土語），大多數已被現在人民的生活純化，在今天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氣氛下，听到這些土詞土語更是刺耳。象這樣的“京白”完全可以逐步地向普通話靠攏，使用多數人能懂的普通話，讓更多的觀眾能够听懂，這也就能對漢語規範化起到促進的作用。

再說以京剧形式表演的現代戲目，象我們演出的《白毛女》和《愛甩辮子的姑娘》這兩個戲，全部台詞里沒有“韻白”，使用的完全是“京白”；尽管同实际生活里

的語言還有些不同，可是它已經很接近現代漢語規範化的要求，並且已經起到推廣普通話的橋梁作用。這樣的做法，很可能有人說成只是話劇加上唱工，失掉了京剧傳統的舞台語言形式；可是我認為，這樣做並不致于損害京剧傳統形式。因為在以傳統形式演的現代劇中，所扮演的是當代人物，如果要同演历史劇角色一樣地完全使用韻白，那就会使人覺得非常生硬。

據我所听到的觀眾的反映，有人認為我的唱法是革新，或者說或是突出了京剧旦角的吐字和唱法，因為他們覺得字字都能听懂；可是也有人說我這樣的唱法不象京剧。我的体会並不如此，因為我的唱念並沒有脫离京剧的傳統，我只是在京剧旦角唱法的原有基礎上改进了一下，并吸收了兄弟劇种的腔調來丰富它而已。

這里雖然不是談演唱問題，而是語言問題，但是演唱同語言是分不開的，問題是要使用什麼樣的語言來演唱，這在今天雖然大家意見還有分歧，可是努力的方向應該是一致的。我認為京剧既然或多或少還有它一定的地方局限性，那麼，使用今天都懂得的京音就不能說脫离京剧傳統形式，更說不上損害京剧原有旦角的唱念。十幾年來，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來努力的，久而久之，才形成了今天的唱法和念白；當然，這也是根據個人的嗓音條件不斷地鍛煉才形成的。

這里只是就我个人一点肤淺的認識，來談談對京剧舞台語言改进的意見，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討論。

上接12頁)

舉不發生直接關係，有了第一次分承作橋梁，第二次分承才能說明“列舉”。這種分承我們稱為“層層分承”。

分承的複雜，如果沒有嚴密的邏輯，就容易產生歧義。這就要求我們：(1)分承時適當地回顧一下列舉或者上一次分承時的意思；(2)根據具體情況，把問題加以歸納綜合，使問題簡單化，去掉枝節，不要故意使問題複雜化。

從兩者意義關係上看，一般分承都是說明列舉的事物之間的區別和聯繫。但也有特殊的情況，比如：

9) 登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薤露一時晷，倏作且夕間。卿當日富貴，吾獨向黃泉。(孔雀東南飛)

例9中，登石和薤露是焦仲卿用來自比并象征自己和兰芝的命运的。同下面的例子对比起来，就更明显了。

10) 君当作登石，妾当作薤露。薤露絕難終，登石无轉移。(同上)

例10是一般的列舉和分承，很明显，分承只是列舉的描寫和補充。但例9中，列舉只是分承的象征，主体是分承，這種方法在民間歌謠中運用得比較廣泛。

列舉和分承是表現複雜的客觀事物的一種很好的句式，目前，它的使用已很普遍。象這種句式，除了我上面所說的列舉的次數和項目，分承的次數和項目，列舉和分承的關係等方面，還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比如列舉之間的聯繫等。由于列舉和分承很適宜於表現矛盾鬥爭的兩個對立面，所以，列舉之間不僅常用頓號和并列式聯詞，也可以用選擇式連詞，如“或者、還是”等，或者用否定式副詞“不、非”(在古典文學作品中用“非”的比較多)等。

送气和不送气是不是音变造詞的方法？

李葆瑞

語音中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別，就漢語來說，是有區別意義的作用的。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在普通話里“肚[tu]子”和“覓[t'u]子”的不同，“飽[pau]了”和“跑[p'au]了”的不同，就是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別。因此送气的輔音和不送气的輔音在漢語里是不同的音位。

但是送气和不送气是否也和聲調的不同一樣，曾經用來從一個概念中分化出新詞來，象“买”[ma-i]和“卖”[mai]，“好”[xau]和“好”[xau]等等那樣呢？在有些人的著作里對這個問題是肯定的。例如徐世榮先生認為，“長短”的“長”和“生長”的“長”，“重復”的“重”和“輕重”的“重”，“收藏”的“藏”和“寶藏”的“藏”等等是用送气和不送气，“內部語音交替的方式”，來區別形態變化的。^① 孫常叙先生說“長[tʂaŋ] 長[tʂ'aŋ]”，

“朝[tʂau] 朝[tʂ'au]”，“彈[tan] 彈[t'an]”等是用送气與否從舊詞里分化出來新詞。^② 在我編寫的《現代漢語語音》講義（195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里也有類似的說法。最近因為考慮修改這本講義，感到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現在提出我另一種看法，供大家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參考。

類似“長短”的“長”和“生長”的“長”，“重復”的“重”和“輕重”的“重”，“收藏”的“藏”和“寶藏”的“藏”，“朝代”的“朝”和“朝夕”的“朝”，“彈琴”的“彈”和“彈弓”的“彈”這樣的變化，是用音變的方法從一個概念里分化出來新詞。但是送气和不送气並不是這些詞分化的方法。送气和不送气的變化也是音變，但是這是語音歷史發展的變化，同這些詞的分化或者區別形態無關。象“長短”的“長”和“生長”的“長”等等這樣的分化，在語音上另有其他的方法。

下面談談三種用音變分化造詞的方法，以及這些方法和送气不送气的關係。對於古音的說明，主要是根據《廣韻》，不一一注出。《廣韻》以外的加以說明。

一、從聲調分化造詞，而分化聲調的結果在現代北京音里形成送气和不送气的區別。用變化聲調的方法分化造詞，在古代是大量應用的。例如“多少”的“少”是上聲，“老少”的“少”是去聲；“相處”的“處”是上聲，“處所”的“處”是去聲；“担任”的“担”是平聲，“担子”的“担”是去聲，等等。“彈琴”的“彈”和“彈弓”的“彈”正是這種變化。“彈琴”的“彈”是平聲，“彈弓”的“彈”是去聲。為什麼“彈琴”的“彈”在現代北京音里送气而“彈弓”的“彈”不送气呢？這是屬於古今音變的另一個問題。凡是古代的濁塞音或濁擦音（並、定、从、澄、崇、船、群各母字，這些都是所謂“全濁聲母”），如果是古平聲，現代北京音一律送气；如果是古仄聲（上、去、入），現代北京音一律不送气。例如“唐、蕩、宕、鐸”古聲母相同，全是濁塞音“定”母，在隋唐的時候並沒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區別。^③ “唐”是古平聲，現代北京讀音就是送气的[tan]，“蕩、宕、鐸”是古仄聲（上、去、入），現代北京讀音就是不送气的[tan] [tan] [tuo]。“情、靜、淨、簪”古聲母相同，全是濁擦音“从”母，也沒有送气不送气的區別。“情”是古平聲，現代北京音就是送气的[tʂiŋ]，“靜、淨、簪”是古仄聲（上、去、入），現代北京音就是不送气的[tʂiŋ] [tʂiŋ] [tʂi]。“彈琴”的“彈”“徒干切”，“彈弓”的“彈”“徒案切”，同是古濁塞音“定”母字，在隋唐的時候並沒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區別。它們的區別只是聲調的不同。“彈琴”的“彈”是古平聲，現代北京音就是送气的[t'an]；“彈弓”的“彈”是古去聲，現代北京音就是不送气的[tan]。聲調的不同才是原來分化造詞的條件。至於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別是語音歷史發展的結果，同原來分化造詞或者區別形態是無關的。以下各例全是屬於這一類的：

調“調和”的“調”“徒聊切”，古平聲，現代北京音送气[t'iau]。“音調”的“調”“徒吊切”，古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iau]。兩者全屬古定母。

① 見徐世榮《普通話語音講話》，文字改革出版社，119頁。

② 見孫常叙《漢語詞匯》，吉林人民出版社，133—134頁。

③ 根據江永《音學辨微》的說法，定母是“透之波”，這些字的古聲母全是送气的濁塞音。

便 “便宜”的“便”“房連切”，古平聲，現代北京音送氣 [p'ian]。“方便”的“便”“婢面切”，古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pian]。兩者全屬古並母。

傳 “傳達”的“傳”“直攀切”，古平聲，現代北京音送氣 [ts'uan]。“傳記”的“傳”“直戀切”，古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suan]。兩者全屬古澄母。

強 “強健”的“強”“巨良切”，古平聲，現代北京音送氣 [tɕ'ian]。“倔強”的“強”（僵）“其兩切”，古上聲（現代北京音變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ɕian]。兩者全屬古群母。

藏 “隱藏”的“藏”“昨郎切”，古平聲，現代北京音送氣 [ts'an]。“寶藏”的“藏”“徂浪切”，古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san]。兩者全屬古從母。

重 “重複”的“重”“直容切”，古平聲，現代北京音送氣 [ts'un]。“輕重”的“重”“直隴切”，古上聲（現代北京音變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sun]。兩者全屬古澄母。

陳 “陳列”的“陳”“直珍切”，古平聲，現代北京音送氣 [ts'an]。“行陳”的“陳”（今作“陣”）“直刃切”，古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氣。兩者全屬澄母。

騎 “騎馬”的“騎”“渠羈切”，古平聲，現代北京音送氣 [tɕ'i]。“輕騎”的“騎”“奇寄切”，古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ɕi]。兩者全屬古群母。

馱 “牲口馱東西”的“馱”“徒河切”，古平聲，現代北京音送氣 [t'uo]。“馱子”的“馱”“唐佐切”，古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uo]。兩者全屬古定母。

傍 “傍邊”的“傍”（今作“旁”）“步光切”，古去聲，現代北京音送氣 [p'an]。“依傍”的“傍”“蒲浪切”，古去聲，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pan]。兩者全屬古並母。

二、從聲母的清濁分化造詞，而分化的結果在現代北京音里形成送氣和不送氣的區別 塞音和塞擦音的清和濁在現代漢語許多方言里已經沒有區別意義的作用。一般濁塞音或濁塞擦音和清塞音或清塞擦音合流，而濁塞音和濁塞擦音消失了。北京音就是這樣。但是在古漢語里塞音和塞擦音的清濁有區別意義的作用，彼此的界限很嚴。古代用音變分化造詞的時候，聲母的清濁也是一種條件。

《顏氏家訓·音辭篇》記載南北朝人對“敗”字的解釋說：“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後一“敗”音“補敗反”。《廣韻》去聲“破他曰敗，補迈切”，屬幫母，是清聲母。又“自破曰敗，薄迈切”，屬並母，是濁聲母。在現代北京音里塞音不分清濁，並且幫母原來就不送氣，幫母的“敗”在現代北京音里還是不送氣。並母古平聲字在現代北京音里送氣，古仄聲字（上、去、入）在現代北京音里不送氣，並母的“敗”雖然是濁母，但是是去聲，所以在現代北京音里還是不送氣。因此兩個不同音的“敗”在現代北京話里成了同音。又例如“脊背”的“背”“補妹切”，屬幫母，是清聲母。“棄背”的“背”“蒲昧切”，屬並母，是濁聲母。但是兩者都是去聲。幫母的“背”原來就不送氣；並母的“背”，因為是去聲，現代北京音也不送氣。因此兩個“背”在現代北京話里也同音。又例如“區別”的“別”“方別切”，屬幫母，是清聲母。“離別”的“別”“皮列切”，屬並母，是濁聲母。但是兩者都是入聲。因此並母的“別”在現代北京話里也不送氣，和幫母的“別”同音。如果分化出來的兩個詞全是古平聲，清聲母原來又是不送氣的（幫、端、精、知、庄、章、見各母字），現代北京音還是不送氣，濁母的（並、定、從、澄、崇、船、群各母字）現代北京音就是送氣的了。

以下各例全是古平聲，因聲母的清濁分化成兩個詞。清聲母的現代北京音不送氣，濁聲母的現代北京音送氣。清聲母的現代北京音是陰平，濁聲母的現代北京音是陽平。

朝 “朝廷”的“朝”“直遙切”，屬古澄母，現代北京音送氣 [ts'au]。“朝夕”的“朝”“陟遙切”，屬古知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san]。

期 “日期”的“期”“渠之切”，屬古群母，現代北京音送氣 [tɕ'i]。作為“周年”用的“期”（亦作“朞”）“居之切”，屬古見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ɕi]。

以下各例雖然從意義上看還不敢斷定就是從一個概念分化出來的兩個詞，但是送氣和不送氣的規律是和上邊兩個例相同的。

奇 “奇異”的“奇”“渠羈切”，屬古群母，現代北京音送氣 [tɕ'i]。“奇偶”的“奇”“居宜切”，屬古見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ɕi]。

幾 “近也”“渠希切”，屬古群母，和“祈”同音，現代北京音應該是送氣的 [tɕ'i]。“庶幾”的“幾”“居依切”，屬古見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氣 [tɕi]。

會 “曾經”的“曾”，“昨棱切”，屬古從母，現

代北京音送气 [ts'ɛŋ]。又“則也”“作滕切”，屬古精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tsɛŋ]。

般 “乐也”“薄官切”，屬古並母，現代北京音送气 [p'an]。“般运”的“般”（今作“搬”）“北潘切”，屬古幫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pan]。

如果分化出来的两个詞（或者詞素）全是古平声，一个是濁母，另一个虽然是清母但是原来就是送气的（滂、透、清等母字），这两个詞（或者詞素）在現代北京音里还都送气。不过清声母的是阴平，濁声母的是阳平。例如：

从 “就也”“疾容切”，現代北京音送气 [ts'ʊŋ]，讀阳平。“从容”的“从”“七恭切”，屬古清母，原来就送气，現代北京音还是送气，讀阴平。

飄 老子“飄風不終朝”的“飄”注“疾風也”，“符霄切”，屬古並母，現代北京音送气 [p'ian]，和“飄”同音，應該讀阳平。“飄飄”的“飄”“撫招切”，屬古滂母，原来就送气，現代北京音还是送气，讀阴平。

这两个例虽然从意义上看还不敢断定都是从一个概念分化成两个詞，但是它們在送气和不送气的变化上是合乎上边所說的規律的。

三、声調和声母的清濁全异，作为分化造詞的条件，而分化的結果在現代北京音里形成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分化的結果，如果古濁声母的是古平声，古清声母而原来又不送气的是古仄声（上、去、入），在現代北京音里一个送气，一个不送气，即濁声母的送气，清声母的不送气。例如：

長 “長短”的“長”“直良切”，屬古澄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 [ts'an]。“生長”的“長”“知丈切”，屬古知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tsaŋ]。

錢 “錢币”的“錢”“昨仙切”，屬古从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 [tɕ'ian]。又古田器，“即淺切”，屬古精母，古上声，和“翦”同音，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tɕian]。

屏 “屏風”的“屏”“薄經切”，屬古並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 [p'in]。又“蔽也”，“必野切”，屬古幫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pin]。

如果古濁声母的是古仄声，古清声母的是古平声，但是这个清声母原来就送气（次清），在現代北京音里也是一个送气，一个不送气。送气的是古清声母，不

送气的是古濁声母。例如：

圖 “圓圈”的“圖”“去爰切”（見《集韻》），屬古溪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 [tɕ'yan]。又“魯圖”，“求晚切”，屬古群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tɕyan]。（古上声全濁声母的字現代北京音变去声。）

如果古濁声母的是古仄声，古清声母的是古仄声，但是原来就不送气，現代北京音两者全不送气。例如：

斷 “斷絕”的“斷”“徒管切”，屬古定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決斷”的“斷”“丁貫切”，屬古端母，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也不送气。因为古上声全濁声母的字現代北京音变去声，所以两者变成同音，全是 [tuan]。

如果古濁声母的是古仄声，古清声母的是古平声也是原来就不送气，現代北京音也是两者全不送气。例如：

漸 “漸次”的“漸”“慈染切”，屬古从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漸染”的“漸”“子廉切”，屬古精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也不送气。两者全是 [tɕian]，但是声調不同，前者变成去声，后者是阴平。

从上述的情形看来，許多詞或詞素的分化在現代北京音里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但是上述这些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全是語音历史演变的結果，并不是原来分化造詞的方法，如果能够找到一些詞的分化，在古代原来就是用送气和不送气来区别的，这就是說原来就是用幫母和滂母、端母和透母、精母和清母、知母和彻母、庄母和初母、章母和昌母或見母和溪母来区别意义，这样才是用送气和不送气作为分化造詞的方法。但是这样的例証是很难找到的。有人說“孝弟”的“弟”讀 [t'i]，“兄弟”的“弟”讀 [ti]（例如陈玄先生編的《汉字异义异讀举例》）。这好象是用送气和不送气分化成的。但是根据《广韻》“孝弟”的“弟”（《广韻》作“悌”）“特計切”，古去声。“兄弟”的“弟”“徒礼切”，古上声。两者的声母相同，全屬定母。兩者的分化条件还是声調，而不是声母的送气和不送气。按古今音变化規律，古全濁声母仄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两者全是仄声，都应该不送气。并且古全濁声母的上声字，現代北京音变去声。因此两者在現代北京音里應該同音，全讀 [ti]，全讀去声。

在《广韻》里可以找到以下的字，它們全有送气和不送气两讀，但是意义相同。这样的只能說是同一个詞有异讀或又音，不能說是用送气和不送气分化成的

两个詞。

胞 有“布交”和“匹交”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幫母，后者屬滂母；但全是“胞胎”。

鹹 有“古羶”和“苦盞”两切，全是去声，前者屬見母，后者屬溪母；但全是“苦味”。

𦵏 有“陟卫”和“嘗苒”两切，全是去声，前者屬知母，后者屬徹母；但全是“嘗也”。

𦵏 有“布还”和“普班”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幫母，后者屬滂母；前者是“挽也”，后者同“攀”，“引也”，“挽”和“引”都是“拉”的意思。

适 有“古活”和“苦括”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見母，后者屬溪母，但全是“疾也”。

鎮 有“多珍”和“他典”两切，全是上声，前者屬端母，后者屬透母；但全是“小釜”。

擗 有“朴各”和“匹各”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幫母，后者屬滂母；前者是“手击”，后者是“击也”。

綖 有“子心”和“七林”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精母，后者屬清母。前者是“縫綖”。后者，《广韵》引《说文》“綖，綖也”。但是根据段玉裁的注，应删“綖”字，则两者全是“綖”。“綖”字和“縫”字形相近，也可能就是縫字之誤。

类似以上这样的，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也有些字有送气和不送气两讀而意义不同，但是这样不同的意义，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很难說是从一个概念分化出来的。例如：

卒 有“臧沒”和“仓沒”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精母，“隶人給事者衣为卒”。后者屬清母，“急也”。

𦵏 有“伯加”和“普巴”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幫母，是“兵車”。后者屬滂母，“方言云江东呼鏡箭”。

𦵏 有“古肴”和“口交”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見母，“膠漆、亦太学也”。后者屬溪母，“面不平也”。

𦵏 有“側革”和“楚革”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

庄母，“鮮好”。后者屬初母，“健急兒”。

𦵏 有“博孤”和“普胡”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幫母，“壘上平也”。后者屬滂母，“衰也”。

类似以上这样的也还有一些，也不一一列举了。

另外也有极少数的字有送气和不送气两讀而意义不同，好象多少有些关联，例如：

吧 有“伯加”和“普巴”两切。全是去声。前者屬幫母，“吧呀小儿忿爭”。后者屬滂母，“吧呀大口兒”。

𦵏 有“公陷”和“口陷”二切。全是去声。前者屬見母，“𦵏切剖面也”。后者屬溪母，“𦵏𦵏而長兒”。

还有少数字，除了它所表示的意义之外，又是地名或姓氏。二者的讀音有送气和不送气的不同。作为地名或姓氏的也可能是从非地名或非姓氏的分化出来的。例如：

漱 有“卽由”和“七由”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精母，“水名”。后者屬清母，“水池名，北人呼”。

鞠 有“居六”和“羈菊”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見母，“推穷也，养也，告也，盈也”。后者屬溪母，“姓也”。

屈 有“九勿”和“区勿”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見母，“屈产地名，出良馬”。后者屬溪母，“拗曲，亦姓”。

象上边这样意义好象有关联的例子是个别的。如果送气和不送气是古代分化造詞的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分化成的詞應該有一定的数量保存下来，例子不該象現在这样难找。因此象上边这样个别的例子也很可能是偶然碰巧，好象两者的意义有联系，实际上它們并没有分化的关系。

总之，有些人通过一些例証企图說明語音中的送气和不送气曾經是分化造詞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些例証都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解釋，不足以說明他們的看法的正确，除非另有充分的材料来証明。但是这样充分的材料，現在还不容易找到，因此現在对这个问题也就只得暂时存疑。

詞義演變二例

(汉语词汇史杂记)

張永言

研究个别词语的历史是语言史的一项重要工作。苏联语言学家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就很重视这种研究，他写过一系列的论文，分别探讨了一百多个俄语词语的历史。加尔金娜-費多盧克教授认为这是他在语言学上的重要功绩（见《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六十岁纪念论文集》，1956，6页，302-3）。以汉语历史之悠久，文献之丰富，个别词语历史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也更为艰巨，决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了或做得好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个对汉语词汇学、语义学和词典学都有重大意义的工作。郑奠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汉语词汇史随笔》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因此，抄出杂记两条作为我们提出这个意见的引子。

聞

“聞”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听到”或“听见”，这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说文》十二篇上：“聞，知声也。从耳，門声。”由此又引申为“名声”或“名誉”的意思。到了现代汉语里，“聞”却只有“嗅”的意思，词义从听觉方面转移到嗅觉方面来了。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可是关于它发生的时代似乎很少有人讨论到。日本学者太田辰一在《近代汉语“无心”的动词的形成过程》这篇论文里，接触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变化发生在六朝时代。我们没有机会读到这篇文章的全文，从《中国语文》1953年10月号所载的节译文看来，论据只有如下两条：

长安万里，或聞香气芳。（博物志）

寮属聞其芬馥，称之于充，充意知女与旁通。（晋书）

这里我们认为有三点值得商榷。首先，论断不可靠。因为“聞”的这个新意义的产生不是在六朝，而是远在西汉，这有司马迁的著作为证：

罗襦解解，微聞香澤。（史记·滑稽列传，百衲本，卷一二九）

其次，史料的运用欠周密。唐修《晋书》不能作为论证六朝语言的材料。事实上，“聞”的新意义产生以后，起初力量似乎很微弱；可是到了魏晋时代就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丰富的语言史料可以作证，单是《博物志》一

条似乎稍嫌不足。第三，引文不举卷次篇名版本，文字颇有脱误。现在我们举出较多的用例如下，借补太田辰一引证之未备：

江表惟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抗穰邪？上风吹之，五里聞香。（曹丕：与朝臣书，全三国文卷七）

恪将见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盟渺，聞水腥臭。（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二十五史本，卷六十四）

西使临去，又发香器如大豆者，试著宫門，香气聞长安四面数十里中，經月乃歇。（张华：博物志，指海木，卷三）

长安中百里咸聞香气芳。（同上）

初，匈奴夫人有罪，以璽死。既殯，尸不臭而香聞十余里。（干宝：搜神记，丛书集成本，卷一）

陈寔以韩寿为掾，每会，聞寿有异香气，是外国所贡，著衣历日不歇。（郭澄之：郭子，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七十六）

〔贾充〕后会諸吏，聞寿有奇香之气。（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篇）

桓車骑时，有陈庄者入武当山学道，所居恒有白烟香气聞彻。（世说新语佚文，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附录）

既殯，尸香聞十余里。（汉武故事，卷三：古小说钩沈）

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于千步也。（任昉：述异记，汉魏丛书本，卷下）

千年松香聞于十里，亦謂之十里香。（同上）

又有千和香，香气芬馥，聞之使人动諸邪态，兼令人睡眠。（唐译：金楼子·箴戒篇，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一）

山多大树，与楸木相类，而花叶香聞数百里，名为反魂树。（十洲记，汉魏丛书本）

灵鷲千寻上，空香万里聞。（庾信：道士步虚词十首之八，四部备要本，庾子山集注卷五）

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聞”用于嗅觉方面在六朝时代已经极其普遍，这就不是一种语言现象最初发生时的状态了。

到了唐代，“聞”的新意义继续发展着。太田辰一的论文里只举了三个例，而其中杜甫诗一条即是《辞

海》所引的一條，韓愈詩一條即是《辭源》所引的一條（見兩書“聞”字下），這顯然是很不夠的。事實上，指嗅覺的“聞”字，從初唐到晚唐文獻中是數見不鮮的。據我們所知道的，散文有《晉書》《梁書》《法苑珠林》《紀聞》《杜陽雜編》等；韻文除了太田辰一提到的王維、杜甫、韓愈詩以外，有沈佺期、孟浩然、元結、元稹、溫庭筠、李商隱、韓偓、陸龜蒙等人的詩。為了節省篇幅，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仅

王力先生在《理想的字典》（1945，1955）、《新訓詁學》（1947，1958）和《漢語史稿》下冊（1958）里談到詞義演變的時候，都舉了“仅”為例，說明唐代“仅”的意義跟近代不同：唐代的“仅”是甚言其多，而近代的“仅”是甚言其少。王先生認為這是段玉裁的發現，說“段玉裁的眼光最為敏銳，譬如他注釋‘仅’字，會注意到唐代的‘仅’和清代的‘仅’不同”（《新訓詁學》，見《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186頁，又《漢語史論文集》287頁）。

據我們所知道的，最先注意到這一點的不是小學家段玉裁（1735—1815），而是比他早生一百年的詩人王士禛（1634—1711）。《香祖筆記》卷二有一條說：

“仅”字有少、余二義，唐人多作余義用。如元微之云：

“封章諫草繁委箱笥，仅逾百軸。”白居易《哭唐衢》詩：“著文仅千首，六義无差忒。”小說《崔樵傳》：“大食國有兩燧珠，趙佗令人航海盜歸番禺，仅千載矣！”《甘澤謠·陶岷傳》：“浪迹怡情，仅三十載。”《撫言》：“曲江之宴，長安仅于半空。”《玉壺清話·南唐先主傳》：“吳越災，遣使唁之，資帑帑糧，仅

百餘艘”之類。至宋人始率從少義，迄今沿用之。

這里引用的白居易詩，《崔樵傳》（案，見《太平廣記》卷三十四），《甘澤謠》（案，《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引），《唐摭言》和《玉壺清話》五條都是段玉裁和王先生所未及的。此外，我們可以順便補充一條。《太平廣記》卷五十四引杜光庭《仙傳拾遺》：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墓云水不歸，仅二十年，杳絕音信。

在這些文獻里，《唐摭言》、《仙傳拾遺》和《漢語史稿》（下冊，561頁）提到的《金華子》是五代時候的作品，《玉壺清話》和《漢語史稿》（下冊，561—2頁）引用的《唐語林》是宋代的作品，可是“仅”字的意義和用法都還是率由舊章，這就表明了語言的變化以漸不以驟，而王士禛所說的“至宋人始率從少義”是不夠確切的。

當語言里某個詞義的變化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時候，人們對這個詞的舊意義和舊用法就會逐漸陌生，甚至不能理解，因而有任意篡改古書文字的事情發生。“仅”字就遭遇過這樣的命運，例如，杜甫《泊岳陽城下》詩里“江國逾千里，山城仅百層”的“仅”字，有的本子給改成了“近”字；袁郊《甘澤謠·陶岷傳》的“仅三十載”，到了元末明初陶宗儀的手里就給改成了“垂三十年”（見涵芬樓本《說郛》卷十九）。在改革者看來，這樣才好理解，可是語言歷史的事實卻被粗暴地抹煞了。在處理語言史料的時候，這類現象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一方面要去偽存真，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它們作為窺探語言變化的時代的旁證。

（上接47頁）

馬禮遜方案的藍本就是《字典稿本》方案，只把拼寫法修改得更加接近英文，例如i改作e，u改作oo，g改作ts，x改作sh。

鴉片戰爭（1840）以後的艾約瑟方案（1857）和威妥瑪方案（1867）都以馬禮遜方案為參考。把馬禮遜方案跟後來成為國際通用的威妥瑪方案比較一下，可以看出：一、威妥瑪繼承了馬禮遜方案，保留了原來一些突出的特征。例如P T A有兩套寫法，馬作ts，ts'，s和tsz，tsz'，sz，威作ts，ts'，s和tz，tz'，sz(ss)；R的寫法，馬作urh，威作érh。二、威妥瑪修正了馬禮遜方案。主要的修正是完全拼寫北京語音；其次是拼寫法簡化和一致化，保留接近英文的特點，但是不過份遷就英文。例如oo改回u，e改回i，H < T不分“尖團”。

從上面這些比較，可以明白，從利、金方案到威妥瑪方案，中間馬禮遜方案起着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

《中文字典》還刊載一個廣州方言和官話的對照音節表（見第二部份第一冊）。關於這個廣州方言方案的

來源沒有說明。從這個對照表可以知道，廣州方言在鴉片戰爭前至少二十年就已經有了教會羅馬字方案，不但遠在廣州話《新約》零卷出版（1877年前）以前，比廈門話《約翰福音》出版（1852）也至少早三十多年。

當時還沒有漢民族共同語的認識，官話被稱為“官話方言”。馬禮遜方案是官話拼音方案發展過程中的里程碑之一，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後來在各地擬訂方言教會羅馬方案和出版方言字典的前導。這些工作，起初的目的是方便來華傳教士和其他外國人學習中國語文，後來發展成為對我國人民傳教的文字工具。

馬禮遜方案在漢語拼音方案的發展歷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是必須認清，他當時編印字典和擬訂方案完全不是為我國人民服務，而是為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服務。他的字典開始出版在鴉片戰爭以前二十五年，那時候英國的侵略機構東印度公司已經把印度作為基地而積極圖謀中國了。《中文字典》正是在這個東印度公司的資助下並且由這個公司的澳門印刷廠印成的。

高等院校語言學課程問題討論

“古漢語”的教學目的

張永錦

梁振仕同志的《高等師範院校中文系能夠不講漢語音韻學嗎？》（見《中國語文》1959年7月號）的意見，是針對北京師範大學編的《漢語講義（初稿）》古漢語部分只講語法而提出的。我完全同意這個意見。現在據說北京師範大學已經擬訂了新的“古漢語教學大綱”初稿，內有音韻部分。那麼，對高等師範院校中文系能不能講音韻學，看來爭論不會太大；問題只是在於講音韻學的目的和怎樣講。對於這個問題，我不大同意梁振仕同志的意見。

梁振仕同志認為：“漢語音韻不但要講，並且要系統地講。”這是就古漢語課而說的。我認為，高等師範院校“古漢語”的教學應該面向古典文學，為學生閱讀古典作品服務。為貫徹這個目的，可以教給學生一些古漢語的知識：應在學習現代漢語的基礎上了解一些古今語言的異同。可是，梁振仕同志認為“通過漢語音韻的學習，可以使學生了解現代漢語語音的歷史繼承性”，並且以現代漢語四呼的來源等情況為例，說明“通過這種歷史的分析，自然就能更深刻地了解漢語拼音方案，同時也能更深刻地了解現代漢語的語音”。很顯然，他認為古漢語音韻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現代漢語，說明漢語的歷史發展情況。這同綜合大學“漢語史”的音韻部分有什麼不同呢？給古漢語音韻學確立這樣的教學目的，我認為是本末倒置的。

在教學改革以前，對古漢語音韻部分的教學目的，有些學校有類似梁振仕同志的提法：就是既要了解漢語歷史發展，又要為閱讀古典作品服務。結果怎樣呢？教學脫離實際，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在這種情況下，有好些學校改“古漢語”為“文言語法”，緊緊扣住了為閱讀古典作品服務的目的。現在看來，講一點音韻、詞匯，對閱讀古典作品也有幫助，所以應該加進去。但是，這決不意味著回復到以前的情況。

至於怎樣講的問題，我認為陸宗達等三位先生的

提法（《古漢語如何為今服務》，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8年第3期），原則上是正確的。這就是針對同學在閱讀古典作品的語言上的困難，不宜牽涉過寬。教學方法和內容應該決定於教學目的，既然“古漢語”教學為閱讀古典文學服務，那麼就應該講同古典作品有關的問題。

附帶說一下，梁振仕同志說到前人对音韻學的研究成果，應該繼承下來。這提法在原則上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要哪些人繼承呢？高等師範院校中文系主要培養中學語文師資，要他們來繼承這些音韻學遺產，有沒有必要呢？這問題也是值得討論的。

方言調查實習工作的體會

北京大學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言學及方言調查教學小組

教學改革以後，北京大學的“漢語方言學”課程改名為“漢語方言學及方言調查”，並且改為第一學期先講方言調查方法（包括記音練習），學期末出外調查實習，第二學期再講方言學的一般理論和漢語方言概況。

根據這樣的安排，中文系語言專門化三、四年級同學於1959年7月20日到8月4日大約兩週的時間內，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山西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協助下，前往山西雁北地區進行了一次方言調查實習。調查內容包括：1)字音，2)變調、輕聲、重迭、兒化，3)詞匯和語法特點。各點都按照規定在記完材料後就地整理出“音系說明”和“同音字表”等，並經過初步的核對。

這樣規模的調查實習，在我們還是第一次。缺少經驗，工作中的許多細節需要摸索。這裡把我們一些粗淺的點滴體會提供給兄弟學校參考，並且希望交換意見。

首先是實習前的準備工作。在調查者方面，有兩個準備：思想準備和業務準備。

實習前要反復向同學說明實習的意義，向他們提出明確的要求；到達現場以後可能碰到的困難（包括工作上的和生活上的）也要向他們說清楚。黨團組織還

要針對同學中對待實習的實際思想情況做些工作，要使同學們切實地做好出發前的業務準備，並以正確的態度和飽滿的熱情投身到工作中去。充分的思想工作是完成實習的保證，下去以後，這一工作仍不能放鬆。

業務準備首先是聽音記音的訓練，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把調查時可能要應用的國際音標儘可能熟練地掌握。其次是調查方法的学习，主要是學習運用調查表格，了解工作程序，再次是普通話的知識。這在“現代漢語”課中本來已經學過，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次實習過程中，不少同學因為不很熟悉這些知識而感到苦惱，所以實習以前的方言課中對這些知識還要仔細溫習一番。最後是必要的漢語音韻基本知識，例如調類的分化和歸并等。在做這些準備的後一階段，最好能在校內（班上更好）找幾個點的方言（特別是將去調查的地區的方言）讓大家粗略地了解 and 探索一下。

此外，要把調查表格準備好。這次我們採用了語言研究所編的《漢語方言調查字表》；它的字數較《簡表》多，而且便於同古音比較。至於兒化、變調、詞匯、語法等，根據的是語言研究所的內部材料，加以精簡和編排的。

調查地區的選擇也很重要。這次我們所以選擇山西北部，是經過一番考慮的。因為這個地區方言比較接近北京話，但又同北京話有相當距離，並且我們在1957年的方言普查工作中，曾經調查過鄰近山西北部的張家口專區的方言，所以這次就選擇了山西北部（即雁北地區）。

做好對發音合作人的工作是不可忽視的環節。在全隊人員到達調查地區之前，就要找好恰當的發音合作人。我們對發音合作人的要求是：能說地道的當地話，有相當於初中的文化程度，基本上甚至全部說產參加工作。在大同方面因為這項準備工作做得不夠周密，結果發音合作人到先後不齊（他們是從各縣各鄉電話調來的），影響工作。調查者和發音合作人的關係也是需要注意的，很多同學同發音合作人不僅成了工作上的合作人，而且交上了朋友，發音合作人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調查實習的組織工作，我們是這樣做的：首先，雖然是“現場調查”，我們並不把調查小組分派到各個市鎮和鄉村去，這是從同學的工作能力和教師的指導力量有限的情况來決定的。兩個年級的同學分配在大同市和朔縣兩處。每一個教師負責指導三四個調查小組。為了更好地培養同學的獨立工作能力，調查小組的成員一般以兩人為宜。記音和整理工作由小組內每個成員同時做（即使是重複的）或輪流做。做完一段可

以互相校對。開始時，不妨合三四個小組為一個大組，共同審辨一個音系，之後再分小組工作。工作進行中除了請教指導教師之外，各小組仍然需要經常交流經驗，討論工作中碰到的問題，以便更廣泛地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教師要注意發揮同學的獨創精神，教師的指導不應當變成包辦代替，但也不能放任自流；特別在辨音和調查方法方面，指導教師要及時給同學以切實的幫助。這次在朔縣，針對各個調查小組普遍碰到的問題，把發音合作人都請來，由教師臨時給同學上了一堂課，效果很好。這也是一種可行的指導方式。從實習隊的領導方面來說，最好先對工作有個全面的部署，工作的每個階段開始前還要提出不同的具體的要求。教師們要經常在一起研究工作進行中的問題，提出解決辦法。

參加這次實習的人，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深切地体会到，黨和政府的領導和支持是我們勝利完成任務的最重要的保證。是黨教導我們理論聯繫實際，是黨領導我們投入實際調查工作。山西省方面，從省到專署到縣、市的教育部門，特別是大同和朔縣兩地的師範學校，給了我們熱情的關懷和支持，都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此外，山西師範學院中文系派了九位師生同我們合作，語言研究所派了兩位青年同志參加指導，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是我們在這裡應當致謝的。

方言調查不應忽視詞匯語法

夏錫章

這裡根據參加蘇北太州方言調查工作的一些體會，試就調查資料和需要注意事項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在這個工作上，我們要調查的首先是方言區的說話音，然後才是字音。如果我們只拿《方言調查字表》請發音人念，他讀的大都是字音，並非說話音；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把各個方言普遍存在的文白兩讀之間在聲母或韻母上的差異忽略掉。

因此在用《字表》調查時，應該注意到這一點，不論聲母、韻母和聲調，都不能忽略。在寫學習普通話手冊時，方言口語和普通話之間的對應規律，方言的字音和普通話之間的對應規律，都應該清楚地分別列出，交代明白。這樣對滿口“藍青官話”的方言區的人，會有更大的幫助。忽略口語或文白混雜的做法，必須及時糾正。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詞匯手冊》，最主要的缺點是收的詞語太少，比如，蘇北方言叫“茶爐子”，吳語叫“老虎灶”；又如“冰棍兒”，蘇北叫“冰棍”，南京

叫“冰棒”，吳語叫“棒冰”，《手冊》都沒有收。多收一些詞，不僅對學話人有好處，也可以為編輯方言詞典打一個基礎。當然，光靠這個材料是不夠的，方言區各有本區的特有事物；即使同一事物，名稱也有不同，意義上也有交叉。比如，蘇北方言把本地的橫着轉的風車叫“風車”，把普通話所指的叫做“洋風車”。由於蘇北當地風俗習慣，出外吃點心總要喝茶，所以吃點心叫“吃早茶”，“吃晚茶”，而“點心”又只指包子，把餛飩叫作“餃兒”，因而調查方言的人，要因地制宜地把這些詞補充進去。這本《詞匯手冊》里關於生產工具名稱、工農業生產上的用語、政治學習方面的用語，似乎更是不足。語言要為政治、工農業生產服務，這是大家都明確了的，這些方面的詞匯要特別注意補充。

因為《詞匯手冊》收詞太少，我們調查的時候，還採用了江蘇省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編印的《江蘇省上海市方言調查詞匯語法表》。它分為四冊三十二類，收的詞語較多，但是關於工農業生產用語也是收得太少，相反地，卻收進一些已經在語言中死亡或即將死亡的詞語如“老板”、“訟師”、“打卦”之類。把這些詞語當作普通話，無疑是不妥當的。

大家都承認，過去的方言研究，偏於語音方面；在方言的語法和詞匯方面，很少作過系統的分析研究。這個極其嚴重的偏向，在解放以來已經逐步在扭轉。

可是過去忽視方言語法和詞匯的分析研究，已經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僅語史在詞匯、語法研究方面缺少

了活材料的印證和補充；直到最近，寫學話手冊的人還有忽視這方面的。就是方言區的人在學習普通話的時候，也有忽視這方面的傾向。喜歡聽蘇州評彈的同志，經常可以發現這種情況：說的是普通話的語音（說得也不十分正確），用的却是方言詞語，非馬非鹿，令人哭笑不得。江蘇省崑山縣在全黨全民學習普通話運動中，先從學習普通話詞匯開始，結合教語音，然後再教拼音方案，因而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種重視詞匯差別的教學方法，值得我們學習。

各高等學校在近几年的方言調查工作中，深感人手缺乏，工作不能全面深入展開，同時隨着黨的新的教育方針的實施，又感到中文系學生參加勞動，半工半讀，難以結合專業；學生閉門讀書，缺乏實際工作的機會，找不到比較好的解決的辦法。

我認為這個矛盾是可以得到統一的解決的。高等學校中文系近來已有開設“方言調查”課程的。在學校里先學習語言學理論、方言調查的專門知識，並學會听音、記音的技術；然後組織起來，分配到各調查點去做實際工作。先在城區然後再深入農村去調查。在調查時，參加農業生產，和農民同吃同住，隨時隨地收集詞語，利用一定時間進行記音。同時向當地農民推廣普通話，人多好辦事，短時期內就能夠比較深入地完成調查工作。這樣做，有很多優點：教與學，理論與實踐，方言調查與科學研究，生產勞動與推廣普通話等各个方面都結合起來了，而幹部培養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

關於《語言學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導論）》的討論

《中國語文》1959年9月號譯載了蘇聯科學院普通語言學委員會編寫的報告書第一章《語言學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導論）》（以下簡稱《導論》）以後，引起了黑龍江大學一部分同志的熱烈反應，認為有必要進行座談，學習它的精神，改進工作。中文系漢語教研室於是在1959年12月1日舉行了座談會。

座談會中心發言人華劭同志介紹蘇聯語言學界的狀況，談了三個問題：1）俄羅斯語言學的傳統及其對蘇聯語言學的影響；2）蘇聯語言學的研究工作概況，對斯大林語言學著作的態度；3）西方語言學的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這些問題闡明以後，對大家理解《導論》是很有幫助的。

另一位中心發言人任學良同志認為《導論》總結了蘇聯語言學界思想鬥爭的狀況，明確肯定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本內容，反擊了修正主義的進攻，並對今后的研究方向、任務作了更為明確的規定。這一切將使蘇聯語言學工作進入一個新階段，世界進步的語言學家也必將從中學到許多東西，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工作水平。同時指出，中國語言學界應該進一步向蘇聯學習，繼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觀點，更好地進行語言研究工作，改進普通語言學教學。

他們發言以後展開了討論，大家對上述問題的論述基本上表示同意，特別是對目前普通語言學的內容應大加改進這一點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但是對基本詞匯、語法的抽象性這兩個問題卻爭論得很熱烈。由於時間不夠，還有個別問題討論得不够充分，現在還在繼續交換意見。（黑龍江大學漢語教研室）

对利用汉字偏旁记忆普通话字音的几点意见

金有景

一两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很多本学话手册。其中大都利用汉字谐声偏旁(以下简称偏旁)来帮助读者记忆普通话的字音。这种作法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汉字的读音跟偏旁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利用汉字的偏旁来记忆普通话的字音能够得到一定的效果。现在这项工作虽然已经作出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有些具体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

(一)“例外”问题。这主要是关于 z, zh 的偏旁。有两点须要提出,第一,有的学话手册(例如《贵州人学习普通话手册(遵义、赤水等县适用)》)在列举 z, c, s 的偏旁时,①把“乍”等作为 z, c, s 的偏旁,把“窄炸…”等字作为例外字处理。在列举 zh, ch, sh 的偏旁时,又把“乍”作为 zh, ch, sh 的偏旁,把“作、昨”等字作为例外字处理。例如:

z, c, s 的基础字	类推 标志	类推举例	类推 字数	例外字(卷舌音)
作	乍	昨酢炸怎	10	窄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第55页)

zh, ch, sh 的基础字	类推 标志	类推举例	类推 字数	例外字(平舌音)
乍	乍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12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炸”字疑是排错—— 本文作者) (第60页)

一方面说“乍”是 z, c, s 的偏旁,读 zh, ch, sh 的“窄、炸”等字是例外字;一方面又说“乍”是 zh, ch, sh 的偏旁,读 z, c, s 的“作昨…”等字是例外字。这样说不免自相矛盾,引起读者怀疑。

第二,象“乍”这种 z, zh 两可的偏旁,有的书(例如《苏州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只举 z 或 zh, 没有交代另一种可能的读法。例如:

- 念 zh 的:…乍(炸炸炸炸)… (第47页)
 - 念 c 的:…才(材财)…参(惨)… (第48页)
 - 念 s 的:…叟(叟搜艘艘艘)… (第48页)
- 没有交代“作昨…”等字读 z 声母,“豺”读 ch 声母,“参人~参”、“瘦”读 sh 声母。这样容易让读者犯类推错误的毛病,把“作豺瘦”等字也读成 zhuò, cāi, sòu。

要避免上述两项缺点,可以从普通话读 zh, ch, sh 的字的偏旁来加以分析。普通话读 zh, ch, sh 的字的偏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跟 z, c, s 的字不同偏旁的,一类是跟读 z, c, s 的字同偏旁的。前一类的偏旁如“耆、尙、召、章、主、寺、朱、至、占、中、蜀、正、覃、查、真、垂、昌、庶、申、术、执、折、童、尊、易、善、由”等等。后一类偏旁如“乍、且、宗、叟、参、才、察、仓、差、朔、束、足”等等。前一类偏旁我们可以放心地把它当作 zh, ch, sh 的偏旁,有例外就当作例外,例如带“寺”偏旁的字都读 zh, ch, sh, 只有“寺”读 sì, 就可以把“寺”当作例外字。后一类偏旁则不能简单地当作 z, c, s 的偏旁或 zh, ch, sh 的偏旁,而应该作为 z, zh 两可的偏旁来处理。当然,后一类偏旁里确有一些是大多数的字属于 z 或 zh 的,只有个别字例外,例如“叟”读 sǒu, “搜、颉、艘、艘、艘”等字都读 s 声母, 只有一个“瘦”字读 sh 声母。再如“宗”读 zōng, “棕、踪、棕、综、紫”等字都读 z 声母, 只有一个“崇”字读 ch 声母。象“叟、宗”这种偏旁, 为了便于读者记忆, 我们把它当作 z, c, s 的偏旁, 而把“瘦、崇”当作例外字也是可以的。

(二)偏旁的分析归纳。为了使读者容易接受,分析偏旁不宜过细。一般说来,分析归纳应该限于现在通行的汉字字形,不能追溯到更早的字形。不过,对于现在通行的字形却要分析得更细致、更精确一些。现在一般学话手册里这方面基本上是做得很好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还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有时候把一个偏旁分成几个偏旁,有时候又把几个偏旁混成一个偏旁。把一个偏旁分成几个偏旁的,例如《南京人学习普通话手册》第52页 ang 的偏旁里有:

- 常——嫦
- 赏——償(简体:偿)
- 尙——堂堂堂
- 堂——膛螳
- 敝——廠(简体:厂)

其实,这些字只说一个偏旁“尙”,改成下面这样子就会

① “z, c, s 的偏旁”应该是“z, c, s 为声母的汉字的偏旁”,这里是为了叙述方便的说法,以下同。

更便于讀者記憶：尙——賞償(償)常娼堂螳棠掌敝廠(廠)。

把几个偏旁混成一个偏旁的，如《貴州人学习普通話手冊(遵义、赤水等县适用)》56頁把“佳、隻、雙”等字都归在“佳”(說文：“鳥之短尾总名也”)这一个偏旁下面。“佳”的声旁是“主”，不是“佳”。同时，“隻、雙”的“佳”并不是声旁。因为“隻、雙”并不是形声字。“隻、雙”底下的“又”是“手”字(古写作𠂇)，“佳”(古写作𠂇)是短鳥的鳥的象形字，利用偏旁来記憶字音时，偏旁必須是“声旁”，即表示字的讀音的偏旁，而不能是形旁或其他性質的偏旁。更不能把几个不相干的偏旁当作一个偏旁。否則就会增加讀者記憶字音的困难。就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这也算是一种錯誤，因此我們必須注意这一点。

(三) 收字範圍問題。一般說来，分析归納偏旁时，只收較常用的字就够了。不必收那些不大常用的字。現在有些學話手冊收的不大常用的字似乎多一些。例如“鮮醪管作”这种字完全可以不收。收进去只会增加讀者的負担。

(四) 偏旁取舍問題。有的偏旁字数很少，而且有时还不常用或有例外。那末就不如干脆不要这些偏旁。光举一些字数管得較多的偏旁，对讀者也許会更有

帮助。因为利用偏旁来記憶字音为的是帮助讀者节省記憶力。偏旁太多，管的字太少，对节省記憶力没有什么帮助。

(五) 簡体字問題。汉字簡化後跟原来的字形有了某种程度的不同。我們在列举同偏旁的字时，对于簡化字，須要有不同的处理。現在的學話手冊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法。一种是以繁体为主，加注簡体。例如：

舊——灌罐霍歡(欢)勸(劝)權(权)……

另一种是以簡体为主，加注繁体。例如：

产(產)——刺鏟

这两种处理法都可以采用，不过前一种似乎更便于讀者联想記憶，当然也不能太机械，把两种处理法交叉着使用也是可以的，总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現在有少数學話手冊在处理簡化字时，既不用“繁体为主，加注簡体”的办法，也不用“簡体为主，加注繁体”的办法。只是單列簡体字。例如：

贊——站攢攢……

这样处理，讀者联想記憶不便。建議以后編写學話手冊，最好能避免。

以上几点意見不一定都正确，只是供有关同志的参考而已。

山东师范学院語言学教研組最近的科学研究活动

1959年国庆节前，毛澤东語言研究小組的四位同志，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下，反右傾，鼓干劲，在不到一个月的時間内，就每人大致把三卷《毛澤东选集》和《选集》以外的著作都看完了，并根据不同的論点，整理出了丰富的資料，在9月25日完成了共計七万多字的五篇論文，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的献礼。五篇論文的題目是：1) 毛主席关于語言运用和学习的理論及其实践；2) 毛主席語言的形象性和战斗性；3) 毛主席关于成語的运用；4) 毛主席关于諺語的运用；5) 毛主席关于文言詞語的运用。国庆节后，小組經過討論和修改，将它定名为《毛主席語言研究》，現在已由系总支轉院科委会审查。

为了迎接1960年元旦，組内同志除了投身于全院正在展开的轟轟烈烈的整風运动之外，仍然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向元旦献礼的項目有：1) 高等学校語法課堂教学；2) 汉语詞汇論集；3) 古詩詞的格律及其韵脚；4) 济南人学习普通話手冊。

根据院科委会和系总支的布置，十一月份就确定了1960年的科学研究項目。除了將《現代汉语》、《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講义进一步修訂以及某些教师就現代汉语中某些具体問題写些文章外，明年的科学研究集体項目有：1) 山东方言詞汇調查(現已进行)；2) 現代汉语的緊縮詞(准备編写緊縮詞詞典)；3) 《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参考資料。个人項目有：1) 詞儿連写問題；2) 普通話学习手冊(一本)；3) 語法教学中的图解；4) 現代汉语函授教学；5) 成語和諺語；6) 《說文解字》研究(1961年完成)；《世說新語》語言研究；7) 試論《史記》的語言；8) 《孟子》、《論語》語言漫談。(子朗)

语文短评

672 楊繼振对于古泉币的学識远远不如他的朋友鮑子年那样丰富。鮑子年确是一位收藏和研究古泉币的專門名家,但和楊繼振相比,显然有上下床之別了。(文汇报 1959年7月22日3版)

前后两句的意又自相矛盾。毛病在于没有安排好比与被比者的位置。可以这样改:“…鮑子年确是…專門名家,楊繼振要跟他相比,显然…”。(殷之华)

673 八月六日人民日报以“克服右傾情緒,厉行增产节约”为题的社論,这是一个战斗的号角!(青年报 1959年8月11日社論)

如果把“八月六日…为题的社論”看作主語,那么底下的“这”字是多余的;如果要保留这个“这”字,那么就須把“这”字前面的話改成一个句子,說成“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为题的社論”。(沈錫儒)

674 东单头条路南房屋在这八十公尺之内,所以把背面临东长安街的房屋都被拆除了,……(北京日报 1959年8月13日3版)

这句话的毛病不止一处。1)“把”和“被”用在一件事上,施动被动自相矛盾,从施事方面說該用“把”,从被动方面說該用“被”,任何一件事物本身不可能身兼二用,既是施动又是被动。在这句話里,“把”“被”不該并存。2)“东单头条路南的房屋”也就是“背面临东长安街的房屋”,在一句話里,对同一件事物,何必前后改名呢?“同物异名”是有害于句意的显露的。这句话可以简化成:“东单头条路南的房屋在这八十公尺之内,所以都被拆除了。”(徐仲华)

675 鴉片战争不久,我国第一家銀行——中国通商銀行創設的四十九年前,即1843年英国的东方銀行(即丽如銀行)就在上海設立营业机构,地点就在外滩。(新闻日报 1959年8月20日3版)

讀者念到一半就会产生这个疑問:鴉片战争发生于1842年,中国通商銀行創設在1843年的后40年,怎么能說成是“鴉片战争后不久呢”?其实作者原来要說的話是这样的:鴉片战争后不久的1843年,即我国第一家新式銀行——中国通商銀行創設前49年,英国的东方銀行(即丽如銀行)就在上海外滩設立营业机构。(沈士英)

676 9月16日羅馬尼亚十七岁少年女子运动员巴拉斯以2比0(21比9,21比16)击败来自立陶宛的年仅十一的女学生巴拉伊希奇,分获少年女子組冠軍、亞軍。(体育报 1959年9月23日4版)

前一分句謂語是“击败”,主語是“巴拉斯”;后一分句的謂語是“分获”,它的主語照意思上看是“巴拉斯”同“巴拉伊希奇”两个人,照語法构造上看,却該是“巴拉斯”,因为前一分句“巴拉斯”是主語,后一分句主語沒出現,照承前句的規律看是这样。意念上和語法构造上不一致了。最好改成:“…击败来自立陶宛的年仅十一的女学生巴拉伊希奇,获得少年女子冠軍,巴拉伊希奇获得亞軍。”(徐仲华)

677 一个偉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徹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当时魯迅深刻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他渴望一場徹底的革命,……(沈仁康、黃似玉:抒情詩的構思,125頁)

“一个…革命者”与“魯迅”是同位語与本位語的关系,中間不應該插上一个“当时”。可以把“当时”調到“魯迅”之后。或者把“魯迅”調到句首,后面用一逗号或破折号。(君桓)

678 河南封丘县荆工人民公社社長孙香云說:我这次来了以后,忍不住要把我們成立以后所作的巨大变化同大家談談,我也多么想听到各个地方的新鮮事情。(人民日报 1959年4月21日2版)

这个句子的毛病是:1)“我們成立以后”意思不清楚,要末是我們成立了什么,要末是我們的什么成立了,“我們”是不能成立的。2)“巨大变化”不能和動詞“作”相配搭。改正的意見:1)在“成立”前面加“公社”两字。2)去“作”,在“产生、发生、出現”中选用一个換上。(程佳境)

679 在木材場里,在飯館里,卡普桑諾以最低的工資,干着最繁重的劳动。(北京日报 1959年8月16日3版)

“以最低的工資”这个介詞結構,用来作“干着”的狀語是不恰当的。“以”是个文言遺留下来的介詞,意思同“用”差不多,組成介詞結構做狀語时,常是表示方式方法的。“用最低的工資干着最繁重的劳动”是說不通的。另外“干着”同“劳动”这个动宾关系也配搭得不十分妥當。全句可以改为:“…卡普桑諾干着最繁重的活儿,却拿着最低的工資。”(徐仲华)

680 上海圖書館啟事:本館經上級批准自8月16日起暫行對外停止閱覽进行內部整理,开放日期,再行通告。(文汇报 1959年8月17日4版广告)

1)“暂行”是修飾“停止”的,“對外”是修飾“閱覽”的,詞序放的不是位置。2)啟事應該力求簡明,“暫行停止”儘可改為“暫停”。3)“對外”是從圖書館的角度說的,“閱覽”是從讀者的角度說的,兩者不能構成偏正關係。全文可改為:“本館經上級批准,自8月16日起暫停開放,進行內部整理。恢復日期,另行通告。”(沈錫倫)

681 “五四時代這種推理的邏輯,到瞿秋白同志論語言文字的論著中更得到肯定和發展。(中國語文 1959年4月號,152頁)

沒有“到…中”這種結構形式,應改為“在…中”。實際上這句話的毛病是由於把“到…時”和“在…中”兩句話並為一句。(陸復中)

682 …許多愛國人士…覺得要救國圖強,必須追上日本維新的措施,對於人民文化教育工作刻不容緩。(中國語文 1959年4月號,156頁)

“追上…措施”搭配不當,可把“追上”改為“採取”。“刻不容緩”的是指的什麼?從句子結構上看,“許多愛國人士…對於…工作刻不容緩”,也不合事理。其實應當是發展文化教育工作對於人民刻不容緩。我看不如干脆把“對於”改為“發展”,並在前邊加個“因此”跟上文連接,更通暢些。(陸復中)

683 對於他們好的表現,他總是盡量鼓勵他們去做,。(語文教學 1959年7月號,12頁)

介詞“對於”常把賓語提前。在意念上“表現”是“做”的賓語。“做表現”動賓配合不當。應改為“對於他們好的表現,他總是盡量鼓勵”。(君樞)

684 人民公社是多種經營的綜合性的經濟,。(經濟研究 1959年1期,14頁)

第一,農村人民公社的確是多種經營的綜合性的經濟,。(經濟研究 1959年1期,15頁)

“人民公社是…經濟”在事理上說不通,“公社”後邊“的經濟”無論如何不能省。(徐征)

685 太陽已經收回洒下草原上的金色的光芒,虹也消失了。(烏蘭巴干:草原烽火,5頁)

“洒下草原上”應改為“洒在草原上”。(君樞)

686 詩人憤憤地呼叫着…。(文學知識 1959年第2期,29頁)

只有“憤恨”、“憤怒”,沒有“憤憤”。“憤憤”是生造的合成詞,應改用其他適當詞語。(朱泳縈)

687 余先生,這可不光是年青人的事啊!我們年老教師要用自己豐富的科學知識來與師生大協作,在科學領域上來一次躍進啊!(劇本 1959年2月號,44頁)

“教師…與師生大協作”不通。聯繫上下文,這裡的“師生”可能是指“年青的教師和學生”。(程佳境)

688 …高粱穗兒有的已經彎下腰來了,那些紅的、黑的、黃的、五顏六色的高粱子兒亮晶晶的飽唧唧的真叫人可愛。(收穫 1959年第2期,286頁)

“可愛、可憐、可惡”等詞本身就含有“使人…”的意思,所以“叫人”是多余的,沒有必要重複,該刪去“叫人”或刪去“可”。(徐仲華)

689 從封建禮教觀點看來,她是再醮的女人、是寡婦,她已經失去了人的尊嚴和人的價格了。(沈仁康、黃佩玉:抒情詩的構思,115頁)

這裡“人的價格”用詞不當。“價格”應改為“價值”。(君樞)

690 省農業廳已經對播種器作了技術上的確定,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又非常科學的改革,因此他們決定立即由農具製造廠大量製造推廣。(峻青:最後的報告,76頁)

“確定”的意思是明確決定。省農業廳對播種器作的是技術效能的判定,這叫“鑑定”。“確定”要改成“鑑定”。(殷之華)

691 著者 A. A. 龍果夫教授是蘇聯有名的漢學家。本書是他多年研究和教授語法的成果。著者對語法有比較開明的看法,不肯把西方的部法體系強加在漢語上;…(《有關語言學的幾個問題》封三科學出版社和新华書店廣告)

“不肯…”這個分句的意思在感情上和前一分句似乎對不上,把“不肯”換成“沒有”就好得多了。(徐征)

692 它(指炮彈片)是彎曲的狹長形,鋒鋒着可怕的齒角…。(吳強:紅日,40頁)

“鋒鋒”是形容詞,不能作動詞用,同時間“可怕”意義重複,這話可改為“有鋒的齒角”。(王兆麟)

书刊评论

一个座谈会对《学生字典》的意见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满足读者的需要,商务印书馆最近把早先出版的《学生小字典》彻底重编,更名为《学生字典》。

这本以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学生以及同等程度的读者为对象的字典,在商务印书馆第四编辑室的同志们集体编写过程中,贯彻了政治挂帅,强调了思想性和科学性。全书共收单字四千多个,主要是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通用汉字表草案”中选出来的;复词共收二千多条,主要是从小学课本中选出来的;复词一般地排在与单字义相关的后面,一律按北京音注上汉语拼音。在字形方面,包括简体字和异体字。另有“辨误”一项,列在容易藏错或写错的字下面。

这本字典现已出版的是音序排列本,另附部首检字表;但为了满足读者在目前的不同要求,准备在最近期内再出版部首排列本和四角号码排列本。

由于这本字典销路很大,读者面很广,商务印书馆最近特别邀请有关单位开了一次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这本字典的意见,以便再版改正,使质量不断提高。

在座谈会上,有的意见认为这本字典的优点要肯定,比过去《学生小字典》甲、乙种确是提高了一步;但是也有一些小毛病。对于有些单字用合成词来解释,固然可以,可是把这个单字也解释为合成词

的意义,这就犯了一般字典的通病。如116页上的“枷”字,举例为“连枷”,解释为“打稻谷用的一种农具”。这是对于“连枷”的解释,不是“枷”字的解释。有些举例是一个词,不是句子,读者是否能理解?有许多单字用合成词来解释,学生是否能懂也成问题。

有的意见是就其中所用简化字和异体字的规格来谈的。有的意见认为有些成语收得很好。复词一般地都排在第一个字的字头后面,但如“好高务远”并不排在“好”字后面而是排在“务”字后面;有的复词因为重点不同而排在其他字头后面,这在编辑说明中虽有解说,但这对查字典的人到底是不方便的。有时在第一个字头后面查不到,就不再查其他的字头了,如果将复词的每一个字头都查到,也太费时间,而且所谓重点,标准也有问题。还有的意见认为:“复词”的概念不大明确,括弧中有成语,有专门名词,有人名、地名,通称“复词”,有些不够妥当。而且复词并不完全排在第一个字的后面,又没有复词索引,读者是不容易查到的。至于有些解释太容易一些,有些解释又太深一些,都是可以斟酌的。

此外,有从发行工作角度来谈的,说这本字典很受读者欢迎,反映很好。可是读者还是欢迎部首本的多。最后主持座谈会的编者就复词注音和词的书写问题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简正文)

评《学生字典》关于复词的处理

管燮初

商务印书馆最近编的《学生字典》(音序排列本,64开,365页,定价0.60元,以下简称《字典》);在字头的解释后面列举同字头有关的复词,例如:

船 chuán 水上的交通工具。阿轮船,帆船。〔船坞〕
chuánwù 在水边建造的修造船只的地方。

一本小型字典,不可能把所有的复词都收进去,只能列举最常用和必须特地解释的复词。“船”字下面只列举“船坞”一个复词,加以注音和解释;对小型字典来说,这是一种恰当的编辑方式。

汉语有字和词的区别,这是汉语的特色。一个字

可以作为一个词,如“人”;有时候又是构成复词的词素,如“人民”的“人”。有些字古汉语中是一个词,现代普通话里只能作词素了,如“人民”的“民”。还有些字,从来就是词素,如“珊瑚”的“珊”。也有极少几个字在普通话里只能作单音词,如“呢 ne”。要是几个有时是词、有时又是词素那样的字结合在一起,如“大字报、一登(报)”,究竟是词组还是复词,意见很分歧。过去编字典的人尽可能规避这个问题,就是有些词典也往往不标明哪些是词。一本小字典,照例也可以不管词不词的问题,但是《字典》编者没有规避而用注音联写标明了哪些是词。这种当仁不让的作风是值得称道的。

词与词组的界限还不确定,《字典》的复词会引起一些讨论是很自然的。《字典》在编辑说明里所举复词的例子有:儿童节 Èrtóng Jié,包袱 bāofu,居然 jūrán,少年宫 shàonián gōng,少年之家 shàonián zhī jiā,中国少年报 Zhōngguó shàonián Bào,中国工农红军 Zhōngguó Gōngnóng Hóngjūn,对立 duìlì,对联 duìlián,唇亡齿寒 chúnwáng chǐhán,登高务远 hòugāo wùyuǎn,短小精悍 duǎnxiǎo jīnghàn。这些例子的注音,有的两个音节联写,有的一个音节单写,不过每一个例子当中至少有一段是两个音节联写的。这可以说明:这些例子是用复词组成的,并不是每个例子就是一个复词,必须注音联写的音节才是一个词。为汉语注音,有划分词的作用;可是几个音节联写的是一个复词,一个音节单写的都是一个单音词吗?《字典》的字头是一个单字(有少数双音节条目,例如“鸱鸒 bōgū、鸱鸒 lùlù、傀儡 kuǐlěi”是词头),一个单字可能是单音词,也可能是词素。词组或成语当中单独注音的字是单音词。词组或成语是用词构成的,不是用字构成的,所以注音自成一个单位的是一个词。“共产主义教育 gòngchǎnzhūyì jiàoyù”是两个词的词组,“古为今用 gǔ wèi jīn yòng”是四个词的词组。也许有人要说,“今”字在现代普通话里不能自由运用,“今天、今年、从今”的“今”都是双音词的词素。这个问题不难理解,成语往往采用古代语词(关于成语的分析后面还要讨论),“古为今用”这个例子可以看作一个成语。“今”字在古汉语中是可以用作单词的,因此,在这个成语中,“今”可以是一个单音词。

要是以上的了解不错的话,《字典》标志单音词和复词的方法,笔者完全赞同。不过,关于复词的界限问题,有两点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

一 词组和复词

《字典》在一个字头后面往往列举一些常用而且必须解释的例子,例如“二 èr”字下面有“二万五千里长征 èrwàn wǔqiān lǐ chángzhēng”、“二流子 èrlǐuzi”。显然第一个例子是包含四个词的词组,第二个例子是一个三音节复词。语文工作者对于词与词组如何划分界限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但是也有些比较一致的看法。比如,普通话一般的词总是能够自由运用的,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字就是词素。《字典》有时把这类词素误认为词,例如“蛋白質 dànbái zhì,啄木鸟 zhuómù niǎo,度量衡 dùliàng héng,梆子腔 bāngzi qiāng,堂皇 táng huáng,溢洪道 yì hóng dào”,这些例子都是复词,不是词组。划分词与词组分歧较大的是,几个有时作词素,有时作单词的字在什么条件之下可以构成复词。这个问题牵涉现代汉语构词法的理论,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说得明白的。这里只是想指出《字典》里一些自相矛盾的例子,希望能够择善而从,使它内部一致。

“共产主义”的注音写成 gòngchǎn zhūyì 两个词,而在“共产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两个例子中,“共产主义”写成 gòngchǎnzhūyì 一个词,在别的带“主义”的例子里也大多把“主义”同它前面成分联写,如“宗派主义 zōngpàizhūyì,马克思列宁主义 Mǎkèsī-Lièníngzhūyì”。据此类推,“共产主义”可以联写成 gòngchǎnzhūyì 一个词。

“工人阶级 gōngrénjiējí”和“资产阶级 zīchǎnjiējí”的注音都联写成一个词;“统治阶级 tǒngzhìjiējí”分写成两个词。根据后一个例子类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可以作为词组,分写成 gōngrénjiējí 和 zīchǎnjiējí。别的同类例子可以同样处理。

“战争 zhànzhēng”联写成一个词,而“北伐战争 Běifā zhàn zhēng”里的“战争”分写成两个词,就是在“北伐战争”里,“战争”也应联写成一个词。这种同一个词前后矛盾,同上面提到的“共产主义”性质相同。其他象“少年先锋队 shàonián xiānfēng duì”(原误标阴平调)的“先锋队”应当同“生产队 shēngchǎnduì”一致,作为一个复词联写起来。

“大字报 dàzìbào”联写成一个词,据此类推,“淡水湖 dàنشوئ hū”、“打油诗 dǎyóu shī”、“田徑賽 tiánjìng sài”、“连环画 liánhuán huà”、“海岸线 hǎiàn xiàn”、“航空线 hángkōng xiàn”、“寄生虫 jìshēng chóng”、“少年宫 shàonián gōng”、“儿童节 Èrtóng

jié”等，都是一个詞，也应当联写。其他同类的例子同样处理。

“二万五千里长征 èrwàn wǔqiān lǐ chángzhēng”里的数詞和量詞既然按詞組分写，那么，“全国一盘棋 quánguó yīpán qí”里的数詞“一”和量詞“盘”也是一个詞組，也就应当分写成两个詞。还有“一天等于二十年 yītiān dēngyú èrshí nián”，同一个例子里“二十年”分写成两个詞，而“一天”联写成一个詞，要是前后一致，“一天”也是詞組，也应当分写成两个詞。

“伊斯兰教 Yisilán-Jiào”的“伊斯兰”譯音和“教”字中間加一道短橫联写，根据这个例子类推，“喜马拉雅山 Xīmǎlāyǎ Shān”和“珠穆朗瑪峰 Zhūmùlǎngmǎ Fēng”也可以加短橫联写。

地理專名“長城 Chángchéng”、“北冰洋 Běibīngyáng”都联写成一个詞，那么，“長江 Chángjiāng”、“黃河 Huánghé”、“秦嶺 Qín Lǐng”、“大西洋 Dàxī Yáng”、“太平洋 Tàipíng Yáng”、“大渡河 Dàdù Hé”、“鴨綠江 Yàlù Jiāng”、“武汉市 Wúhàn Shì”、“三門峽 Sānmén Xiá”、“井崗山 Jǐnggāng Shān”、“蘆定橋 Lūdìng Qiáo”、“蘆沟桥 Lúgōu Qiáo”等也都应当联写成一个詞。此外，“南美 Nán-Měi”中詞加短橫，而“北美”却联写成“Běiměi”。

二 成語和复詞

成語是由詞組成的，不过成語的形式比較固定，不像詞組那样可以隨意組合，如“胸有成竹”不能改作“心有成竹”，也不能說“胸有成木”。再說，每一个成語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不能單純从詞义上去推求。成語的語法結構和詞組完全相同，有主謂結構，如“愚公移山”；动宾結構，如“逼上梁山”；向心結構，如“委曲求全”；后补結構，如“顛扑不破”；并立結構，如“明目張胆”；連动結構，如“得隴望蜀”。

划分成語中复詞和單音詞的准則，笔者同意下列几个例子的处理办法。“狼吞虎咽 lāng tūn hǔ yàn”、“体贴入微 tǐtiē rù wēi”、“淋漓尽致 línlí jìn (原誤注为 jìng)zhì”、“夸夸其談 kuākuā qí tán”、“吞吞吐吐 tūntun tǔtǔ”。从上列五个例子里可以归納出两条分析成語的条例：(1)凡普通話所不用的文言格式，按文言文分析，如“狼吞虎咽”是四个詞；“淋漓尽致”是三个詞，因为“淋漓”是古漢語的一个双声联綿詞；“夸夸其談”也是三个詞，“夸夸”是古漢語的一个重迭

詞。这样分析以后，三个例子里包含“狼、吞、虎、咽、尽、談”六个普通話里一般的詞，“淋漓、夸夸、致、其”四个詞現在只能在成語里出現（“致、其”还可以作素）。我們分析的是普通話里的成語，只能在成語里出現的詞，当然和一般的詞不同，但是得承認它是普通話里的成語詞。(2)包含普通話一般复詞的成語，一般复詞按現代漢語分析，如“吞吞吐吐”、“体贴入微”两个例子里的“吞吞、吐吐、体贴”，这是一般的双音詞。假如根据这两个条例来衡量《字典》全部成語的注音，那就显得很乱，如“非驴非馬 fēilúfēimǎ”、“吹毛疵 chuīmáo qīcǐ”、“談虎色变 tán hǔ sèbiàn”（“色”原誤注为 cè）、“先入为主 xiānrù wéizhǔ”、“依样葫蘆 yīyàng húlú”（“样”原誤注为 yāng）都不符合条例。这类不符合成語分析条例的例子相当多，內容比較复杂，得詳細檢查。

有一类构詞格式，外表和并列結構的成語相似，如“油腔滑調”、“欢天喜地”、“掂斤兩”、“瓮声瓮气”、“鬼鬼祟祟”。这类例子的特征是一个或两个并列成分被交叉插入新的成分，造成 $AB A_1 B_1$ 、 $A_1 A_1 C$ 、 $ABC B_1$ 式。上面第一个例子是并列成分“油滑”和并列中心“腔調”交叉，第二个例子并列成分“欢喜”跟隨两个宾語“天”和“地”，第三个例子并列成分“斤两”加上两个动詞性成分“掂”和“两”，第四个例子并列中心成分“声气”加上重叠修饰成分“瓮瓮”，第五个例子并列成分“鬼祟”重叠。这种并列成分在別的情况下是双音詞，交叉插入的成分以后組成四音节詞。無論古漢語或是現代漢語， $AB A_1 B_1$ 、 $A_1 C$ 或 CB_1 不可能全是詞的配合关系，例如“滑調、喜地、掂斤、瓮气、祟祟”都不成話。《字典》把这类單詞作为成語注音，如“油腔滑調 yóuqiāng huádiào”，“掂斤兩 diānjīn bǎiliǎng”，“瓮声瓮气 wèngshēng wèngqì”，“鬼鬼祟祟 guǐguǐ suìsuì”。这是《字典》在語法分析上的一个显著缺陷。

最后还有一个附带的意見。前面說过，《字典》用字作字头的，但是也有把“老牌”的双音詞作詞头的，如“杳見、玳瑁、玲瓏”。照这样处理，“咖啡、胡蘆、咕咕、琅琅、翡翠、慷慨、喇嘛、喇嘛、駱駝、咖啡、螞蟻、琉璃、玻璃、鴿鴿、鴿鴿、檳榔、檳榔、薄荷、薄荷、菩薩、菩薩、芍藥、蜣螂、蜣螂”，等等，也都应当作詞头了。“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滿足讀者的需要”，希望再版时能够在这类体例上修改一下，做到一致。

評雅洪托夫著《漢語的動詞範疇》*

〔蘇聯〕E. H. 舒托娃

雅洪托夫的這本書是蘇聯漢學界研究漢語語法專題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的第一個嘗試。這本書寫得很認真，質量也很高。

全書由序言、三章和結束語五個部分組成。第一章——動詞在漢語詞類體系中的地位——指出作為一個詞類的動詞所特有的標志。第二章——動詞按支配性質的分類——描寫動詞的詞匯—語法範疇體系。分類是以各類動詞的句法特徵為基礎的。這一章的精華是它的描寫部分。這裡有許多精辟的見解和成功的發現。從“表示強求意義的動詞”，“表示思想、感情和言語的動詞”，“表示被動意義的動詞”等節中可以汲取很多有用的東西。“不及物動詞”一節特別有趣的地方是描寫表示地點意義的賓語的各種特殊意義，對附屬主語的解釋也很有趣。（中譯本58—63頁）

可是，雅洪托夫雖然賦予他所划分出來的各類動詞以詞匯—語法範疇的意義（重點是我加的——舒托娃），但是沒有提出比較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的分類。認為前置詞“把”是直接賓語的標志這一論斷，沒有說明任何問題。大家都知道，前置詞“把”和動詞連用時不是表示它的詞匯意義，而只是一種必須有某些動詞前置或后置成分的語法結構。它有賓語的意義和性質。在前置詞“把”的結構里，客體通常是確定的。不解決這些事實的相互聯系以及它們同前置詞的語法意義和用法的关系問題，任何關於現代漢語中前置詞“把”的語法作用的意見，都是沒有根據的。

此外，雅洪托夫據以划出各類動詞的詞匯—語法標志，不能認為是語法的標志。比如說，表示“給”和“取”的動詞要求兩個賓語（人的名稱和事物），而表示思想、感情和言語的動詞能夠支配整個句子，表示強求意義的動詞的賓語是表示在該動詞的動作影響下進行活動的人，所有這些都沒有任何語法可言。這只不過是一些受動詞詞義以及該動詞所表示的動作本身制約的賓語意義的特點而已。在俄語里，表示這種意義的動詞的補語也有同樣的意義和形式。只有某種意義在語言里獲得形式上的標志，才有語法可言。雅洪托夫划分出來的各類動詞的賓語所具有的意義沒有形式的標志——各類動詞的賓語，在形式上都是一樣的（是沒有形式標志的動詞后置賓語）。

划分不及物動詞的形式—語法範疇也是一個爭論

的問題。如果把不能有賓語的不及物動詞和及物動詞（支配直接賓語）以及間接—及物動詞（支配間接賓語）加以對比，那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為什麼形式上和其他賓語完全一樣的表示地點意義的賓語（雅洪托夫指的是動詞后置的沒有形式標志的地點賓語）說明該動詞是不及物的呢，這一點就有点叫人不大明白了。

第三章是專門分析動詞的純語法範疇的（體和時的範疇，動作的量、式和方向的範疇）。

在這章里，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雅洪托夫划出普通體和結果體。作者所建立的結果體這個語法範疇，從內容上來看，概括了所有那些個別的體的意義，這些意義給動詞帶來了各種不同的修飾成分，並且其他的研究者根據這些意義在漢語中發現許多不同的體。在我們看來，雅洪托夫關於漢語動詞普通體和結果體的論斷一定會為學術界普遍接受。

除了這兩種體之外，雅洪托夫還提出短暫體的範疇。它的表達形式是動詞重疊。作者認為，“在現代漢語里，這種形式的基本意義是指出動作的不延續性、短暫性或者動作的削弱”（同103頁）。

至於談到這本書解決漢語動詞時制問題的办法，那還是一個爭論的問題。雅洪托夫認為漢語和俄語的時的範疇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同116頁）。

在俄語里，語法上時間關係的基礎是說話的當時。波鐵布尼亞在講到時的範疇時寫道：“語法上的時是動作或狀態和說話當時及…有意識地想這些動作或狀態的時刻的關係”。①俄語語法範疇時的客觀性是建立在動作和說話當時之間關係的基礎上的。俄語里時的相對或轉義用法，同語法上客觀的時的用法比較起來，非常少見，而且主要的是這些用法都能根據語法上客觀的時加以說明。

而在漢語里，時的所謂相對或轉義用法則大量存在。而且，實際上在漢語里沒有一個時是有自己特有的形式標志的。在雅洪托夫的體系里，被列入時的範

* 按本刊1959年5月號曾譯載E. H. 高列洛夫（郭俊儒）對雅洪托夫這本書的書評，現在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這本書，我們特再譯載舒托娃同志這篇書評，供讀者參考——編者。

① 參閱波鐵布尼亞《俄語語法論叢》，第四部分，莫斯科—列寧格勒，1941年，137頁。

謂的形式,从語法上客觀的時的觀點來看,用法沒有任何區別。比如,表示過去的动作,可以用以後加部分“了”構形的動詞(例如:我买了一本書),以後加部分“着”構形的動詞(例如:他們一碗又一碗地喝着水)等,可以用零形態的動詞(例如:小常問他道…),可以用重疊的動詞(他的眼睛看一看傅健康〔譯音——譯者注〕的方向,又說…)。這些形式(除了“過”)和動詞結合在一起可以表示將來的动作。試比較:“我老婆快死了”;“我們自己挑着吧”;“你們回去歇歇吧”;等等。表示動作與說話同時進行的動詞,不能有後加部分“了”和“過”,如果是結果體動詞,也不能有零形態的形式。零形態的結果體動詞和以後加部分“了”構形的動詞可以表示多次重複的动作(參看原書中譯本 101、126 頁例)。因此,特別重要的是了解和闡明漢語中時的相對和轉義用法。而在雅洪托夫的解釋里,時的語法範疇失去了它的核心,時的直義的、轉義的和相對的用法互相交織在一起,使範疇本身的實質模糊起來了。

不能用“了”表示現在時這一事實,並不說明這一形式的時的意義。完成體和結果體的动作和現在時的觀念在邏輯上相抵觸,零形態動詞(在雅洪托夫的體系里稱現在-將來時)如果是結果體,就不能表示現在時——所有這些事實,相互聯繫起來加以觀察,就證明“了”的形式和零形態在表達時間意義上並不相互對立;不能把不用“了”表示現在時這一事實看作對區分“時”具有語法意義的因素。

作者認為他根據某些分類的標志所划分出來的各類動詞,具有詞匯-語法範疇的意義。換句話說,在雅洪托夫的語言學方法中,分類是研究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我們看來,分類應該只是手段。我們認為,這種把研究方法中分類因素絕對化的結果,給這本書帶來了兩大缺點。

1) 作者研究“標志”的興趣顯然是太大了。這往往變成了標志而去研究那些毫無語法內容的標志。人們懷疑雅洪托夫按支配關係對動詞進行分類時所依

據的標志是否具有語法意義。在各類動詞按其與體-時-後加部分、時間狀語、計算詞等配合分類。从語法角度看來,有些理由還不充足。比如動詞的體形式吧,它的語法意義是表示动作的量,最有动作的變異性和試探性等細微含義。从邏輯上講,這種意義不大和“愛、恨”等這類動作配合,但很容易和“想”這類動作配合,而這些動詞在這本書里却屬於表示思想、感情的動詞這一類,按雅洪托夫的意思,應該在語法上起同樣的作用。(試比較一下:不能說“愛一愛”,但是能說“想一想”。)

2) 觀察到的語言現象、標志和特征,必須得到證明。但是,以分類為研究的最后結果的方法,只滿足于有標志存在這一事實本身,而不去探索它的語法原因。舉這樣一個例子,雅洪托夫完全正確地指出,在漢語里有沒有動詞後置賓語和動詞後加部分用法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參看 131、135—6、138 頁)。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呢?作者把動詞按其與體-時-後加部分的配合劃成若干類,並不能解釋這種現象。从動詞後加部分的體-時意義的角度,也不能解釋各類動詞。而且,這些事實使人懷疑作為動詞後加部分的基礎的語法範疇具有形態學的性質。因此,要有一種更有效的研究方法,才能讓我們解釋在動詞後加部分用法範疇內觀察到的一切事實,從而發現作為動詞後加部分基礎的範疇的語法本質。

同時,也不能過低估計黎錦熙、呂叔湘以及外國的著名學者對動詞研究所作的貢獻。作者關於他的前輩們的著作的某些絕對的看法,不能算是這本書的長處。

雅洪托夫在這本書里收集大量的實際材料,並以系統化。在這方面,這本書可以說是一本百科全書。作者在這本書里表明自己是龍果夫學派的忠實的擁護者,在理論上也有許多成就,其中主要的就是對動詞體的研究。

(任醒云譯自蘇聯《東方學問題》雜誌 1959 年第 4 期)

馬禮遜的《中文字典》和官話拼音方案

——拼音史料筆記之一

周有光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92-1834)的官話拼音方案(1815),是利瑪竇、金尼閣方案(1605, 1626)到威妥瑪方案(1867)之間承前啟後的關鍵,同時也是鴉片戰爭以後大半個世紀教會羅馬字在我國流行的前導。它在漢語拼音方案的發展歷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可是過去似乎未被注意。例如羅常培先生的《漢語拼音字母演進史》(1934年第一版,1959年重印)在比較“中西各式羅馬字”時候就沒有提到這個方案。

馬禮遜,英國人,1807年來廣州。他是來我國的第一個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1814年出版《中文字典》以後,他在1815年到1823年出版《中文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全書六大冊,經過十三年編印完成。這部字典只印750部(見原書廣告之一),現在保存完整的已經不多。這是最早的中英字典(見威妥瑪《語音自通集》序言),其中的官話拼音方案大致是最早的接近英文拼法的,又是最早的基督教新教徒擬訂的漢語拼音方案。在這以前,大概只有天主教的方案,也就是利瑪竇、金尼閣方案的舊統。

這部字典分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分三冊,是部首排列的中英字典,收漢字約四萬(主要依據《康熙字典》),漢字下面附多音節詞和成語,事實上是一部“詞典”。馬禮遜已經認識到漢語不但有單音節詞,還有多音節詞,例如“字典”就是一個多音節詞(見第一部份序言)。從利瑪竇、金尼閣一直到何大化(參看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補》),漢字注音都是自上而下直排的。馬禮遜認為漢字可以橫排,不象阿拉伯文那樣改為自左而右橫排以後就會發生字形變化(見第一部份說明)。為了跟英文一致起見,他的字典改用漢字橫排。這可能是最早的自左而右的漢字橫排。第二部份兩冊,是字母音序排列的中英字典,①編列格式跟現在的《同音字典》相同,可能是最早的字母音序排列的漢字同音字典。第三部份只一冊,是從英文查中文的英中字典。

根據《中文字典》的拼写法,可以整理出馬禮遜的官話拼音方案如下:(1)聲母:ʔp; ʔp'; ʔm; ʔt; ʔt'; ʔn; ʔl; ʔk; ʔk'; ʔŋ; ʔh; ʔk, ts(e.i); <k', ts'(e.i); Th, s(e); ʔch; ʔch'; ʔsh; ʔj; ʔts, tsz; ʔts',

tsz'; ʔs, sz。(2)單韻母: Ya; ʔo; ʔə, ay; ʔē, ay; ʔarh; ʔē; ʔē(y); Xoo(w); ʔea(yu)。(3)復韻母: ʔae; ʔei, ay; ʔaou; ʔow; ʔan, en; ʔān, in, un; ʔang; ʔāng, ing。 ʔyēa(ya); ʔēē(yē); ʔēē(yē), eay(yay); ʔēēou(yaou); ʔēēw(yew); ʔēēn(yēn); ʔēin(yin); ʔēēang(yang); ʔēēing。 XYwa; Xēw; Xēwae; Xēwei, wuy, uy; Xēwān, nen; Xēwān, un; Xēwāng; Xēwāng, ung。 ʔyēnē(yuē); ʔyēuen(yuen); ʔyēun(yun); ʔyēung(yung)。

說明:a.《中文字典》第一部份送氣符號用[h] (例如t'hang),但是第二部份改用[']寫在漢字後面,不夾在字母拼寫當中;在上文里,只寫['],省略[h]。b.平聲不標,上聲符號['] ,去聲符號['] ,入聲符號['] 或['] (例如q')。在上文里,入聲寫法以及少數幾個拼法變體省略未列。c.多音節詞沒有連寫,只偶然運用短橫連接,例如“字”下“字典” tsze džen 不連寫,而“字匯” tsze-hwey 用短橫連接。

《中文字典》的注音是當時官話區的漢字讀書音,分平上去入四聲,不是陰陽上去四聲,所以跟北京語音略異,而跟南京語音接近(見第一部份說明)。只要除去入聲寫法,把平聲分為陰陽,這個方案就成為北京語音方案。從利瑪竇、金尼閣一直到何大化,都是在文言漢字旁邊用字母注音的,所注的音大致都是漢字的讀書音,不是純粹的口語音。馬禮遜仍舊是這樣。後來,艾約瑟(J. Edkins)把官話分為北、西(西南)、中(江淮)三区;威妥瑪(T. F. Wade)完全拼寫北京語音。

作者說明,他參考了天主教的《字典稿本》(Manuscript Dictionary),並且把《字典稿本》(英國皇家圖書館藏本,收漢字一萬餘)的音節表和他自己的音節表列成一個對照表(見第二部份第一冊)。比較對照表上的兩種拼写法,可以看出:一、《字典稿本》方案是利、金方案的一種較晚的修正方案,稍稍接近英文,但是還保留著一些明顯的利、金方案的特點,例如p寫q, p寫x; n已經大都改成ng,還有少數寫-m。二、(下轉34頁)

① 第二部分另有中文名稱,叫“五車韻府”,因為漢字材料主要以陳某所作《五車韻府》為依據。

1959 年度高等院校学报和学术刊物语言学论文索引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

批判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新建设, 1月号)……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級馬克思語文学会
学术思想批判的收获和体会(論壇,

第1期)……厦門大学中文系語文学专业队
关于《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事实解釋的問題(西南师范
学院学报,第2期)……徐德庵、李运益
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我尔汝的错误论点(人文杂志,
第2期)……严修
駁胡适关于标点符号起源的謬說(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第2期)……張濂华

文字改革問題

关于汉字拼音化若干問題的探討(福建师范学院学报,
第1期)……中文系一、二年級“文字改革”研究小組
汉语拼音教育和汉字改革运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第2期)……周有光
当前文字改革的宣傳报道工作(新聞战綫,
12期)……蔡世緯
对报纸使用简化汉字的意見(新聞战綫,18期)……平群

改进文風問題

用一丝不苟、坚持不懈的精神改进文風(新聞战綫,
5期)……河北省、天津市新聞界座談改进文風問題
总结經驗,整頓文風(新聞战綫,11期)……陶魯筋
整頓文風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新聞战綫,13期)……言魯
学习和发展新的文風(新聞战綫,15期)……新华日报总編室
深入实际和改进文風(新聞战綫,15期)……孙振
从一个专业看文風(新聞战綫,15期)……新华日报工业組
試談文風的标准(新聞战綫,19期)……沪光
整頓文風要和思想改造結合起来(新聞战綫,
22期)……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总編室
改进广播文風問題的研究(新聞战綫,20期)……楊兆麟
改进文風要先从改进思想作风入手(新聞战綫,
23期)……章澎
好花共賞(新聞战綫,23期)……王年一

毛主席的語言修养

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毛主席对語言科学的指示(合肥师范学院
学报,第2期)……楊长礼
毛主席語言的大众化(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第2期)……石云孙
談毛主席文章中修辞上排比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第4期)……李大魁等

普通語言学問題

語言学知識講座(一、語言和語言学)(外語教学与翻譯,
4月号、5月号)……戚雨村
語言学知識講座(二、語音和語音学)(外語教学与翻譯,
7月号、8月号)……戚雨村
語言学知識講座(語法和語法教学(上))(外語教学
与翻譯,9月号)……戚雨村
論語言的社会本質(复旦,7月号)……濮之珍
語言与政治的关系(外語教学与翻譯,11月号)……王德
民族融合与統一語言(民族研究,
4期)……[苏联]B.加甫罗夫

語音学研究

汉语声調的产生和发展(人文杂志,1期)……严学
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言与普通話語音对应規律(内蒙古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第1期)……張清
合肥舌尖前元音 i 韵辨正(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第1期)……周景
与楊潛斋先生討論語音学中的几个問題(华中师范学院学报
[語言文学版],1期)……閉克
峨音系(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1期)……陈紹齡、郝錫
溫岭方言(杭州大学学报[中国語文专号(-)],
3期)……杭州大学中文系方言調查
論 zcs 和 zhchshr(吉林大学学报[語言·文学],
4期)……李葆
东北黄海沿岸几个地方的語音問題(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語言·文学],4期)……金貴
語音教学与音位学(外語教学与研究,3卷
5期)……阿·列弗尔馬
广济方言和北京語音的比較(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語文专号],6期)……詹伯

汉语語法研究

試論汉语助詞和一般虛詞的关系[上、下](复旦,
10、11月号)……郭紹
“数詞+量詞”是詞还是詞組(华中师范学院学报,
1期)……邢福
現代汉语的詞組(宁波师范学院,1期)……金福
汉语构詞法中的几个理論問題(山东师范学院学报,
1期)……孙良
复杂的謂語(人文杂志,1期)……陈超
現代汉语名詞、動詞、形容詞的詞类特征(厦門大学学报,
2期)……洪
汉语实詞的分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 2期).....王力
再論先秦时代的系詞“是”及其发展(辽宁大学学报,
2期).....赵立哲
試論領屬性定語帶不帶“的”(揚州师范学院学报,
2期).....李人鉴
略談使用詞兒的問題(上海师范学院学报,2期).....許威汉
来和去(山东大学学报,2期).....周迟明
汉俄語定語結構詞序的一些对比(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語文专号],2期).....金大辛
詩經中的重言詞和联綿詞的分合运用(山西师范
学院学报,3期).....賀凱
虛詞不能归入基本詞汇嗎?(人文杂志,3期).....赵振鐸
漢語詞法研究中的几个問題(人文杂志,5期).....孙良明
从作文和說話的关系談到語法(新聞战綫,5期).....朱德熙
漢語構詞法和詞表研究[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5、6期).....黎錦熙
关于联合結構作謂語及单句并列复句的
界限問題(人文杂志,第6期).....馮曉文
檢查句子里語法錯誤的两种方法(新聞战綫,
8期).....朱德熙
略論現代漢語中的“給”字(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第10期).....鍾隆林
天門話的疑問代詞(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第10期).....周大璞

漢語史的研究

- 漫談《馬氏文通》(学术月刊,2月号).....陈望道
关于《馬氏文通》(复旦,3月号).....胡裕树
关于《馬氏文通》(复旦,3月号).....吳文祺
从《馬氏文通》所想起的一些問題(复旦,3月号).....郭紹虞
正確認識古典文的詞义(复旦,6月号).....李笠
关于許慎假借义例的解釋和批評(复旦,8月号).....郑叔中
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中山大学学报,
1、2期合刊).....方孝岳
漢語基本詞汇的形成及其发展(中山大学学报,
1、2期合刊).....潘允中
等的疑問(山东大学学报[中国語言文学版],
3期).....蔣維崧
切韵系統与現代漢語方言(广西师范学院[人文科学版],
3期).....梁振仕
漢語詞汇史的对象任务与方法(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語言·文学],4期).....計永佑
从图画文字的性質和发展試論汉字体系的起源和
建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語言·文学],
4期).....孙常叙
小学札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語文专号],
6期).....刘賡
地方戏曲音韵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第2期).....侯鏡和

1960年1月号

- 切韵“内部証据”論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第2期).....黃泮伯

文体学和写作技巧

- 从四川新民歌看新民歌的語言和技巧(四川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1期).....鍾必琴
从“炼話”学习人民修辭(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期).....張煦侯
魯迅杂文中的文言語詞(杭州大学学报[中国語文专号
(-)],3期).....高厚載
談国防部文告的風格(新聞战綫,2期).....朱德熙
采访和写作(新聞战綫,3期).....田流
試論赵树理作品的語言風格(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第5期).....中文系1956級語言班
我們怎样学习和运用群众語言(新聞战綫,5期).....熊耀才
談談雙同文的杂文(新聞战綫,
6期).....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湖北日报实习組
司馬迁的人物特写(新聞战綫,7、8、9期).....馮其庸
深入浅出及其他(新聞战綫,9期).....群众日报总編室
王船山的議論文(新聞战綫,14期).....王芸生
关于广播的口語化問題(新聞战綫,15期).....李义
从孟子的辯論学习写作技巧(新聞战綫,16、17期).....振甫
文章要反复地推敲和修改(新聞战綫,17期).....卞协
从古典文学中学习“簡炼”的技巧(新聞战綫,19期).....馮其庸
柳宗元的散文(新聞战綫,19、20期).....振甫
韓愈散文的技巧(新聞战綫,22、23期).....振甫

少数民族語文問題

- 对藏語学生进行語文教学的几点意見(民族研究,
2月号).....中央民族学院預科二部漢語文教研組
民族語文調查实习的几点經驗(民族研究,
3月号).....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
談談少数民族选择文字的問題(民族研究,
3月号).....楊正旺
我国少数民族标准語发展中的几个主要問題(民族研究,
5月号).....傅懋勳
正确地編譯出版少数民族文字課本教材(民族研究,
6月号).....长虹
从藏語中的漢語借詞看汉藏民族的亲密关系(民族研究,
7月号).....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藏語教研組
民族語文工作的輝煌成就(民族团結,7月号).....傅懋勳
关于蒙語輔音(內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1期).....清格尔泰、确精札布
对蒙古語文工作中几个問題的意見(內蒙古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1期).....清格尔泰
蒙古語巴林士語的語音和詞法(內蒙古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1期).....清格尔泰
关于現代蒙古諸語言、方言的分类問題(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3期).....希·罗布桑旺丹

語文教學問題

- 試論本族語在外語教學中的作用和地位(外語教學與翻譯, 11月號)……戚雨村、吳在揚
把紅旗插在語言教學的陣地上(山東師範學院學報, 1期)……子期
語言學課程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吉林大學學報(人文科學), 1期)……孫延章、李益德
一課語文教學的心理分析(合肥師範學院學報, 1期)……心理學教研組
關於政治論文教學(華中師範學院學報, 1期)……王慶生
中學語文課講讀課的“閱讀和分析”(山東師範學院學報, 1期)……吳述鄭
也談如何提高中學語文教學的質量(合肥師範學院學報, 2期)……濮之琦
中學語文的論說文教學(吉林師範大學學報, 4期)……吳伯威
中學語文科教學過程中的語言教學(吉林師範大學學報, 4期)……朱紹禹
語法教學必須服從基礎階段教學的要求(外語教學與研究, 3卷4期)……胡文仲
要扎扎实實的教語文(湖南教育, 5期)……李真微
把字義、字音、字形教好(湖南教育, 5期)……曹金華
試談語文教學的任務(湖南教育, 5期)……鹿云

翻譯問題

- 翻譯工作者必須政治挂帥(外語教學與翻譯, 1月號)……周煦良
談談翻譯工作者的某些非政治傾向(外語教學與翻譯, 2月號)……嚴嘖
翻譯中的原則性問題(外語教學與翻譯, 12月號)……錢誠

- 略談在翻譯文字中運用文言的問題(外語教學與翻譯, 12月號)……周煦良
從所謂“翻案件”說起(外語教學與翻譯, 3月號)……吳若
漫談譯名(外語教學與翻譯, 4月號)……周建人
翻譯中人稱代詞的省略、還原和更換(外語教學與翻譯, 4月號)……周煦良
略談話劇劇本的翻譯問題(上)(外語教學與翻譯, 8月號)……胡志權
翻譯漫談(外語教學與翻譯, 8月號)……李曉
關於“直譯”(外語教學與翻譯, 9月號)……周建人
翻譯與理解(外語教學與翻譯, 10月號)……周煦良
用漢語拼音字母音譯外國人名地名技術上的商榷(外語教學與翻譯, 10月號)……陸殿揚
名詞的象譯(外語教學與翻譯, 10月號)……菊英、竹林
幾個修辭學術語的正譯問題(外語教學與翻譯, 12月號)……唐松波

書評

- 評“論語言中的詞”(學術月刊, 7月號)……邊興昌
十年來語言學若干問題討論簡介(學術月刊, 12月號)……吳席儒
必須扭轉脫離階級分析的形式主義傾向(揚州師範學院學報, 創刊號)……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教學法研究小組
《詞是什麼》批判(論壇, 第1期)……黃炳輝、張次曼執筆
有嚴重錯誤的《現代漢語成語詞典》(讀書, 第6期)……米若
對《陝北人怎樣學習普通話》一書的一些意見(人文雜誌, 第1期)……西北大學中文系漢語方言小組
評周啟明譯《希臘神話故事》在語言上的混亂現象(人文雜誌, 第6期)……馬天祥

出版消息

中國語文叢書最近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兩本新書：一本是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組為紀念“五四”四十周年並慶祝偉大的建國十周年而集體編寫的《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這本書內分三編，第一編闡述五四以來白話同文言的鬥爭過程以至白話文的勝利，第二編闡述漢語詞匯的發展，第三編闡述語法方面的演進。180頁，定價0.65元。

另一本是《語法論集》第三集。這個集子里收有徐德庵、周光午等寫的關於現代、近代和古代漢語語法個別問題的論文六篇。192頁，定價0.65元。

還有高名凱著的《語法理論》、北京大學語言學教研室編的《語言學名詞解釋》和蘇聯漢學家魯勉齋著《現代漢語的句子形式主語》的中譯本都在排印中，不久即可出版。

另外，由本刊推薦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語研究小史》，也已在去年十二月內出書。這本書里介紹的國外漢語研究資料相當豐富。